



引用格式:卜祥记,易美宇.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现实启示[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1-1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01-11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现实启示

The logic way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Engels' anti-poverty thought

卜祥记¹,易美宇²

BU Xiangji, YI Meiyu

1.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2.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反贫困是贯穿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的主题,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建和《资本论》研究有重大的触动和贡献。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思想突围中的初步呈现到“从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的激活与触动,再到与马克思合作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向建构的历史阶段。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与独特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超越贫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贫困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在制度选择上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涵拓展上应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形态升级上应积极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进阶;在动能转换上应大力激发科技创新的反贫潜力。

关键词:

全面贫困;

反贫困;

美好生活;

唯物史观

[收稿日期]2020-12-20

[作者简介]卜祥记(1963—),男,江苏省丰县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经济哲学、生态哲学;易美宇(1989—),男,重庆市云阳县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经济哲学。

在全面深化对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中,从反贫困的角度切入恩格斯的思想空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通过对恩格斯思想行程的梳理,不仅可以发现反贫困乃是贯穿恩格斯一生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何等重要的思想触动和思想互动,因而反贫困思想也成为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又一关联点。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和完整的逻辑理路,经历了从思想突围中的初步呈现到“从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的激活与触动,再到与马克思合作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向建构的历史阶段。历史地看,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形成了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的逻辑理路。思想的价值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实现,梳理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一、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历史脉络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从对贫困的直观经验到对贫困现象进行具有原则高度的哲学审视,进而确证贫困的真正根源及其历史演变,再到以消灭自发分工、消灭私有制为主题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双向建构的历史脉络。

1. 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突围:反贫困思想的初步呈现

早在少年时期,恩格斯就对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的工人贫困现象有所了解并表示同情。虽然这仅仅是由恩格斯自发的自由天性所引起的对贫困的一种直观感受,但是也为其反贫困思想的萌发埋下了种子。1838年7—8月,恩格斯遵从父亲之命来到不来梅学习经商,并先后接触到了德国当时两大激进自由思潮——

“青年德意志”文学思潮和“青年黑格尔”哲学政治思潮。通过前者,恩格斯完成了从自发自由立场向自由民主立场的思想转变,著于1838年9月的《贝都因人》就是其介入社会政治问题的开端,而1839年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伍珀河谷来信》则表明恩格斯完成了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向。

如果说恩格斯在《贝都因人》中从自然和文化(社会)之对立来理解自由和奴役之对立的尝试还是一种“拙劣的诗歌”的话,那么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则能发现其对贫困现象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在文中,恩格斯把贫困现象归于两点:一是大工业给“下层等级”带来的强制劳动;二是宗教对人的思想的钳制。尤其是虔诚主义的滥觞使得伍珀河谷的工人甘于忍受工厂主的剥削、接受贫困的命运。尽管此时恩格斯还处于从基督教虔诚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向、由自发的天性自由向革命民主主义接近的思想行程中,但是与青年马克思早期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民主主义不同,恩格斯看到的恰恰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1]。这表明恩格斯关键性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症候,超越了传统的批判视域和反贫困思想。基于此,柏林时期的恩格斯先后与宗教和“自由人”决裂,逐渐确立起唯物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立场,进而在赫斯的影响下,迅速成为共产主义者^[2]。

恩格斯唯物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立场的确立使反贫困思想成为与马克思的学术关联点成为可能,也意味着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必然要深入到历史本质的维度中去强化自身的科学性与现实性,而这一重大推进是在与马克思胜利“会师”之后,由他们二人共同实现的。

2. 从“另一条道路”触动马克思:作为学术关联点的反贫困思想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经历的“物质利

益的困惑”和对共产主义的讨论这两大事件实际上体现了其在贫困问题上的困惑:一是《林木盗窃法》的通过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产生怀疑,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是如果共产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观念”,那么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作为协调市民社会利益冲突的理性国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贫困现象?共产主义能否摆脱“教条主义的观念”的桎梏进而成为消灭贫困的现实路径?通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的理论探索,马克思得出三点结论和遗留三个问题:其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这一结论需要论证。其二,黑格尔于《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一错误观点,在根本意义上乃是黑格尔一般哲学(逻辑学)的错误,有必要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其三,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无法消除市民社会的贫困,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可能的,虽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对抽象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仍需对共产主义本质进行深入探究。由此可见,马克思已清晰地认识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与经济利益的密切联系,要解决这里遗留下来的三个问题就必须利用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加以解剖,而此时的马克思在经济学学科知识储备和研究方法上显然是非常缺乏的。

当马克思在贫困问题上感到困惑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

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3]。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逐渐呈现——从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经济事实”出发,使用实证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寻找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再到对作为反贫困路径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探索。恩格斯反贫困思想恰逢其时地进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中*,为解决马克思的困惑和激活马克思的灵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提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是被激活后的马克思对遗留下来的三个问题的初步解答,也是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初步表达。马克思在文中毫不讳言自己得自恩格斯的启示:“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4]111-112}这种“完全经验的”批判研究方法显然受到了恩格斯的直接启发。另外,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十八世纪》中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导向对“私有制存在合理性”的批判,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中最为关键性的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直接性地延续和推进了恩格斯这一批判性工作,其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推导出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这一颠覆性论

* 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1843—1844年两年中撰写的三篇文章:1. 著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并发表在马克思担任主编的《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2. 著于1844年1月初至2月初并发表在马克思承担编辑工作的《前进报》上的《十八世纪》;3. 著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并以德文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后,恩格斯就和马克思开始“不断通信交换意见”,所以马克思对恩格斯即将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路和意图也应该有所了解。

断。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进一步阐释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即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把劳动从认识论领域拉回到本体论领域,并把劳动界定为感性对象性活动,进而把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辩证法改造为现实人的劳动辩证法。梅林的说法也提供了佐证:“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帮助他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认识到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制度。”^[5]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产生的思想触动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概而言之,反贫困思想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重要学术关联点。恩格斯从“另外一条道路”达致的反贫困思想为困惑中的马克思提供了学科视野、研究方法和关键性提示,直接性开启了他和马克思之后的反贫困思想的理论路向:树立全新的哲学立场(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是反贫困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澄清和重构(构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反贫困的关键环节,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是反贫困的根本途径,而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则是反贫困的终极目标。

3. 理论与实践:反贫困思想的双向建构

在理论建构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延续了在《1844年手稿》中所开启的实践唯物主义境域,实现了实践哲学的范式革命。然后恩格斯与其一道,在作为实践哲学具象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澄清历史前提的同时完成了唯物史观草创,即无产阶级立场的哲学范式的伟大创制。另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继续从自发分工出发将私有制的起源追溯至史前时期,弥补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前时期的解释空场。恩格

斯反贫困思想最终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中去,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现实性和革命性。随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将理论任务放在了构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上。作为这一任务的重大成果,《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科学表达,它以唯物史观视角澄清了贫困的现代性起源,确认它根源于资本的生产积累制度,并塑造出诸如工人贫困、生态贫困、精神贫困与全球贫困等四大贫困问题^[6]。

在实践建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其一,深入到无产阶级中去,全面研究无产阶级贫困问题。其二,积极投身于各国工人运动并参加多次革命起义,如埃尔伯费尔的反政府起义、巴登和普法尔茨农民起义。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军事理论,积极为革命运动提供具体的军事指导。其三,与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论战,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指导。其四,恩格斯为整理和出版《资本论》遗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直到生命终点。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反贫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恩格斯借此再次表明,消除贫困、实现无产阶级自由解放是其毕生信念和全部的实践旨归。

二、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与独特贡献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表现为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尽管在与马克思“会师”后,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以马克思为主导,但这并未掩盖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与现实价值。

1. 全面贫困: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

一般来说,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主要是指物质贫困。但是在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的贫困

绝不仅仅表现为物质贫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多向度、多层次的贫困结构。总体上来看,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全面贫困。具体来讲,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权利贫困、生态贫困。

其一,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一是工资微薄。出卖劳动力是无产阶级仅有的谋生方式。残酷的竞争使得工人被迫接受仅能维持其基本生存繁衍的微薄工资,“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4]678}。二是居住环境恶劣。无产阶级大多生活在肮脏、粗陋、狭小的贫民窟中,还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居所,饥饿、犯罪、疾病、道德的堕落充斥在穷人的聚居地。三是衣食条件极差。绝大多数工人穿得很差,即使是完好的,也很少能适应不同的气候。无产阶级只能吃到质量很差的食物,激烈的竞争使得供给食物的商贩不仅在食物中掺假,还在量上缺斤少两,“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4]411}。四是身体健康状况堪忧。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身体健康。肺结核、消化不良、瘰疬、佝偻症等疾病是大多数无产阶级身上常见的慢性病,伤寒、热病、瘟疫也随时威胁着无产阶级的生命。无产阶级所能享受的医疗资源十分短缺且费用高昂,不仅如此,假药、庸医还趁机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大都快速衰老、寿命短暂。对此,恩格斯发出诘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4]411}他认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无

产阶级的“谋杀”：“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4]409}

其二,精神生活空虚堕落。恩格斯转引西蒙斯的话指出:“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4]429}导致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原因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源稀缺。资产阶级提供给无产阶级的是充满教条和偏见的宗教教育,“孩子们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4]424-425},这直接性地导致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二是劳动活动的强制性。作为机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必须严格遵循机器的节奏。长时间的强制劳动“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4]432},导致工人失去了鲜活的生机和丰富的感情,“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4]433}。三是家庭伦理瓦解。妇女和儿童由于能够充分满足资本家最大化降低成本和延长工时的要求,逐渐成为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大部分男人则失业在家操持家务。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寄宿处,付给父母一定的膳宿费”^{[4]63}。家庭生活日益扭曲,工人失去了家庭这一最后的精神家园。四是被偶然性支

配的恐惧。无产阶级“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4]429},失业随时都可能到来,工人们生活在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恩格斯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更使人堕落。”^{[4]431}

其三,政治权利丧失殆尽。资产阶级通过实行代议制,赋予资产者以选举权,从而组成议会和政府,从贵族、行东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手中夺取了全部政治权利。这样一来,财产成为权力的代名词。恩格斯指出:“这里是财产统治一切,因此这种恩惠只赐予‘值得尊敬的’犯人,而穷人、贱民、无产者却承受着法定野蛮行为的全部重压。”^{[7]702}以宪法为主的法律也成为抽象的概念和纯粹的形式,沦为资产阶级奴役穷人的工具,“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7]705}。贫穷与罪恶成了同义词,“贫穷本身就已经使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4]482},享受法律所规定之权利和减免法律所规定之惩罚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金钱,而无产阶级就理所当然地丧失掉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无产者争夺政治权利的方式还仅仅局限于“政治原则”,试图通过议会改革来谋求政治权利,改变自身的悲惨境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摆脱政治权利贫困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其四,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一方面,农村的生态环境被工业城市肆意侵占和破坏。恩格斯描述了美丽的伍珀河谷被工业污染的情况:“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

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7]493}工业集中化把无数环境优美的农村改造为工厂城市:“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厂城市的萌芽。如果工业的这种疯狂的活动还能这样持续100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就会在沃灵顿或牛顿一带相互毗连。”^{[4]407}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另一方面,工业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到非人的地步,无产阶级的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更加恶劣。杂乱无章的建筑使工人区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给无产阶级“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4]411},“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4]410}。

2. 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历史透视

在对无产阶级全面贫困的“经济事实”进行了实证研究后,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透视无产阶级贫困根源,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得以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境域的关键。

在恩格斯看来,较之于重商主义时期对商业不道德本质赤裸裸地呈现,经历了18世纪产业革命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也仅仅“前进了半步”。因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4]357}。这里的“新的

经济学”指的是由亚当·斯密开启的自由贸易学说,它宣称自由的商业活动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4]58},是人类幸福的泉源。但是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困的现实揭示了它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矛盾,因此它不得不借助于“诡辩和伪善”来掩盖这种矛盾,把自由贸易学说包装成消除贫困的“万能药方”。恩格斯认为,“新的经济学”之所以陷入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原因就在于“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正因如此,马尔萨斯的贫困思想才显得如此荒谬,以至于恩格斯严厉谴责道:“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4]58}也正基于此,一代代经济学家才越来越走向“诡辩和伪善”的极致,其学说愈是系统和完整,其结论就愈荒谬,“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须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4]59}。恩格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极其失望,因为他们都是站在私有制的立场上来思考贫困问题,怎么能期望他们找到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和消除贫困呢?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4]58}。国民经济学家从不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这是他们贫困理论之所以荒谬的原因。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不仅无法解决贫困,反而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苦难。例如,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下颁布的《新济贫法》创建了被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的习艺所,给贫困的无产阶级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因此,恩格斯意识到仅仅停

留于把私有制视为贫困根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究私有制的本质来历,即资本主义制度前史,必须找到人类社会的真正前提,并以此重构国民经济学体系理论前提,创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际上,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涉足了这一工作,他从政治经济学家对商品的生产费用的组成要素的界定中推断出“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劳动。劳动……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7]60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历史的真正前提乃是现实的个人的劳动活动:“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516-519}在确定了真正的历史前提之后,他们借助于对自发分工史的梳理,初步阐明了私有制的历史演变,进而厘清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历史生成逻辑:自发分工导致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导致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贫困在强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历史顶点。也正是在这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论断才得到了科学论证,其反贫困思想终于深入到历史本质中,从而具备了科学的内涵。因此,他断定:“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

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4]368}

3. 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

把无产阶级确立为反贫困主体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重要贡献。当马克思还在对德国农民和小所有者深受君主制压迫而表示同情时,恩格斯就早在赫斯的影响下敏锐地发现工人阶级才是贫困与反贫困的真正主体,并着手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生成与世界历史意义。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认为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是无产阶级得以产生的直接原因,并且由于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展开,无产阶级逐渐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机器被广泛应用之前,工人们普遍散居于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进入过城市。在生活方面,他们收入稳定,并能自主决定工作时长,拥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从事对身体健康有利的休闲活动。在思想方面,他们“极其虔诚、受人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4]389}。他们恪守宗法秩序,“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附近没有酒馆和妓院”^{[4]389-390}。但是狂飙猛进的圈地运动和产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旋涡”^{[4]390}。机器生产方式几乎在所有生产部门中排挤掉手工生产方式,大工厂基本取代了效率低下的手工作坊,激烈的竞争使绝大多数的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纷纷陷入破产而成为无产者,同时也把原本“为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人和自耕农变成彻底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们被赶进大城市,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工业运动“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4]403}。由于工业革命向全世界蔓延和世界市场的开辟,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世界

范围内建立起来,整个人类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奴役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奴隶制都要深重,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反贫困主体。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8]149-150}

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反贫困的根本途径。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通过“合法革命”来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是矛盾,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想要实现这种思想才遭到失败”^{[7]550}。他强调,“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7]550-551}。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的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消除贫困。这表明,恩格斯拒绝一切不彻底的反贫困幻想,认为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打破贫困枷锁。

同时,恩格斯提出辩证的科学技术观,把提高生产力水平视为反贫困的关键。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关于土地生产力的算术级数增长的论断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忽视了科学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表现,而它的发展是快速而无止境的,“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4]82}。他以化学在农业上取得的巨大推动作用为例,充分论证了科学对于应对人口过剩的重要作用。尽管马尔萨斯的理论极为荒谬可笑,但恩格斯认为它“却是一个推动我们不断

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我们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我们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4]81}。在恩格斯看来,在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之后,“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就可以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一以贯之地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他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的狭隘的“永恒公平”倾向:“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8]151}

三、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虽然生成于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和现实性特质,提出了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观点,因此能够穿越时空,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反贫困伟大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1. 制度选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根源这一论断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重要内核。他认为只有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建立起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后,贫困才能真正地被消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不断地证明这一论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全面展示。

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均每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11亿人,降幅55.1%,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共减少了7.9亿人,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1.82%。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不断取得新成绩。从减贫速度和规模来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8年末的1660万人,累计减贫8239万人,连续六年年度减贫规模超过1000万人”^[9];从农村贫困发生率来看,由1978年末的97.5%降至2012年末的10.2%,再到2018年末的1.7%。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反贫困在规模、速度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有效推进。同时,中国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反贫困实践已经到达紧要关头,即从全面消灭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伟大转折点。实践证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反贫困实践的必然选择,中国反贫困实践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深刻洞见。

2. 内涵拓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恩格斯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权利贫困、生态贫困等维度对无产阶级的现实贫困进行了审视,一方面展示了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困的悲惨境况,另一方面又拓展了反贫困的内涵,为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多向度的着力点。就当前中国反贫困实践而言,恩格斯这一思想无疑契合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反贫困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我国反贫困实践重心要逐渐从消灭绝对贫困问题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倾斜,即从以物质脱贫

为主转变为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物质扶贫。应不断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保障就业机会供给;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交通、水电、网络、公共卫生体系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其二,精神扶贫。应注重教育扶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起码学会一项有用的技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0]良好的教育对一个人知识技能的获得、正确“三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应注重文化扶贫,积极提升贫困人口文化素养和培育其现代文化观念,促进贫困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同时,应加强对贫困地区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在传承原生态传统文化的同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三,权利扶贫。在贫困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根本性保障的前提下,应将权利扶贫的重点放在经济权利方面。虽然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创造财富方面具有巨大作用,但是资本的唯一意志是实现增值,贫困地区和群体在市场权力体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积极对资本逻辑加以导控,不仅应通过建立普惠性制度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贫困群体和地区在市场中的基本经济权利,还应加大特惠性政策供给,如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

3. 形态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进阶

恩格斯提出的生态贫困对于中国当下的反贫困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对工业文明中的无产阶级贫困与生态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了提示。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下,人民贫困与生态恶化往往形成恶性循环的闭环怪圈。作为异化劳动之最高表现

形式的大工业,一方面极大提升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在资本逻辑的座驾下不费分文地攫取自然和无产阶级的自然力。自然生态遭到巨大侵害,无产阶级也因而陷入无限贫困之境地。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之下,恩格斯这一提示应被置换为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工业文明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悖论在生态文明形态中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与恩格斯这一提示遥相呼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彻底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悖论,为中国反贫困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因此,中国反贫困实践应自觉进入生态文明语境之中,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内涵的绿色反贫困道路。总体来看,应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方式,推进产业链绿色升级。具体来说,应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贫方式等,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以实现反贫困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

4. 动能转换:激发科技创新的反贫困潜力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大工业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一旦私有制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取代,大工业就能够真正地回归为人的本质力量进而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4]683}这里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就是生产力。人类的生产力是从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生产系统组织的管理能力)这三种自然力转化而来的,这种作为前提的转化能力就是科学

技术,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的灵魂,是人类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决定性力量。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推动着人类文明浩荡前行,已经成为推动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不断发展的核心动能。“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11]因此,中国反贫困实践必须持续推进科学技术的变革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提升物质文化生产力,不断创造能够满足人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体而言,应不断激发科技创新的反贫困潜力,使科技创新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参考文献:

- [1] 张一兵,周嘉昕. 青年恩格斯在现实中探索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J]. 湖南社会科学,2008(3):1.
- [2] 麦克莱伦. 恩格斯传[M]. 臧峰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0.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2.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梅林. 马克思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4.
- [6] 周露平.《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及其新时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2):83.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9] 汪三贵,冯紫曦.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8.
- [1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EB/OL]. (2014-12-11)[2020-12-01]. <http://news.12371.cn/2014/12/11/ARTI1418295777211338.shtml>.
- [11]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20-09-11)[2020-12-0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549460006891757&wfr=spider&for=pc>.



引用格式:吴宁,宁甜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密钥”探究: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优势[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12-19.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12-08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密钥”探究

——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优势

Study on the “secret key”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ree advantages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吴宁,宁甜甜

WU Ning, NING Tiantian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崭新的文明形态,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价值诉求。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密钥”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三大优势。其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
优势

[收稿日期]2020-11-2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17JZD00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ZX030);上海市学校德育创新发展专项研究项目(2018-dycx-213)

[作者简介]吴宁(1966—),女,安徽省桐城市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宁甜甜(1993—),女,山东省青岛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一场涉及生产、生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人类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密钥”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优势。其中,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制度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

一、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只有读懂人民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环境、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需求,主要是对人民而不是对资本负责。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就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需要,就解决不了在生态环境下存在的矛盾,不能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如果一个执政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没有取信于民,那么它将失去人民的支持;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和信赖的政党,就像离开水的鱼,难以生存发展。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

和制度体系建设,先后提出了生态文明、绿色化、绿色发展等理论创新概念并将之转化为国家战略,生态文明才有了根本的制度性保障。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生态问题能否做出及时回应反映了执政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否坚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虽因时代不同而关注点有所差别,但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制度和体系。毛泽东在指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尽管从未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注重林业和水利等生态问题预防方面闪烁着生态思想的光芒,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邓小平从基本国策的层面明确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是为人民谋利、为后代造福,采取全面参与、重点治理、法治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进程,逐步建立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1]。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且把“美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整体谋划生态文明建设布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生态文明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合理地从整体上指导,对生态文明建设

进行整体规划,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配套措施,以保障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多方位、深层次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构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框架的“四梁八柱”。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基础性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发展中,以科技驱动和创新驱动推动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延伸绿色产业链,形成绿色产业布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落实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为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提供法律保障。通过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政府约谈、挂牌督办等,督促企业加强环境保护,对严重违法、多次违法的单位和个人实行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对执法不力或者故意放纵污染行为的主管领导和人员进行行政问责直至追究失职渎职的刑事责任。支持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人积极采取民事诉讼手段维护权利,各级法院对环境污染纠纷要采取措施、改变当前环境损害案件维权难的状况,做到快速立案、快速审判、快速执行,使受害人的权利尽快、圆满得到维护。对严重环境生态破坏案件构成犯罪的要坚决运用刑法手段予以严厉打击,依法加大环境侵权赔偿力度,强化对生态和环境的修复,解决环境侵权中“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难题,构建中国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环境治理格局。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的作用,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平等协商和利益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在机构设置上应加强生态治理的顶层设计,推行生态治理的大部门制,设立生态治理区划机构,坚持条条和块块的统一;在治理方

式上应让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三治”融合。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总抓手,扭紧落实党政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同部署,共落实。

二、生态文明建设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2]。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关系。在原始社会和农业时代,自然力远远超过人的生产能力,人的能动性发挥受到极大限制,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想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就要实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最彻底的决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背后隐藏的是资本主义无法调节的危机,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社会结构实行最彻底的批判,才能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的最本质特征,最终实现“两个和解”。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而且涉及以社会关系建设为重心的政治建设,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入手探讨生态问题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必须通过各种劳动关系结合在一起,各种劳动关系形成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更为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实践空间。资本主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资本的逐利性使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善于规划、长于协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解决生态治理的长期性、整体性、复杂性难题具有显著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采取生态殖民主义的手段来转嫁危机,而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制度的规范约束走出一条将生态化与现代化统一起来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代表任何集团和个人利益,引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创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与生态文明是一致的。生态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源于社会主义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区别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显著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保障自然资源的公有。私有制保护甚至“放纵”资本,对资本的贪婪给予了最大的保护,资本的贪婪性无法受到制度的约束,无法实现生态公平。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使人们拥有最多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将最终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这一矛盾解决之后,企业不再为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了社会总体利益而生产,就可以避免私有制下企业忽视生态环境的短视现象。所有制决定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以及生产和交换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公有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一以贯之的统一上。公有制不但代表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且代表着人们的长远利益,使生命共同体的世代延续成为可能,从而使命运共同体

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使人形成“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共识并将这个共识落实到行动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土壤。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并在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应有的生态视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自然不再是或仅仅是索取的对象,而是与人共生共荣的。公有制内蕴的全局性和长远性,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广阔的全局视野和持久的长远眼光耦合。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是生命共同体所要求的,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他人、他地、他国的观照成功对接;公有制内生的历时性原则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子孙后代的持续观照成功对接。社会主义公有制摆脱了资本对人的统治,实现了更为广泛、真实的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提高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关注自身公平地享有美好环境的权利。协商民主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协商民主,完善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参与环境问题决策的制度和程序;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及时、公开向社会发布环境质量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建立完善环境保护听证制度,保障公众对环境立法、执法的参与权、知情权。人民当家作主使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中,由此确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盛开生态文明之花的沃土,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自然资源是大自然馈赠给全人类的宝贵礼物,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必须归全民所有,不能以“公地悲剧”为借口,推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公地悲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构想:在一个开放的牧

场上,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虽然明知牧场会退化,但还是不顾牧场的承受能力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最终导致牧场退化,使所有人的利益受损。公有制不仅体现为人与人交往关系中的财产共有属性,也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资源全民共有性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全民共有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不存在所有权上的“公地”和“私地”之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以绿色为底色,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公地悲剧”是在缺乏生态约束、社会规制的情况下,以私有制尤其是小私有者的心态对待公有物品造成的,并不能证伪公有制。“公地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对公地的私用缺乏必要的监管。私有制是排他性、独有性的制度,与公正性和永续性水火不容。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导致生态财富分配不公正,其资源占有不平衡产生资源环境生态剥削、财富转移和环境侵占。发达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的双享受,以国际生态剥削和国际生态侵占为基础,这是当代“生态不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到被资本主义所桎梏的阶段,必然会引起生态问题,究其根源是其非生态的生产关系与私有制度所导致的。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的碎片化,进而造成人的自私与冷漠。因此,必须明确自然资源的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坚持自然资源收益的全民性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共享性,坚持公域与公益的统一。明确自然资源的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必须确保国家在位和人民本位,确保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在位,必须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确保作为历史、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人民的本位,避免自然资源的收益归少数人享有而广大人民却要承受由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

代价,避免生态环境产品的价值为人民群众创造但人民群众却被排斥在生态环境产品的享有之外。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和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又要保持国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管理和监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

生态自然资源不仅具有商品的属性而且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不得损害其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所有生态主体的共同生态利益,这种共同生态利益要求交换的平等性。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为公平的公共产品,惠及所有民众,不分贫富贵贱,也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护,生态的破坏不会只限于一时一地,面对生态危害没有人能够幸免。为最广大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消费上的共享性决定了其公平性。保证全体人民在基本生存条件分配上的公正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公正”在民生层面的体现。生态环境既是当代人的也是子孙后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意味着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公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大自然馈赠给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谁都不是自然财富的所有者,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然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公共性表现为非排他性,生态产品的非排他性体现了平等性,人人都有平等地享用公共生态产品的权利,生态产品的公共性和平等性决定了它不便于也不可能作为商品去交换。自然财富的私有化是最大的不公和不义,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3],私有制扭曲了

人的需要,把人的需要变为资本增值的需要。在私有制下,自然资源也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成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就被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抹杀了。中国确实有一些生态问题,但既不像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那样严重和系统,也不是不可克服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开辟了生态文明的光明大道,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生态治理是实现生态公平的基本途径。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与治理成效直接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关系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彰显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在其生产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既针对了自然环境的市场化、资本化的问题,又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现了生态公平,将社会正义和生态公平统筹起来,嵌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为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道路。

三、生态文明建设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需求。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管理和监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生产关系是基于人的生产活动形成的,内在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尺度和诉求内在规定着生产关系的价值取向。倘若现存生产关系与人的价值诉求相悖,人必然会提出摆脱束缚和限制的要求,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能使人获得解

放,更好满足人民在生态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生态文明建设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凸显的矛盾为目标,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从生态文明角度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解读,在确定生态环境是公域和生态产品是公物的基础上揭示出“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的深刻道理,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本质。生态环境在人民美好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拓宽了民生内涵,关乎人类的健康,关乎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生态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问题范畴,上升到政治和社会的战略高度,其既涉及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等发展问题,又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平衡与协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当代人提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应开发、掌握、运用低碳技术及其工艺,不断挖掘可再生能源,理性看待生产和消费,实现人民群众的绿色消费、绿色居住、绿色出行。

《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提出,要保障和提高公民享有清洁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生态环境的权益,体现了公民公平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基本权益。2019年,《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强调要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环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消费,每个人的基本环境权利都应该得到可靠保障,当其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任何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的主体,都应承担防止环境破坏并改善环境的责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根基和核心竞争力。“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

本基础”^[4]，“是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最朴素的理解和对环境保护最起码的诉求”^[5]，这是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价值。优美的生态环境、安全放心的食物，不仅是保障人民健康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直接体现，更是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着眼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更致力于保障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环境，提出了“两个清醒认识”的论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生态环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精神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生态多样性是美的来源，具有美学价值；生态文明蕴含着审美体验，人民群众作为审美主体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觉维护生态美来实现审美化生存。“山水乡愁”就是诗情画意的生存方式、城乡居民共享的生态文明福祉，民生福利的内涵由物质利益向生态利益拓展。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底气，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相同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为最广大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最广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必须转变以物质利益为主导的发展方式，避免陷入“幸福悖论”的恶性循环。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生态需求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对于全面提升民生福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对于生态环境问题能否做出及时回应，实质上反映了执政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是否坚持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立场问题。能否妥善处理 and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上升到政治和社会的战略高度，其既涉及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等问题，又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平衡与协调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紧密相连，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内在逻辑，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世界大同思想，反复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理念，传递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传递至世界各个角落。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理念，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以世界人民福祉为价值目标，指明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深刻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续动力。世界各国生态环境各有特点，美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不可能仅靠某个国家和民族而是要靠全人类联合起来去创造。生态文明建设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超越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寻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世界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为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行稳致远。

生态文明有助于筑牢社会主义的道德根基，因为生态道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道德建设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是生态道德的客观根据和内在逻辑。虽然自然界居于优先地位,但人类居于创造性的主体地位,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价值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将生态道德理念外化为日常的生态道德行为,用全民的自觉行动汇聚起加强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生态道德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内在需要,是人类道德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应不断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建设,提升全民的生态道德素养。

制度是管长远的、管根本的,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中国之治”取得的显著成效凸显了“中国之制”优势,明确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将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供给作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是在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总征程上提出的新要求、新规定和新号召,为我国今后制定和执行生态文明制度作出了明确的框架性规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软实

力要靠硬执行来实现。完善的制度设计如果得不到有效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空中楼阁。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制度,应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依靠体制改革、制度规范和法治保障来冲破既有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制度创新不仅是单一制度的创新,还相互关联地包含了政府管理机制、市场机制、法律机制的创新等,应将我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生态治理的效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并推动其有效实施,这既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 [1] 吴宁. 新中国 70 年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成就和经验[J]. 理论与评论, 2019(5):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20.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224.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 人民日报, 2013-05-25(01).
- [5] 周生贤.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J]. 求是, 2013(17):17.



引用格式:李翔,郭晓晴. 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西方境遇与当代价值[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20-27.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20-08

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西方境遇与当代价值

The western circumstance and contemporay value of Marx's social conflict thought

李翔,郭晓晴

LI Xiang, GUO Xiaoping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马克思开创了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先河,是对现代冲突学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先驱。齐美尔基于社会互动、人际交往微观理路提出“形式冲突论”,对社会冲突的概念、功能和缓解路径进行了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延伸;科塞基于宏观视角提出“功能冲突论”,倡导构建“安全阀”机制,在冲突的正向功能与社会整合方面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了有益补充;达伦多夫则提出了“辩证冲突论”,从公民权利与权力体系的关系、冲突强度和冲突烈度等方面,对社会冲突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多元发展。正是这些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为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养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应以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为理论坐标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批判西方冲突思想中的理论局限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借鉴,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冲突与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

关键词:
社会冲突;
西方境遇;
重释;
和谐

[收稿日期]2020-10-12

[基金项目]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2018GGJS042);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YW201927)

[作者简介]李翔(1979—),男,河南省襄城县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郭晓晴(1994—),女,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河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将冲突视作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其借助于社会冲突理论,从唯物史观视角揭露了私有制掩盖下不平等这一现实,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西方学者在继承、吸收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不同的流派,他们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了理论重构。这种尝试带有浓厚的改良色彩,并未跳出自由主义固有的窠臼;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了相对的补充和拓展。厘清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西方境遇,借鉴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冲突思想研究的积极成分,审视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当代价值,对于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防范和化解我国潜在的冲突与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齐美尔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延伸

作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美尔长期致力于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齐美尔和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区别。齐美尔在对现代性思考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将大众的视野聚焦到社会冲突的正向功能上,为科塞“安全阀”理论的提出做了理论铺垫^[1]。他不仅使社会冲突理论呈现出新的转折点,也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做了一定的理论延伸。

其一,齐美尔基于社会互动的微观理路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基本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在《论冲突》和《冲突和群体成员网》中,齐美尔从人际社会互动出发,提出了形式冲突论。他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过程为社会冲突思想研究的逻辑起点,聚焦于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和交往动机之间的矛盾,尤以个性自由与受到社会羁绊的矛盾作为关注的重点。他指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既独立于社会又与社

会交融在一起,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既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又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约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纽带愈加紧致,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愈加紧密,为了维持组织的稳定性,将不可避免产生社会冲突。在此种境遇下,冲突是作为社会成员人际互动存在的形式,由此引致的政治冲突则是社会交往的结果。

其二,在冲突的功能作用方面,相较于马克思,齐美尔更加突出强调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与马克思一样,齐美尔亦承认冲突存在的普遍性。但不同于马克思的是,齐美尔强调冲突的目的是为了利益的调整。他认为,每个人拥有追求金钱、财富和地位的原始欲望,冲突源于个体间的利益对抗,但又不得不妥协于社会的和谐,因而冲突不一定起纯粹的消极作用,局部温和的社会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规则的重建,能够发挥维持秩序的积极功效。就社会冲突的功能而言,齐美尔认为早期社会学家对社会冲突作用的概括过于单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涂尔干强调社会冲突是对社会结构的瓦解。相较于前者,他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地提出在以冲突与合作为主的社会交往形式中,最易被忽略的是冲突的积极影响。他指出,以往学者多着重于合作带来的实际效益,而忽视合作与冲突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冲突有助于明确群体间的界限,维持个人特色,此时冲突实际充当了调和因子的作用。齐美尔虽不是社会有机论者,但他指出冲突存在的意义是克服有机体失衡状态,促进社会稳定统一,保持生命力旺盛,强调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学家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它会造成一致或相反两种结果的摩擦。无论是个人与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还是在争夺稀缺资源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抑或是因个人排他性造成竞争发生的冲突,都不可避

免地影响着社会的良性循环。

其三,齐美尔率先尝试从社会心理角度提出了社会冲突的缓解路径。他指出,当群体规模与个性发展相联系的纽带松弛时,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不同质个体间的依赖性就会增强,一旦个体想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圈子进入舞台的中央,就会不自觉地破坏原有的一般性规则,此时就出现了更多可供选择的驱力、意愿和不满情绪。利益分配不均会引起现实性冲突,而情感变质则会唤起非现实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应当为个人和群体提供特定的发泄情绪、降低紧张感和分散压力的机会,因为在社会关系中,这种不满情绪只有表露出来才有机会化解,才能保证机体系统的健康正常运转。在理性化的社会中,当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频率过高时会形成基本稳定的交往模式,当固定群体中的人数逐渐增多、观点不易协调、整合难度加大时,自然会降低凝聚力,模糊群体间的划分界限。鉴于此,齐美尔主张应在明确新组合界限的基础上,发展出专门负责整合的机制来降低离心力,以维持社会各要素间的平衡。齐美尔认同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矛盾是社会冲突根源的观点。此外,齐美尔认为在调节力量方面存在一股推动社会整合、维持群体平衡的潜在力量。

如是观之,齐美尔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既有共同的指向,又有一定的差别。他们都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不同的地方在于,齐美尔认为,包含清晰目标的冲突会愈演愈烈,最终会被温和的冲突所替代;而马克思则认为,无论是阶级矛盾还是革命斗争都会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社会结构的颠覆性重塑。齐美尔所提出的社会冲突思想在他生前并未上升为主流思想,也并未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学界对他的评价多为“看似散乱的体系中蕴藏着某种逻辑”。他的思想是一座知识储量渊博的

宝库,后代学者多把他的观点拆解开来进行梳理应用并在曲折中发展了他的基本思想。应该看到,他对社会冲突积极功能的过于持重和威胁破坏作用的相对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思想的变革价值,难以抓住问题的根本。但不可否认的是,齐美尔独树一帜地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并致力于探究社会具体问题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对社会冲突积极功能的研究,则是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延伸,其前瞻性和独特新颖的风格,为社会冲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科塞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有益补充

科塞师从于默顿,而默顿作为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代表帕森斯的弟子,开创了经验功能主义。科塞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和齐美尔社会冲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冲突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相比,科塞更致力于在宏观冲突层面进行补充完善。在研究社会冲突的缘起和背景方面,科塞从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化互动形式的逻辑起点开始,从宏观视野中对社会冲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可以说,科塞的社会冲突思想继承、发展了齐美尔的冲突思想,既矫正补充了帕森斯的观点又将齐美尔的思想融入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分析框架中,后世许多学者因此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学家”。事实上,尽管科塞早期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其理论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他并没有具体归属于哪个学派,也称不上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马克思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创立了自己的冲突学说,但他又主张用社会冲突的概念代替阶级冲突。

在科塞看来,马克思所指的社会冲突首先表现为经济冲突,继而导致了社会的整合和变迁。马克思提倡构建良性制度,将冲突分为质

变冲突和量变冲突,前者会造成社会制度的更替,后者只是在维持现有统治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利益调整以缓和冲突,而质变导致的社会制度变迁与更替才是社会冲突的最终指向。科塞继承了马克思社会冲突是在社会运行条件下进行的这一逻辑前提,只不过他们二者的核心议题有所不同,马克思强调革命,注重战斗性;科塞强调社会整合,注重和谐性。在研究社会冲突的根源与结果方面,马克思关注社会冲突的根源——不平等利益,关注剧烈的冲突,强调斗争性;而科塞重视社会冲突的结果,关注不剧烈的冲突,强调整合性。

马克思与科塞二人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冲突。马克思强调从资源分配视角开展研究,而后者强调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开展研究,科塞强调在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心理层面展开论述。在马克思研究应对社会冲突的基础上,科塞提出社会冲突作为一种平衡机制,是社会系统正常运作过程中的有益补充力量。在充满自由的弹性社会结构下产生的低烈度冲突是调节成员的心理平衡、宣泄不满情绪的合理通道,防止负面因素对社会的瓦解,降低非现实性因素所造成的冲突破坏性,进而促进成员和社会间的协作,是现存社会中可包容可利用的对抗。这不仅迥异于马克思,也与齐美尔对构成威胁的情绪和实际冲突行为两方面的模棱两可划清了界线。

同时,科塞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证明社会冲突起“安全阀”的正向作用,并依此对以往研究功能理论中的固有成分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完善。在20世纪5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一些青年人试图以反传统、反权威的方式改变社会现状,在此背景下科塞以客观的态度、清醒和冷静的头脑对“病态”社会的冲突展开研究,致力于批驳帕森斯所提出的社会秩序理性理论和冲突负功能观

点,不赞成他们认为冲突只是“病态”社会的分裂性表现。科塞认为社会在不协调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具有永恒性质的非平衡状态,主要探讨冲突发生时的主体因素。冲突时有发生且不可抗拒,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不违背核心价值的情况下,紧张、失调和冲突对抗担任“激发器”的角色,它的积极功能表现在提高社会群体的凝聚力、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即带有“安全阀”起到缝合社会体系的建设性作用,起码发挥在找到情绪发泄的替代品之后不至于攻击原有的目标的功效^[2]。同时冲突可以使对抗双方通过一定途径在新的交往规则下实现平等对话,维系社会稳定。

当然,他也有别于齐美尔。在冲突问题上,齐美尔将群体间的冲突和战争等同;而科塞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冲突不全是起破坏作用,当群体的规模适中、结构稳定、基本价值观契合、冲突的烈度适中时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例如,互动性较强的小群体,易达成一致的价值观和认知,此时群体结构的凝聚性与外部冲突之间呈互补的正向关系,冲突作为一种平衡机制在发挥压制内部异议、形成新的工具性联合利益团体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反之,对于团结程度较低、结构较为稳固与包容度较低的刚性群体,冲突就意味着一种会对群体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的危险标志^[3]。

客观地说,科塞的社会冲突思想是在对现实性的审视之上,又加上对个人经验性的补充,主要是从概念角度实现了对帕森斯功能论的批判和超越,其社会冲突思想在理论研究上有很大的可拓性,但其研究宏观层面冲突思想的有限性如何应用在微观层面冲突的扩展有待证实;另外,他对烈度较低冲突的正向功能的研究过多忽略了烈度较高冲突的负面功能,是小范围的、不够全面的。但他着眼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论视角,与马克思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他强调通过对话凝聚共识,以此来医治社会的失范,显然是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在当代境遇下的一种有益补充。

三、达伦多夫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多元发展

达伦多夫作为当代辩证冲突论的主要代表,是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最有影响力的继承者,但与此同时,其观点不仅带有强烈的韦伯思想的痕迹,而且试图从不同视域阐释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因此被冠以“激进的自由主义者”。

在马克思和韦伯社会冲突思想双重影响的基础上,达伦多夫也对当时在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院派代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帕森斯对战后社会自我恢复调节的功能设想过于自信,呈现出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与帕森斯功能论不同,达伦多夫并不主张社会冲突必然带来稳定和谐,而是着重强调了社会冲突的变迁功能。在批判帕森斯的同时,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具有“两面性”,在任何时空下不平衡冲突对立的一面仍具有它存在的价值,他用“社会强制论”作理论支撑,意在阐明社会存在的基础即建立在参与权威运作的成员对排斥在权威运作之外成员的压制,表现为社会角色的分化与对抗。同时他否认了马克思划分阶级的基础,认为划分阶级的关键因素是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权而非占有权,显然他与马克思对冲突根源方面的解释存在分歧,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而达伦多夫认为权威是核心因素^[4];两者在社会冲突结果上的认识达成一致,认为冲突最终会导致原有体系的崩溃、既成权威结构的解体,实现原有制度的更替,继而维系现存社会的短暂稳定和现有的政治框架,社会权威则进入新一轮的利益再分配趋向制度化,但由于达伦多夫看不到资本家的利己心、剥削本质与劳动者和资本家在生产资料上

的占有不平等,看不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无法解释社会冲突的根本动因。

对比马克思和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的论述,可发现达伦多夫侧重于从“权力决定论”的角度延伸到“公民权利”来理解社会冲突。受马克思的矛盾学说和阶级学说的影响,达伦多夫以阶级为起点研究冲突的特殊形式,认为变迁与冲突都具有普遍性,冲突会影响结构的变迁。他以社会组织作为研究的起点,提出一种修正的阶级思想,站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对马克思的阶级思想进行分析,从强制性角度建立起以权威关系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社会压制模式,突出先天存在于不平等中的权力利益在利益群体中的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冲突的内在根源,而核心人物、领袖人物和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向上晋升的渠道等则是形成利益群体的重要条件,权力的合法性内嵌于制度的权威中^[5]。受阿玛蒂亚·森关于贫困与饥荒思想中造成饥荒的根源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不对等的影响,达伦多夫初步探讨了权力体系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剧烈动荡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冲突是以权力为核心的非稳定系统,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以政治和经济关系作为划分依据。他同时提出“冲突强度”和“冲突烈度”的概念,从强制性角度关注较为剧烈、带有破坏性的冲突,认为应得权利具有社会属性,是政治上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所有物的所有权合法化要求,而供给则是在经济因素上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两者属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矛盾双方^[6]。在他看来,公民资格的确立在政治上的成长与发展关系并不呈递增趋势,政治领域中公民权利的扩展问题才是矛盾的根本,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显然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在防范和化解社会冲突方面,达伦多夫提出了一些新构思,着重在制度运作方面提高规范化程度。达伦多夫提出,只有在公民自觉签订社会契约、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减少社会失范现象,只有在公民社会的框架内建立一个自由法治、世界的公民理想社会才能化解冲突。他借用韦伯提出的社会是由“强制性合作联合体”这些最基本的单元构成这一思想前提,强调在社会团体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在社会既有结构制度制约下,可以运用手中的合法性权威向他人施以权威力量强制支配他人,被支配的人则无条件接受控制处于从属地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系列社会冲突调节机制政策的设想,意在澄清在合法性冲突、非本质冲突的斗争中一方试图融合、吸收甚至消灭另一方时,只要保持沟通协调寻找一个可供调节的民主环境,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借助第三方平衡机制,在规范性的规则内进行疏导,降低“燃点”和烈度,就能有效化解社会冲突,推动冲突双方自动和解,推进成员自身行为的规范化和各要素间的整合。达伦多夫提出接济最底层群众的根本方法不是改善其经济生活条件,而是给予其充足的政治权利,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处理好经济快速增长与确保公民身份地位两者间的关系,增加人的生存机会。

毋庸置疑,达伦多夫在社会冲突的起因、效应、功能、变迁和调节等方面所做的条理性分析,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学学科的研究深度,为推动学界相关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也应当看到,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其与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他虽然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但他的辩证思维仅限于承认冲突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他在吸收韦伯关于权力和权威的论点后提出的许多新想法仅仅是只言片语式地提出,后期并未形成完备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

思想如对世界范围内的公民社会何时能够确立、怎样确立等基本思路的回答仍模棱两可,停留在理想的阶段,最终并未实现。他对于马克思提出的许多公设仍有部分不全面乃至错误的评价,如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最终以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无剥削的形式呈现,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而达伦多夫曲解为以“现金交易”供给形式存在的社会。与此同时,达伦多夫在解释社会冲突时,将权威结构中的权威关系置于首位,认为其是首要因素,忽略了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其他微观影响因素,这无疑削弱了其思想解释的信服力与普适性,显得过于保守。概言之,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尽管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在某些方面有所相像,并在多个维度对其做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但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其社会冲突思想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平台和视角,无法摆脱自由主义的束缚,自然就难以跳出自由主义固有的窠臼。

四、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以深邃的洞见走进历史深处,将社会冲突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之中,系统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是社会冲突最基本的表征,强调要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取得无产阶级胜利,依此来化解社会冲突,呈现出革命性、实践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就当下中国而言,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慨然前行,独特的制度优势也使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剥削阶级已经消亡,但剥削现象依然存在,阶层分化、劳资矛盾、生态保护等这些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导致冲突的重要诱因。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

所暴露出的这些冲突现象并非决然对立,因此,我们自然无须运用马克思所言及的激进革命来消灭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对其进行必要的开掘与重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冲突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防范和化解各种冲突与矛盾。一方面,我们既应以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作为理论坐标,充分运用理论资源观照社会现实,用与时俱进的理念而非僵化的思维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合理继承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而非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在追本溯源之同时,超越表层的理解,结合历史和时代语境的现实变迁,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深度挖掘、补充和重释,为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唯有如此,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所具有的指导性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和更充分的彰显。

作为社会冲突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在西方同样也广受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学界看到了社会冲突思想的基石是利益与权力,这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但当代西方社会冲突思想家对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并非全盘继承,而是结合各自的立场,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拓展和完善。这一点值得肯定。但也应当看到,西方学界在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进行理论重构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是修正,甚至是歪曲和背离,从而显得偏颇、粗疏和不当。究其原因,多是因为他们并未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决定性作用,而是试图从情感、期望和性格方面寻求帮助,并未从本质上涉及冲突的根源,这无形之中消解了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关涉社会冲突问题的思考,尽管存在着各种不足和缺陷,但也不乏一些深刻的洞见,他们提出的社会冲突正向功能,创设合法化的利益

诉求和向上流动渠道,促进社会结构整合,增强社会、国家凝聚力,以及巩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对我们有很好的启迪意义。对于这些思想,我们固然不能全盘吸收,但也不应漠然视之,而要以包容的心态对其进行理性的审视,以批判的眼光对其进行合理的借鉴。这既是现实之需,也是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作为包容和开放思想体系的内在要求。

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我们在审视已有认知的同时,要对现存社会实践重新思考,对现实进行反思与批判,在结合自身已有逻辑体系与社会实践需求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相关制度的缺位或失衡所引发的利益冲突等社会问题,将约束个体行为的制度设定在合理范围之内。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发生转变,科学审视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经典冲突理论中关涉经济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构建和社会组织建制的精辟论述,在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着眼于当代我国社会发展中应对非对抗性冲突的时代课题,推进治理方式的转变,借助于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以此为指导,纵观我国社会转型与改革进程不难发现,政府应对社会冲突的方式方法也应发生转变。首先,政府单纯的“家长式”管理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应着重增强服务意识,建立完善的民众诉求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收集广泛的民众意见,尤其是应收集利益受损群体的意见。究其本质,冲突产生的原因源于利益分配不均,尽管我国的社会冲突是以非对抗性冲突占主导,但体制的改革亦是“零和博弈”的过程^[7]。最大可能地倾听民意,不仅可以为政府做出科学的决策提供依据,也可防止敌对情绪和过激行为的发生,降低冲突带来的危害。其次,多元主体的存在必然产生多元的价值观,非理性的

观念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旦多种利益主体各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必然会产生负面效应,影响社会整体的和谐。与此同时,我们也应严防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注重网络舆论的引导,积极运用融媒体,建立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环境。对于对抗性冲突,可通过构建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和博弈机制将之控制在可预测、可把控的范围内,继而化解为组织程度低、内聚性低、频率高、强度高、可调和的非对抗性冲突,减少社会损失,化解社会隐患。此外,还应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力量的作用,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促进各个群体间的资源流动,降低冲突发生的风险^[8]。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减少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应善于运用社会保障机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满足民众各种民生需求,使之纳入良性运行的轨道。

概而言之,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当今许多社会冲突问题不能单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冲突思想都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西方社会冲突学家的一些思想亦可以为我们批判地借鉴。只有从我国的国情、党情、社情和民情出发,深入探究我国当下社会冲突的背景,分析社会冲突的成因,而不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或者沿袭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才能跳出固有的理论之窠臼。与此

同时,只有在承认社会冲突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着重强调其对于社会系统、社会体制机制的整合、调整与改革创新等建设性功能,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冲突思想的“中国表达”,实现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现实回归,也才能找到平衡冲突与和谐的张力,最终实现和谐的社会与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 [1] 刘玉安. 西方社会学史[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202 - 203.
- [2] 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M]. 孙立平,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75 - 79.
- [3] 桑斗吉. 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 [4] 邢媛. 青年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探析[J]. 理论探索, 2009(3): 32.
- [5] 卜长莉. 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及其影响[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 113.
- [6] 达仁道夫. 现代社会冲突[M]. 林荣远,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0 - 32.
- [7] 徐彬. 发掘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当代价值[J]. 学习论坛, 2015(10): 42.
- [8] 尹新瑞, 王美华. 科塞社会冲突理论及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基于《社会冲突的功能》分析[J]. 理论月刊, 2018(9): 170.



引用格式:季乃礼,刘杨.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政策偏好:基于特朗普自传的社会网络分析[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28-38.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28-11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政策偏好

——基于特朗普自传的社会网络分析

How does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 policy preferences?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Trump’s autobiography

季乃礼¹,刘杨²

JI Naili¹, LIU Yang²

- 1.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 2.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通过对特朗普的两本自传中所涉及的人物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整体密度较小、绝对中心地位和一定的小团体特征。特朗普从商期间确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影响了“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其一,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与“退群”行为密切相关;其二,小团体特征导致其决策中较强的“内群体偏好”,体现为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与派系林立;其三,强个人中心度塑造了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但这种建立在个人中心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可被牺牲的;其四,早期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政府角色促使特朗普政府具有鲜明的“反建制”色彩。

关键词:
特朗普;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政策偏好

[收稿日期]2020-09-17

[作者简介]季乃礼(1970—),男,山东省高青县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刘杨(1996—),女,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策分析与领导结构问题。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学界对他的研究就不断增加。在宏观层面上,对特朗普当选原因的分析主要包括舆论宣传和民粹主义等方面:或将其归为美国右翼新闻网站在相对封闭信息体系内对“误导性信息”的海量传播^[1];或将其归为较多地利用了新媒体,实行“推特选举”^[2];或将其归为美国选民长期以来的“无知”现象^[3]。在微观层面上,已有研究大多从政治人格、政治认知和精神分析角度入手,认为特朗普的人格结构由不羁善变、精于有为、助力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五个方面构成^[4];或认为特朗普具有合作倾向、高转变倾向、投机倾向和易受他人影响等特点,总体特征体现为一个“不稳定的合作者”形象^[5];或认为特朗普自负狂妄、目中无人、为所欲为、我行我素、高度自恋^[6]。

目前,学界对特朗普宏观层面的分析过于笼统地集中在权力结构变化等政治大环境中,将“特朗普现象”作为民粹主义战胜建制派的显著表象进行分析,没有关注特朗普作为独特个体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替代性”;微观层面的分析则过度关注特朗普的性格、认知、精神等个人内在特征,没有将特朗普作为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社会人”进行考虑,将其政策行为与政治偏好简单归因于其人格与先天倾向,忽视了其作为坐拥特朗普大厦、特朗普球场、特朗普广场等在内的特朗普集团的具有鲜明曼哈顿色彩的成功商人的身份,“自恋”仅仅是其外在表现形式,无法解释其全部行为动机与逻辑,也忽视了客观环境、成长历程与人际交往等社会性因素对其政治行为、理念和偏好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拟从一个比较中观的角度对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回溯性研究,将外部环境的作用与其内在人格特征相结合,立足早期作为“曼哈顿商人”的特朗普的“朋友圈”,在一个较

小的社会网络中分析其主要人际关系、社会资本与交往特征,探索其与“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偏好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全面把握特朗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进一步探究其对特朗普政策偏好的影响,本文选取两本于2016年出版的特朗普自传《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两本自传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这两本书能够全面展现特朗普在2016年获选美国总统之前的从商生涯,囊括了其在纽约房地产业务上的开发、建设和全盛的历程,也涉及其在橄榄球运动、高尔夫球场修建、脱口秀等电视节目以及与政府的相处交往等多方面的经历。其对于整体了解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这两本书是从特朗普本人的视角,以自著或自述的方式展开的第一手资料,能够从中窥见和分析特朗普较为真实的内心想法和商人理念。

再次,其自传的特性为特朗普人际关系梳理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供了基础,其本人在有限篇幅中提到的朋友、伙伴和同事等,必定是与其关系紧密、联系密切,以及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个体。

最后,与“总统特朗普”推特的碎片化、随意化文本相比,“商人特朗普”的自传不涉及政治或国家机密,会更加完整充分地展示特朗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在无法准确获知“总统特朗普”日常工作与“朋友圈”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基于社会网络对行为塑造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对经商时期特朗普的回溯性研究,运用“代理变量”的思路探

讨“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可操作性强。基于此,本文选择特朗普的两本自传进行分析,在剔除重复个体后,得到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208名个体行动者。对于个体社会网络分析而言,该数据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主要用于刻画和分析社会关系模式,说明群体内部结构、社会互动或人际关系等单一的微观网络特征^[7]。社会网络分为个体中心或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网络^[8]¹⁴,前者也称为主体网络,是指网络中存在某一主体行动者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行动者,一般用来探究该主体网络的结构性质对主体行动者的物质情感帮助、社会支持与属性影响;后者也称为社会中心网络,即整个网络由联系较为密切的群体与圈子构成,不存在某一显著突出的中心行动者。本文立足特朗普自传,将特朗普作为主体行动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特朗普早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意在探究其早期社会关系模式对“商人特朗普”的社会支持,进而剖析其与“总统特朗普”的行动模式、政策偏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基于上述208名个体行动者在特朗普所著《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中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以208名个体行动者作为节点的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处理,进而构建“商人特朗普”的二值无向社会网络关系模型。采用二值法赋值的方式对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处理,如果两个行动者之间存在互相来往、电话交流等互动关系,则将其对应的矩阵元素赋值为“1”,否则即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关系,或存在能够忽略不计的“弱关系”,将其赋值为“0”。由此,得到208×208的特朗普群体网络的邻接矩阵,并报告该社会

网络关系的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等,结合特朗普政府政策偏好对报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645支持了本文的数据分析。

3. 理论基础

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理论,按照布迪厄的解释,社会资本有两大特征:其一,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其二,社会网络是以互相认识和认知为基础的^[9]。因此,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网络中的精英个体能够使用他们之间的联系进行特权的再生产。而主体行动者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方式对其行动方式及其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到特朗普,早期“商人特朗普”嵌入社会网络的模式和逻辑逐渐固化,这不仅对其当下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而且对其后续行为及其行为逻辑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也就是说,“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人际关系特征和行为模式同“总统特朗普”相比,必然存在内在一致性和相似度。与其他总统相比,特朗普的归属动机明显偏高^[10],而根据温特政治动机理论,强归属动机的人极有可能是成功的商人,可见“总统特朗普”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商人特朗普”的特征。因此,可以通过“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和嵌入模式来探讨“总统特朗普”的行动逻辑和政策偏好。

二、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特朗普关系的邻接矩阵,分别从整体网络密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紧密中心度)和凝聚子群三个方面对“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具有密度较小、中心度较大和凝聚子群相对明显的特征。

1. 较小的社会网络密度

密度是指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其反映的是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程度,等于社会网络中实际关系数与理论关系数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该群体联系越紧密。将特朗普群体邻接矩阵导入 Ucinet 6.645 软件进行密度分析,结果为:“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密度为 0.028 2,标准化后密度为 0.165 4,密度较低。由此可以认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不够紧密,较为松散。虽然其表面上具有较为丰富繁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实际上其社会关系的密度较小,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交集较少,联系较弱。

2. “明星图”式的中心度

中心度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心度越大,表示与之相关联的人越多,该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越处于主导地位,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本和权力。中心度分为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紧密中心度三个测度指标。

点度中心度能够刻画网络中某节点的局部中心性,从而判断在该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的活跃程度,并获得社会网络中位于中心性位置与领导地位的个体行动者及其相关特征。点度中心度越大,表明该节点在社会网络中越居于

核心地位。由于特朗普自传对其社会关系中“出”和“入”的陈述较为模糊,判断不明,因此对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邻接矩阵为二值无向关系矩阵,不对网络中个体行动者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进行区别考虑。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点度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见表 1。由表 1 可知,特朗普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居于显著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平均点度中心度为 206,几乎同其社会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其余行动者中,哈里·亚瑟的点度中心度为^[11],包括罗伯特·特朗普和梅拉尼娅·特朗普在内的特朗普亲属的点度中心度约在 12 至 14 之间。由此可见,以上行动者与唐纳德·特朗普及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较为频繁,是该非正式组织中相对积极和活跃的行动者。

将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操作,可以得到其社会关系网络分布的无向图(见图 1)。由图 1 可知,位于绝对中心点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其与其他各个行动者几乎都具有直接联系,其他行动者互相间的联系明显弱于其同特朗普的联系,特朗普作为中心人物,在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显著的权力与声望。

中间中心度,也称间距中心度,用来衡量发挥“中间人”作用的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表 1 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点度中心度排名前十二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序号	姓名	点度中心度	具体信息
1	1	唐纳德·特朗普	206.000	商人特朗普
2	136	吉沃尔特·邓肯	20.000	新泽西将士队老板,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3	154	约翰·巴西特	19.000	美国橄榄球联盟里坦帕湾地区特权队员老板
4	137	阿尔·陶布曼	18.000	橄榄球密歇根黑豹队老板
5	138	迈尔斯·塔嫩鲍姆	17.000	橄榄球费城明星队老板
6	150	切特·西蒙斯	16.000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7	140	弗雷德·布拉德	15.000	橄榄球杰克逊公牛队老板
8	191	梅拉尼娅·特朗普	14.000	唐纳德·特朗普的妻子
9	142	加里·巴保罗	13.000	原国家橄榄球大联盟顶尖球员
10	34	罗伯特·特朗普	12.000	唐纳德·特朗普的弟弟,家族物业管理公司总裁
11	8	哈里·亚瑟	11.000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管人
12	73	弗瑞德·特朗普	10.000	唐纳德·特朗普的父亲,房地产商

的控场能力,即某个节点在社交网络中的桥梁作用。罗纳德·伯特运用“结构洞”^[8]¹⁶概念对此进行解释,认为具有较高中间中心度的节点相当于组织中的“缓冲器”与“绝缘体”,这些节点能够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重复关系人联结起来,使得两个非重复关系人向网络贡献的利益是可累加的而非重叠的^[11]。运用Ucinet 6.645对“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邻接矩阵进行中间中心度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特朗普的绝对中间中心度为

41 204.770,标准中间中心度为97.572,是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各行动者进行沟通与联系的最重要“桥梁”,对该网络中信息传达、资源流动与交流互通发挥着核心作用。紧随其后的分别为梅拉尼娅·特朗普、罗伯特·特朗普、约翰·巴西特、皮特·罗泽尔和吉沃尔特·邓肯,成为较多关系中的“结构洞”,在网络内部发挥着主要的信息互通作用。而其余绝大部分行动者的中间中心度较低,获取信息与人际交流对以上节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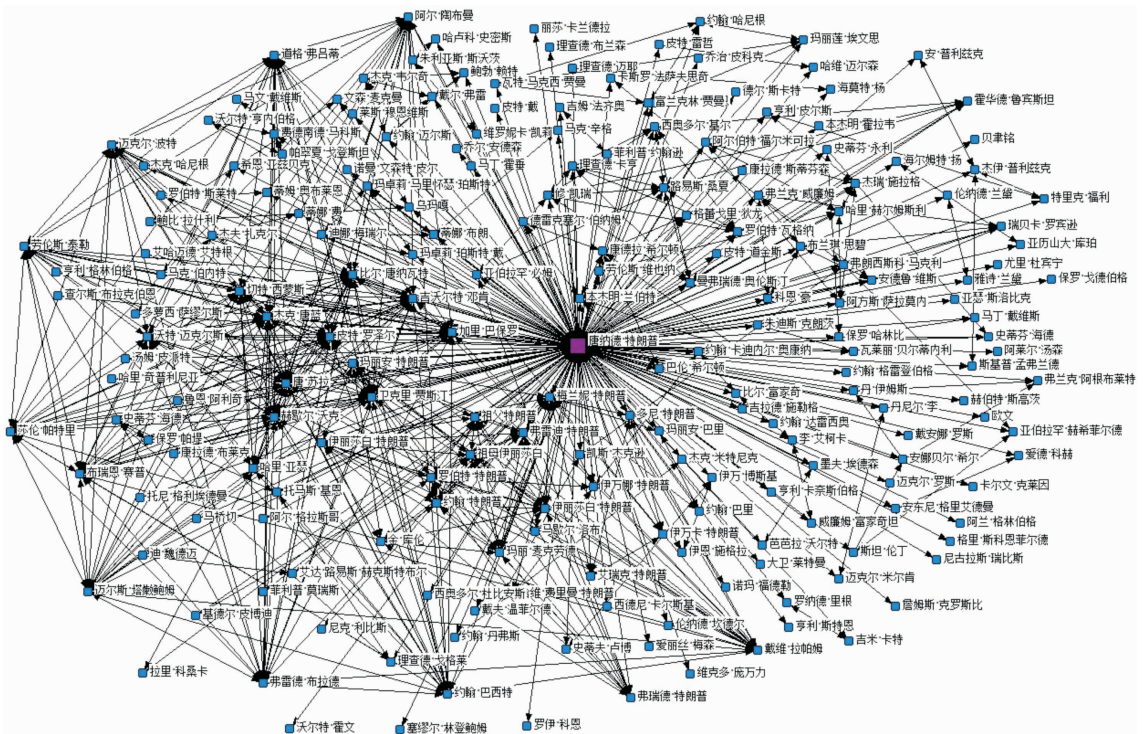


图1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图

表2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间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姓名	绝对中间中心度	标准中间中心度	具体信息
1	唐纳德·特朗普	41 204.770	97.572	商人特朗普
2	梅拉尼娅·特朗普	50.000	0.118	特朗普妻子
3	罗伯特·特朗普	29.417	0.070	弟弟,特朗普集团副总裁
4	约翰·巴西特	21.818	0.052	世界橄榄球联盟主创,美国橄榄球联盟特权会员队老板
5	皮特·罗泽尔	14.485	0.034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6	吉沃尔特·邓肯	14.485	0.034	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7	弗瑞德·特朗普	10.750	0.025	父亲,房地产商
8	路易斯·桑夏	10.557	0.025	民主党州长财政顾问
9	哈里·亚瑟	10.000	0.024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管人
10	康德拉·希尔顿	4.000	0.009	希尔顿酒店创始人

紧密中心度,又称为接近中心度,其主要通过测量各节点在网络中的总距离和紧密性来衡量中心度,用以表示一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行动者的总距离越短,则该网络的紧密中心度就越高,该行动者就越处于中心位置。运用 Ucinet 6.645 分析“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中心度,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知,唐纳德·特朗普具有最小的紧密中心度,意味着他与其他许多行动者的联系都较为紧密,再次证明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明星”位置。

3. 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

凝聚子群分析能够通过迭代得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若干子群。凝聚子群是行动者的若干子集合,同整体社会网络相比,每个子集合内行动者之间都具有更强、更直接、更紧密的积极关系。为掌握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小团体和派系情况,运用 Ucinet 6.645 对“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见图 2。

由图 2 可知,该社会关系网络存在 5 个较大子群(另外两个子群凝聚密度为 0,图中未显示),即“小团体”。如果将其自上而下分别命名为小团体 1 至 5,那么特朗普小团体 1 的行动者成员最多。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小团体密度矩阵见表 4。

表 3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表

排名	姓名	紧密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具体信息
1	唐纳德·特朗普	206.000	100.00	商人特朗普
2	约翰·巴西特	390.000	52.821	世界橄榄球联盟主创,美国橄榄球联盟特权会员队老板
3	皮特·罗泽尔	390.000	52.821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4	吉沃尔特·邓肯	390.000	52.685	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大亨
5	沃特·迈克尔斯	391.000	52.685	新泽西将士队教练
6	迈尔斯·塔嫩鲍姆	391.000	52.685	费城明星队老板
7	阿尔·陶布曼	391.000	52.685	密歇根黑豹队老板
8	切特·西蒙斯	391.000	52.685	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
9	唐·苏拉	391.000	52.685	所聘迈阿密海豚队教练
10	杰克·唐蓝	391.000	52.685	美国橄榄球联盟的高层领导

由表 4 可知,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密度为 0.445,在 $[-1, 1]$ 数值分布区间内,如果统计数值更接近 1,则表明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现象较为严重;如果数值更接近 -1,则表明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现象并不明显,无显著派系林立现象。因此,可以认为,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凝聚子群密度并不足够大,使得这些小团体之间存在完全的隔绝和屏障,拒绝与小团体外部的沟通和联系,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派系林立现象,使得其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不够紧密。

三、社会资本、网络特征影响政策偏好的逻辑与途径

个体的社会资本及其嵌入社会网络的方式对个体的行为风格具有较强且持久的形塑作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特征与“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政策选择存在内在一致性。“商人特朗普”密度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总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热衷“退群”等行为密切相关,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与特朗普政府决策中的“内群体偏好”一脉相承,“类明星图”的强中心度与特朗普的个人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1. 社会关系网络密度小与“退群”行为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分析可知,“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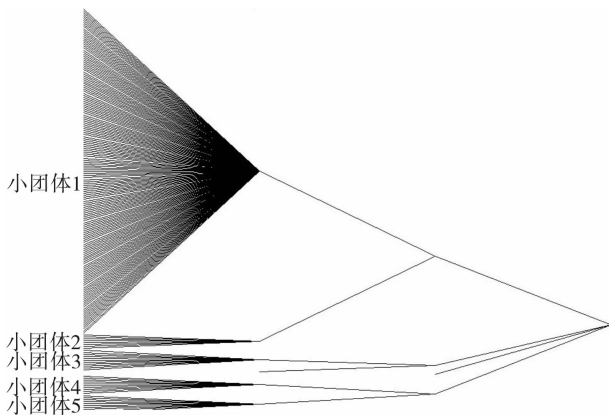


图2 “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图

表4 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密度矩阵

序号	1	2	3	4	5	6	7
1	0.019	0.007	0.008	0.042	0.012	0.008	0.006
2	0.007	0.786	0.011	0.000	0.000	0.000	0.000
3	0.008	0.011	0.945	0.636	0.000	0.000	0.000
4	0.042	0.000	0.636	0.000	0.000	0.000	0.000
5	0.012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6	0.008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1.000
7	0.006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R-squared = 0.445$

特朗普”的网络平均密度仅为0.028 2,可见,特朗普早期习惯于在一个密度较小、较为松散的弱社会关系结构中活动并取得成就。对特朗普而言,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其提供所必需的资金、人脉等社会资本和资源支持,但也仅限于发挥此类对自己有利的作用。此外,特朗普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并不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促成了早期“商人特朗普”的成功。

当然,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的体现。首先,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有助于保证其应对具体事务时的机动性与创新性,能够充分激发不同网络节点的作用,利用不同节点的资源。特朗普坐拥曼哈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与所有关系网络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尤其对于商业活动而言,网络的灵活性与广泛性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行动者的主观能

动性与创新性。其次,较小的网络密度也防止了组织的封闭性,可以使其社会网络内外形成人员有机流动和资源高效互通,使网络整体保持活力。例如,特朗普在经营管理上有一个重要而简单的原则,即“用高价从竞争对手那里聘请最好的员工,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付给奖金”^{[12]36},这也是“商人特朗普”的房地产帝国和商业帝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再次,小密度社会关系网络能够规避核心行动者对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依赖,保障其自主性与独立性。松散的“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各节点和整个网络的权力和声望都不足以抵消特朗普的权重,因此,特朗普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和决策权力。这种看似碎片化的网络结构实际上强化了核心行动者的作用,为其提升工作效率和发挥商业敏锐度提供了保障。

特朗普的小密度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在政治领域体现在对其独立自主性的把控上,既不依赖来自社会财团的大选资金支持,也不局限于相对熟识的竞选经理的支持,使其被期望能最大程度反映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而不是明显被利益集团和游说机构所掌控,这是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基本面和社会结构性原因。

然而,网络密度较小同时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高脆弱性、高风险性与高不稳定性。关系网络极易因某些外力因素的影响趋于分裂,难以保持稳定与完整,进而无法发挥社会关系网络对各节点的支持和凝聚作用。小密度网络逻辑易忽视团结的、集体的、合作的和凝聚的网络要素,以及较高社会网络密度下“共建共商共享”的理念。因此,“总统特朗普”的投机倾向、善变倾向与“不稳定合作者”^[6]等特征实质上具有“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依据和根源。这些特征主要反映为特朗普政府频繁、大面积的“退群”行为。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全球移民协议等各类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并声称拟退出,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召回专家。这种明显的外交收缩与孤立主义情绪的战略决策同“商人特朗普”一贯的小密度逻辑相契合,特朗普将各类合作机制视为美国松散“国际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而将美国视为核心行动者与网络中心,对国际形势判断呈消极态度,奉行单边主义外交原则^[10],一旦行动者对中心的支持作用不能够覆盖中心对其反方向的优势辐射作用,那么对于密度较小的松散网络而言,随时减少或增加某些行动者是其首要行为。

2. 决策中“内群体偏好”明显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偏好存在明显的“内群体偏好”。内群体和外群体最早为社会学家萨姆纳所使用,前者用来定义由“我们的人”所组成的使人们有归属感的“小团体”或类别,后者则相反^[13]。内群体偏好或偏见是指领导人对所属的群体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看待世界时以自己群体(包括社会、政治、种族)为中心^[14]。有学者将其归因于特朗普自信优越的自恋型人格使得其只能被同质人群所理解^[6],而无法被小圈子之外异质性更高的人所理解。因此,与特朗普政见不合的政府官员或共和党内成员越来越多被解雇或辞职。然而,仅从特朗普自恋这一精神领域探究其“内群体偏好”过于微观且不够全面,缺乏中观层次的结构考量。基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统特朗普”决策所体现的“内群体偏好”主要源于对“商人特朗普”较高凝聚子群密度(0.445)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

在“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与内群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的运营项目需要不同的专业团队或来自不同圈子的专业人

员具体负责,以特朗普商业集团的最终目标为导向,根据不同的阶段性或模块性任务适时组建不同的临时小团体,并且在项目完成或任务结束时解散或搁置小团体,成为“商人特朗普”涉足不同商业领域的重要方式。

但当“商人特朗普”的“内群体偏好”和社会关系网络惯性延续到白宫中时,决策团体中派系林立与人事变动频繁的现象便出现了。政府部门不同于私营商业部门,前者并不具有明确清晰的阶段性任务。目标的模糊性无法将小团体集中在部门化与专业化的任务中,发挥其在网络结构的积极作用。特朗普政府小团体的主要划分依据和认同基础是政见:一方面,政见不同的小团体在政府内部推诿扯皮、消耗组织活力;另一方面,政见不同也成为特朗普排除异己、构建自己内群体的有效借口。自特朗普上任以来,被直接解雇或被迫辞职的政要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国务卿蒂勒斯、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肖布、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白宫通信联络主任杜布克、海军部长斯潘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等。

显然,“总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仍然保持其决策的“内群体偏好”,主要体现在任人唯亲上。“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显示了其与家庭成员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更多,家庭是其早期重要的社会资本。小团体3就是特朗普的家族团体,特朗普认为“母亲是生命中的太阳”^{[12]78},五个兄弟姐妹是共同艰苦奋斗的关系密切者。在特朗普集团的商业活动中,弟弟罗伯特是特朗普集团的副总裁,前妻伊万娜掌管特朗普第二家赌场“特朗普城堡”,亲属关系在集团高层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网络的强凝聚力对特朗普后续任人唯亲与“裙带政治”的

做法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使特朗普成为易受亲人和朋友影响的归属动机占主导的政治家^[10]。这种与在市郊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做中低收入者房地产生意的老特朗普(弗瑞德·特朗普)一脉相承的家族企业式的管理模式延续至“总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上,具体表现为:特朗普将女婿库什纳任命为白宫顾问;女儿伊万卡成为联邦政府员工,头衔为“总统助理”。可以看出,“商人特朗普”小团体林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特朗普的塑造使其在白宫依然致力于构建家庭支持网络和嫡系幕僚团队,更加信任内群体。

3. 个人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色彩浓厚

特朗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极强的中心度,是网络中的核心与“明星”,这使“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决定具有极强的个人中心倾向,如极具特朗普风格的“推特治国”,便是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塑造个人风格与行为偏好的重要表现。有学者通过对特朗普2016年5月至2018年1月共3478条推特的文本分析,发现其使用代词my, myself, I, me, mine的频率非常高,具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14]。本质上,无论是参选时期的宣传策略还是正式上任后的信息发布与传播,特朗普对社交媒体推特前所未有的依赖和推崇是其追求社会关系中高中心度的外在体现。特朗普试图通过推特直接发布政策,绕过并架空传统媒体,将自己置于美国政策信息网络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传统媒体沦为特朗普推特的转发者和分析者。“推特治国”体现出特朗普在极强中心度网络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的行政风格和政策偏好。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无法经过酝酿、系统讨论、试点等科学决策环节,仅为绝对信息中心特朗普的“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甚至存在短期与矛盾政策。

此外,特朗普对信息发布中心地位的追求也符合其对媒体和曝光度一贯的认知。在商人时期,特朗普就同媒体有较多交集,社会关系网

络中就存在大量的电视、广播、纸媒等行动者,如美国广播公司的芭芭拉·沃尔特女士、《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员保罗·戈德伯格和记者迪·魏德迈、《纽约杂志》的负责人蒂娜·布朗、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等。与媒体的交往使特朗普认识到,媒体是喜欢“大事件”的,职业天性使其关注到与众不同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或大胆且饱受争议的人。不论正面还是负面信息,只要经常被报道就能对商业发展产生利大于弊的宣传效果^{[15][167]}。因此,总统时期特朗普“推特治国”既能抢占新闻“首发权”的制高点,突破政府采取关键行动所受的媒体制约^{[15][168]},与传统媒体假新闻做斗争,又能够推动传统媒体跟进,增强曝光和话题度,从两个方面保持其信息中心的地位。

强中心度在催生特朗普个人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塑造了其爱国主义。经商时期的特朗普便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他曾在斗争后终于获准在位于加州洛杉矶市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场竖起旗杆并升起星条旗,并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旗骄傲地迎风飘扬,你也要永远铭记:有些东西是值得你去为之奋争的,美国国旗自然是其中之一”^{[12][78]}。特朗普先后在2016年和2020年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美国伟大”这些极具爱国主义色彩的竞选口号。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其个人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二者本质上都内嵌于其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特朗普爱国主义的实质是与其个人中心主义内在契合的美国中心主义,它既是特朗普个人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使得其个人中心主义外化为国家层面的体现,又与特朗普个人中心主义相互强化。无论是爱国色彩浓郁的竞选策略,还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墙”的移民政策,抑或是对华贸易战、“制裁”华为和Tiktok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相关

政策,都是在以“零和”思维维护美国的中心地位,也都与其早期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个人中心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第二顺位的,一旦其与个人中心主义相冲突,特朗普的爱国主义就会为其个人中心主义让位,体现为其对国家中心主义的牺牲和对自我意识、自我中心的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作为总统的特朗普面对这场全球化时代人类最严重的疫情,没有将美国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进行疫情防控,而是一直否认、淡化疫情,以保持自己的统治声望^[16],甚至出现反智主义倾向^[17],干预美国疾控中心对疫情的防控和报告^[18],声称新冠病毒是“骗局”,是“大号流感”,“拒绝戴口罩,可以直接向人体注射消毒液”^[19],将疫情作为攻击政敌、维护自信甚至是迎合民粹、为大选拉票的手段。

4. 与政府的交往和反建制的根源

特朗普作为零从政经验的“体制外”商人,反秩序、反建制与一定程度的反智特征是其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政策行为的重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与早期“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有关。在其208个节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有关政府的节点数量为22个,占比10.58%。这些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社会关系对后期“总统特朗普”的“反建制主义”和“反政治正确”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经商时期的社会交往经验,特朗普认为政府是低效率的、不善经营的,并且不具有“企业家精神”。例如,在沃尔曼溜冰场修建上,政府耗时7年花费上百万美元仍未竣工。特朗普接手之后,仅历时4个月并以占政府耗资一小部分的成本^{[15]263}就完成了该项目。特朗普发现在许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政府囿于科层制的等级原则和繁文缛节,难以发

挥主动性和积极性,集体决策形式不够科学,受到各个环节的制约,行政效率低下。

早期“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和经历是特朗普反建制的根源,使其更倾向于将政府作为新公共管理中“掌舵”而非“划桨”的角色,并且对现行官僚制度和政府存在不满,更乐于发挥领导人而不是政府的作用,具有鲜明的“反建制”色彩。

四、结语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来自特朗普两本自传的208个行动者所构成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探究特朗普在经商时期的社会关系网络,关注特朗普作为个体行动者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以及这种嵌入对后续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政策偏好上的影响和塑造,发现:首先,早期“小密度”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与特朗普政府大面积的“退群”行为可能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特朗普长期熟悉于网络关系的疏离与松散,才对国际合作框架持消极态度,进而使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内向周期特点;其次,早期凝聚子群密度较高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强化了特朗普的“内群体偏好”,主要体现为其人事任免上对政见不合的“异己”的撤职、对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等“亲信”的扶持和任命;再次,早期社会关系网络高中心度的“明星图”形式和特朗普的绝对中心地位极大地影响了特朗普对待媒体的态度和“推特治国”的理念,并且这种极强的个人中心主义同其强烈的爱国情怀一脉相承,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其“修墙”的移民政策和贸易战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后,其早期社会关系网络中与政府相关节点的较多联系和交往,促成了特朗普政策的“反建制主义”特点。

参考文献:

[1] 史安斌,王沛楠. 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美国

- 大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生成机制[J]. 新闻记者,2017(6):4.
- [2] 李猛. 从说服选民到塑造选民:特朗普“推特选举”的政治心理基础[J]. 国际论坛,2017(4):67.
- [3] 季乃礼,吕文增. 选民无知能否影响美国民主运行的理论纷争: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说起[J]. 学习论坛,2018(12):60.
- [4] 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 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7(2):15.
- [5] 季乃礼,孙佳琪. 特朗普对华心理探析:基于信念体系操作码的解读[J]. 理论与改革,2019(3):79.
- [6] 王一鸣,时殷弘. 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1):98.
- [7] 斯科特. 社会网络分析法[M]. 刘军,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34.
- [8] 林聚任. 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9] 周红云. 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4):46.
- [10] 阴玥,季乃礼,李雪超. 从特朗普的政治动机看美欧关系[J]. 国际研究参考,2020,21(1):1.
- [11] 伯特. 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M]. 任敏,李璐,林虹,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8.
- [12] 特朗普. 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M]. 蒋旭峰,刘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13] 谢弗. 社会学与生活[M]. 9版.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152.
- [14] 季乃礼,李赫楠. 从政治认知视角看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74.
- [15] 特朗普,施瓦茨. 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 [16] FUKUYAMA F. 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 [EB/OL]. (2020-03-30)[2020-09-1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hing-determines-how-well-countries-respond-coronavirus/609025>.
- [17] 冉冉. 反智、民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疫情治理[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3):53.
- [18] DIAMOND D. Trump officials interfered with CDC reports on COVID-19 [EB/OL]. (2020-09-11)[2020-09-1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9/11/exclusive-trump-officials-interfered-with-cdc-reports-on-covid-19-412809>.
- [19] CANCRYN A. Hundreds of health groups petition against Trump [EB/OL]. (2020-07-07)[2020-09-1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7/07/hundreds-health-groups-petition-trump-350154>.



引用格式:吴萌,霍延秀.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种认知风格的考察[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39-48.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5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39-10

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种认知风格的考察

Trump's integration complexity: an investigation of cognitive style

吴萌,霍延秀

WU Meng, HUO Yanxiu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作为一种认知风格,整合复杂性包含了分化和整合两个方面,是个体在理解、储存、转换和利用信息过程中所偏爱的、习惯化的思维结构。一般来说,整合复杂性较低的人遵循简单、一维的认知模式,处事倾向于“非黑即白”;而整合复杂性较高的人,善于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系统思考,扬长避短。通过 PCT 方式对特朗普的语言材料进行评估,发现他是 20 世纪以来整合复杂性最低的一位美国总统。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也会发生变化,在年度变化中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且在不同的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整合复杂性。这种变化更多地与情境压力有关,也有一部分人格因素。对特朗普政治行为进行考察,需要结合各类环境因素,低分化低整合的认知模式并不意味着领导的失败。

关键词:
特朗普;
整合复杂性;
认知风格;
情景压力

[收稿日期]2020-08-17

[作者简介]吴萌(1992—),女,河南省汝南县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心理学;霍延秀(1994—),女,天津市人,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在政治心理学中,对领导人心理的研究一直是热点和重中之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政治人物自带光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领导人的认知、人格、情感等心理因素对一国内政和外交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与普通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对众多政治领导人物的研究中,美国总统成为最为频繁的研究对象,国内外都可以找到大量相关文献。而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1月宣誓就职以来就经常占据新闻头条,其语言和行事风格常引起人们的争议。然而,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心理学家对特朗普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人格特质、动机意向、操作码、领导风格、价值模式等方面,对其整合复杂性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学视角运用整合复杂性理论对特朗普的认知模式进行探究,以期对其政治心理有进一步的发现。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

1. 整合复杂性的内涵

整合复杂性包含两个认知变量:分化和整合。所谓分化,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可以认知和考察对象的层次和维度。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信息处理者,在面对既定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分析对象的情况下,越是能够区分大量信息的特征;认识的维度越多,个体的认知情况越复杂。所谓整合,是指不同的特征与维度之间复杂的联系。整合主要关注的是各个特征或维度之间是孤立的成序列的关系,还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或灵活的联系^[1]。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对整合复杂性研究最多的有两个代表性人物:菲利普·E. 泰特洛克和皮特·休德菲尔德。两位学者相互合作或与他人合作,对整合复杂性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泰特洛克看来,整合复杂性是整合性与复杂性的结合,复杂性体现为看待问题的层次,

整合性体现为众多维度是否能够联系在一起。整合复杂性关注的是对研究对象做出多层次的、复杂的区分,即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概念整合解读事件,并能够把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用于自己的决策^[2]。

2. 整合复杂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1) 整合复杂性的认知分层

整合复杂性是对认知结构的一种判断,主要基于对认知过程的解构,通过认知分层进行微观语义解读以获悉个体认知模式。学者们一般将整合复杂性分为两个维度、七个层次。两个维度即分化与整合,七个层次是对分化与整合的七种组合。

第一个层次为“无分化+无整合”,即个体依靠的是一维的价值评定规则,或明确肯定和接受,或明确否定和拒绝,坚持“非黑即白”的信息处理模式。

第二个层次是“低分化+无整合”,表示个体对不同观点或维度的潜在或有条件接受,但是没有明确地发展替代维度或观点,也没明确地指出或命名。

第三个层次是“中高分化+无整合”,个体能够清楚地说明至少两种处理相同信息或刺激的不同方法,但却没有考虑这些维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第四个层次是“中高分化+低整合”,主要指有能力辨别出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维度,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隐形承认。其对多维度的整合是不明显的,常常以一种试探性的、不确定的方式进行表达。

第五个层次是“中高分化+中度整合”,个体既能辨别两个或两个以上维度,又能对其中的两者进行交互式看待,这种整合是明显的,主要包括相互影响、协商、因果归因和综合等。

第六个层次是“高分化+中高整合”,表明个体可以处理多维度的图式,能通过对各维度

进行比较等来做出具体解释,并能隐含地提出一种全局性的观点或概括。

第七个层次是“高分化+高整合”,在多维度的基础上,各个指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体能对其进行系统阐述,并提出一个包含各个维度之间紧密联系的总体观点。

第一、三、五、七个层次为主要层次,而第二、四、六个层次是过渡层次。

(2) 整合复杂性的认知风格定位

作为一种认知风格,整合复杂性主要体现了个体在理解、储存、转换和利用信息过程中所偏爱的、习惯化了的态度和方式。认知风格研究分为以认知为中心的研究、以人格为中心的研究和以活动为中心的研究三类。事实上,人类的思维方式最初被研究者认为是一种人格特征,其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如场独立性、解释性风格等。受凯莉个人构念理论的启发,早期研究将整合复杂性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特质。然而,后续研究发现整合复杂性对压力、价值冲突等非常敏感。整合复杂性也会受到即时外在环境的影响,具有状态性的特征^[3]。因此,现阶段以认知为中心的整合复杂性研究一方面承认其稳定性,另一方面又重视其状态性特征。

(3) 整合复杂性的影响因素

其一,紧张环境。紧张环境主要指革命、战争和国内紧张形势。有学者研究发现:信息处理方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在无压力时信息处理方式简单。适当的紧张环境下信息处理方式的复杂性达到顶点,超过了忍受的极限,信息处理方式的复杂性就会下降^[4]。

其二,价值倾向。整合复杂性的高低与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一般情况下,极端的意识形态比温和的意识形态更容易简单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有更少的

复杂性^[5]。

其三,人格特质。外向性人格与整合复杂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权力动机与整合复杂性是负相关关系;具有自恋和威权主义人格的人倾向于一维和极端的认知模式,表现出更低的整合复杂性。

3.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假设

从经验角度来看,特朗普上台面临着经济、就业、医疗改革、贸易逆差等压力情境,为解决这些矛盾,其采用了相对极端的政治策略,如推翻奥巴马医改方案、退出国际性协定、与中国打贸易战等。作为共和党人,特朗普又兼具保守主义倾向。在日常行为中,他表现出极强的自我中心;他雷厉风行,果断坚决,不允许歧义;他满嘴“跑火车”,经常发出夸张而富有争议的言论。但是,他又经常否定自己,前后不一致,迅速转变策略。

结合上述理论,我们初步假设特朗普是一个具有较低整合复杂性的总统。但是,他依然遵循整合复杂性的发展规律,在其任期内表现出随环境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趋势。

二、研究与测量方法

1. PCT 内容分析法

整合复杂性分析有两大路径,一是对当事人进行直接测量,如心理学上常用的比厄里的库格测验、斯科特的客体分类测验和克罗基特的角色分类问卷;二是使用语言材料进行内容分析。由于距离、年龄、历史、语言或意愿等原因,很少研究能够对政治领导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测量、面对面访谈或是问卷调查,因此,我们此次使用语言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即采用“领导者远程评估”方式。

我们对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研究使用 PCT (Paragraph Completion Test, 缩写为 PCT) 内容分析法。所谓 PCT,主要针对研究对象的语言

材料,抽取若干段落进行认知结构分析,这些段落的长度一般在25—170字,由训练有素的评分者对每一段落语言材料进行人工测评,也可以使用成熟软件进行机测。

2. 评价标准

依据整合复杂性的七个层次,泰特洛克和休德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7分评价标准,即IC评分(见表1),并编写了一份可供评分者参考的整合复杂性编码手册。

表1 IC评分表

分数	评价标准
0	无计分文本:在样本随机选出之后,可能存在无计分文本,这些文本需要被鉴别和删除。无计分段落表示作者推断或决策的规则结构不明显,包括陈词滥调、讽刺挖苦、引用、定义,以及纯描述性语言,对理解上存在障碍的段落也不得分。
1	无分化,无整合。对观点或维度的明确肯定或否认,或是作者承认存在着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却没有认真考虑或审查就放弃。或是为文本进行时间排序组合,或是列举清单,但只为证实某一个观点。包含“绝对、所有、总是、当然、不断、确信、完全、永远、不可能、不可辩驳、不可逆转、毫无条件、毫无疑问”等词语。
2	有条件地接受其他观点和维度;假设结果;规则的例外;歧义的容忍;认识到替代性观点或维度,但未详细说明,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包含“但是、然而、尽管、可能、几乎、通常”等词汇。
3	有多个备选方案;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的选择和条件;概率性陈述;新旧观点的时间转变。包括“可选、非此即彼、另一方面、同时”等陈述。
4	有多重视角或多个维度,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隐形承认。包括对判断的保留、维度间的张力和上位说法的表述。
5	有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选择的条件,且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具有明显整合的趋向。包含“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协商、妥协、均衡、平衡、权衡、归因、综合”等意味。
6	有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选择的条件,具有明显整合的趋向,且整合表示为对系统关系的具体解释和全局观点的隐形交代。包含结果比较、系统分析、假设检验等。
7	多维度之间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并提出了一个总体的原则或观点。既包括结果比较、系统分析,也包括分层整合或是对相互冲突目标之间的复杂权衡。

3. 测量方法

(1) 材料收集与抽样

我们搜集的特朗普的语言材料主要来源于其公开讲话,包括演讲、访谈、宣告、会议和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等,共搜集到其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的1250篇公开稿。对每篇公开稿的段落进行日期和数字编码,并进行随机抽样,剔除无关文本、无计分文本,共获得668个样本。

(2) 编码与计分示例

编码过程采取“人工+机测”的方式。人工编码者已经过两年多的相关训练,编码过程严格依照评分细则进行操作;机测采用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社会科学自动化公司开发的一款计算机测量平台。二者相结合获得最终评分结果,其中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化评价采用折中处理方式。

为清晰呈现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我们列出以下计分示例。

1 分示例:

当你在家里打这场仗的时候,我们正在和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医生和研究人員一起工作。我们正在竞相开发新的方法、治疗方案和最终的疫苗来抵御病毒。我们正在取得很大的进步。我认为,在医学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成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2020年4月3日)

解析:该段落使用了明确肯定的方式,如“最好”“新的”“很大的”,没有对一个事物进行多维度分析,也没有冲突观点的出现。

2 分示例:

如果没有国会议员为通过《国防授权

法案》而努力工作的话,今天的签字仪式就不会在这里举行了。我想表彰女议员伊莉丝·斯特凡尼克,她所代表的地区包括了德拉姆堡。我必须告诉你关于伊莉丝的事。她给我打了那么多次电话。我说,我不想接她的电话。她说她希望我能到这里来。我说,我不能,我们会改变很多日程安排。但这不适用于她。她没有停下来。现在我来到这里了。(《特朗普总统在 H. R. 5515 签署仪式上的讲话》,2018 年 8 月 13 日)

解析:该段落第一句是假设结果的条件句,出现了反事实推理,隐含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行为的可能性。而后面语句主要是对事实的陈述,没有计分意义。

3 分示例:

事实上,这是一个针对中产阶级的税收法案;这是一个针对就业的税收法案,它会让很多公司进入;这是一个针对商业的税收法案,它会创造就业机会。我们要减税,从 30 降到 20。(《特朗普总统和商界领袖在税制改革行业会议前的讲话》,2017 年 10 月 31 日)

解析:该段落从三个方面表达了税收法案的不同针对性,但三者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与整合。

4 分示例:

我认为欧盟——我们会很快与他们会面——他们想看看他们是否能解决问题,这会很好。如果我们能解决问题,那会是积极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问题,那也会是积极的。这有我们的原因。(《特朗普总统和荷兰王国首相吕特在双边会晤前的讲

话》,2018 年 7 月 2 日)

解析:该段落第一句为肯定句,但重心在后面,对于“我们”是否能解决问题都会是积极的,表现出特朗普对这件事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而最后一句是要对正反两个方面考虑的原因进行综合,但是没有明确表示出来,故而给予 4 分。

5 分示例:

中国必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他们想调查,他们可以调查。如果他们不想调查,他们不必。坦白地说,就我而言,如果中国想调查,我认为那很好。如果他们不想,我认为那也很好。这取决于中国。(《特朗普总统在海军一号出发前的讲话》,2019 年 10 月 10 日)

解析:该段落的重心是后半部分。对于中国是否调查,特朗普都认为很好,表示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因为是否调查取决于中国。这里有一个依赖于情境的高阶归因,故而出现了二者的明确综合。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次测量结果,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分值最高为 5 分,并未出现 6 分和 7 分的情况,故不作展示。

三、结果与讨论

1. 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结果分析

(1) 呈现出低分化低整合的总体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的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5,平均得分为 1.33,总体水平较低,显示了较低的分化和整合。

特朗普的语言中多现极度肯定、极度否定或比较夸张的修辞手法,very、certainly、absolutely、all、always、must、great、deeply、wonderful、

most、no、never、can't、have to 等词汇或短语经常出现,这表明特朗普本人基本遵循简单、一维的思维方式。例如,在医改问题上,他用非常直白的态度反对奥巴马的医疗政策,经常说,“奥巴马医保已经死亡”,并尖锐指责奥巴马医改为“灾难”。在退伍军人福利的问题上亦是如此。特朗普往往表现得比较自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当遇到与其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其倾向于直接反驳并遵循自己的意愿,表现出了明显的低分化低整合特征。

(2)变化中的整合复杂性

特朗普自就任总统以来,其整合复杂性并非一成不变,其变化趋势见图1。由图1可知,特朗普2017年整合复杂性均值为1.34,2018年为1.40,2019年为1.31,2020年前六个月为1.21。特朗普就职第一年,其整合复杂性水平

接近总平均值,2018年达到了峰值,2019年开始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2020年跌到最低。

以其每月整合复杂性的平均值绘制详图见图2。由图2可知,特朗普整合复杂性波线起于低值也终于低值。结合原始材料,2017年头三个月为特朗普任职初始阶段,各项事业刚刚起步,特朗普公开讲话的内容多涉及礼仪或是常例,表现出了更多的雄心和赞美或是延续竞选阶段的批判语气。而2020年3、4、5月份的发言几乎清一色与医疗有关,特朗普几乎每日都要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疫情和政府工作,并接受提问。面对疫情压力和记者诘问,特朗普表现出比较极端的语言风格,一方面夸大自身的作为,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否定或是逃避。

此外,图2中还出现了两个峰值和两个谷值,其中,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2018年5月和2018年7月;两个谷值分别出现在2017年9月和2020年6月。2018年5月,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达到最高值,其公开讲话的内容涉及各州和地方政务、税制改革、法律法案、内阁会议、医疗保障、教育体育等。2018年7月的峰值稍低于2018年5月,其公开讲话的内容涉及军事赞赏、法官任命、内阁会议、国民大会、法律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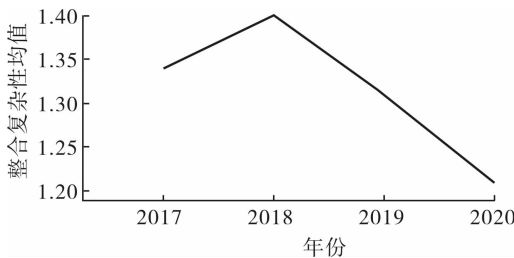


图1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年度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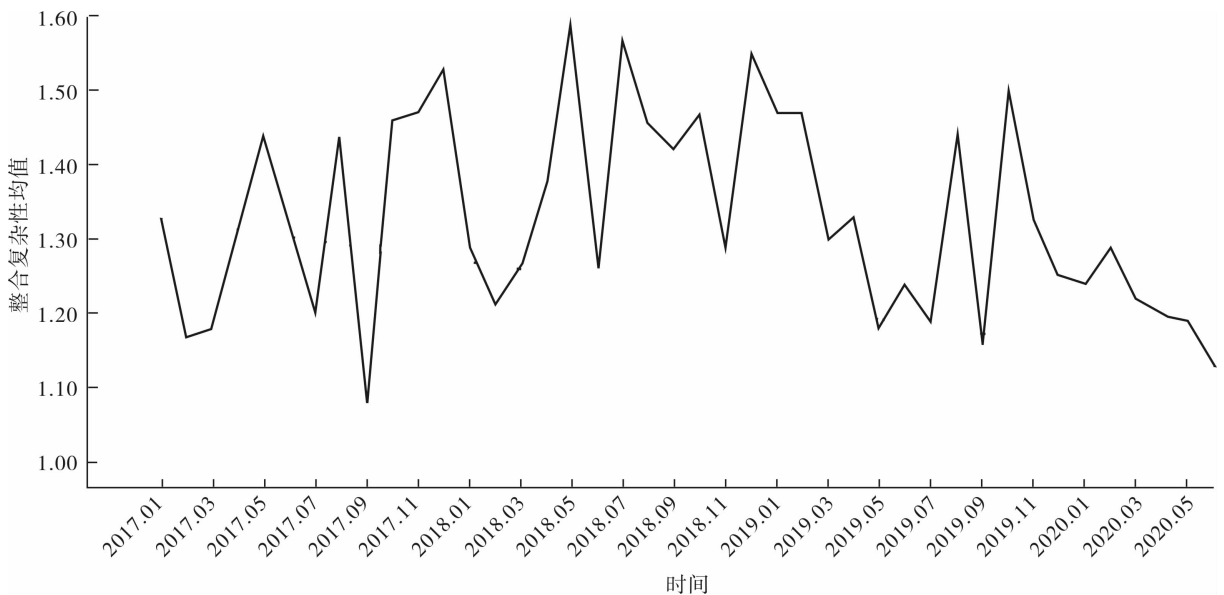


图2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月份变化趋势图

经济就业、移民、北约峰会等。2017年9月,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达到最低值,结合原始材料,我们发现9月的29个公开讲话文本中有将近60%的内容都与外交活动有关,此外还包括医疗、就业、飓风、治安等。而2020年6月特朗普公开讲话的议题类型与2017年9月的类似,均包含了大量的外交议题。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特朗普在内政上的整合复杂性要高于其在外交方面的整合复杂性。

(3) 主题维度的整合复杂性

整合668个有效样本,我们对特朗普的公开讲话进行了主题聚类,按照样本量的多少,将核心议题进行了排序(见表2)。

表2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主题排序

议题	均值	议题	均值
能源环境	1.72	移民边境	1.44
州政地政	1.64	经济就业	1.39
基础设施与技术	1.58	医疗保障	1.38
税制改革	1.55	议会党政	1.37
法律法案	1.50	外交	1.37
内阁会议	1.46	中美关系	1.36
土地农业	1.45	国家安全与国防	1.29

由表2可知,特朗普在“能源环境”“州政地政”“基础设施与技术”“税制改革”等方面表现出了相对较高的整合复杂性,而在“国家安全与国防”“中美关系”“外交”等方面显示出了较低的整合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事关“能源环境”“州政地政”“基础设施与技术”方面,特朗普面临着较小的压力,其思维方式反而更加复杂;而“税制改革”“经济就业”“医疗保障”和“移民边境”问题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主要关注而具有一定争议性的问题,其在这些方面的整合复杂性处于中高水平。对于外事问题,特朗普一向强硬,无论是指责欧盟,与中国打贸易战,还是退出多个国际性组织,其总是表现出自我中心式的简单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美国的体制问题,其某些想法未能真正付诸实践,但这

并不影响我们对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做出判断。

2. 讨论

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在历届总统中处于什么水平?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变化?这又与特朗普的动机、人格和所处的情境有怎样的联系?下面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1) 历史对比:美国总统中的世纪最低

虽然政治心理学将整合复杂性分为7个层次,而特朗普又处于较低层次,这是否意味着其在美国历届总统中的排名也比较低?为此,我们参考皮特·休德菲尔德和费利克斯·托梅斯的研究,获得了美国历届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分值(见表3)。

由表3可知,自华盛顿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均值都没有超过3分,最高者为肯尼迪(2.18),其次是塔夫脱(2.17)、哈定(2.15)、菲尔莫尔(2.13),而上届总统奥巴马排名第五(2.12)。约翰·泰勒最低(1.25),波尔克倒数第二(1.28),特朗普倒数第三(1.33)。如果排除约翰·泰勒(1841—1845年任职)和波尔克(1845—1849年任职)这两位早期美国总统,自20世纪以来,即罗斯福总统以来,特朗普是整合复杂性最低的一位总统。

(2) 动机考察:非典型性相关

政治动机一般被看作推动个人参与政治达到某种目标的内在动力。在整合复杂性与政治动机之关系的考察中,许多学者认为权力动机与整合复杂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权力动机的提升,个体更倾向于简单、一维的思维方式,反之亦然。简单来说,权力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关注如何掌控权力。例如,在国际对抗中,战争爆发之前经常会出现权力动机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整合复杂性便会下降。特朗普的权力动机与整合复杂性之间

表3 美国历届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得分

总统	整合复杂性	标准差	样本量
乔治·华盛顿	1.82	0.84	19
约翰·亚当斯	1.86	0.76	18
托马斯·杰弗逊	1.94	0.83	16
詹姆斯·麦迪逊	1.71	0.61	17
詹姆斯·门罗	1.75	0.79	18
约翰·昆西·亚当斯	1.60	0.62	20
安德鲁·杰克逊	1.75	0.79	18
马丁·范布伦	1.79	0.88	17
约翰·泰勒	1.25	0.49	18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	1.28	0.57	20
扎卡里·泰勒	1.70	0.98	5
米勒德·菲尔莫尔	2.13	0.77	12
富兰克林·皮尔斯	1.83	0.66	18
詹姆斯·布坎南	1.35	0.52	20
亚伯拉罕·林肯	1.82	0.67	14
安德鲁·约翰逊	1.89	0.68	19
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1.50	0.66	17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1.37	0.37	19
切斯特·艾伦·阿瑟	1.44	0.57	18
格罗弗·克利夫兰	1.55	0.65	20
本杰明·哈里森	1.68	0.61	17
威廉·麦金莱	1.38	0.67	16
西奥多·罗斯福	1.81	0.99	18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2.17	0.94	12
伍德罗·威尔逊	1.61	0.59	14
沃伦·盖玛利尔·哈定	2.15	0.63	10
卡尔文·柯立芝	2.05	0.65	11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1.61	0.49	19
富兰克林·罗斯福	1.88	0.69	20
哈里·S.杜鲁门	2.09	0.62	17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1.68	0.67	19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2.18	0.61	14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2.10	0.84	20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2.03	0.82	20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1.87	0.83	15
吉米·卡特	1.83	0.80	20
罗纳德·里根	1.90	0.74	20
乔治·布什	2.00	0.78	15
比尔·克林顿	2.03	0.79	19
乔治·布什(小)	1.95	0.71	20
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2.12	0.92	272
唐纳德·特朗普	1.33	0.60	668

注:此表参照《Integrative complexity of 41 U. S. presidents》和《Two years of ups and downs: Barack Obama's patterns of integrative complexity, motive imagery, and values》两篇文章中的数据绘制而成。

具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 = -0.12, p = 0.731$),具体情况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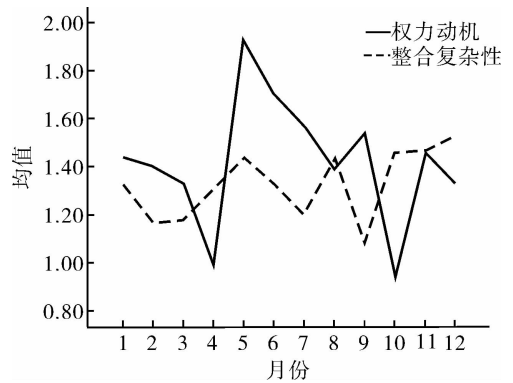


图3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与权力动机关系(2017年)

由图3可知,1—2月和4—7月,特朗普整合复杂性与权力动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他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特朗普身上,权力动机是否能够影响其整合复杂性还有待商榷,但更多的趋向是一种负相关波动。

(3)人格映照:反常与正常之间

人格特质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变量,长期以来被用来区分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个体的人格特质差异又与认知的整合复杂性有什么关系?政治心理学者费利克斯·托梅斯通过对41位美国总统的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特质普遍与整合复杂性相关,且是一种正比例关系($r = 0.36, p < 0.05$);与此同时,宜人性也显示出正向但不显著的相关性($r = 0.24, p = 0.197$)^[6]。为探究特朗普的人格特质,我们采用了心理学上常用的“大五人格”量表。

用专家评价法对特朗普的大五人格进行测量,结果显示,特朗普有两个特质最为显著:一是高外向性,一是低宜人性。这一结果与国外学者D. 麦克亚当斯的结论不谋而合,他同样认为,特朗普展现了一个你不会想到的美国总统的特质:“sky-high extroversion”和“off-the-chart low agreeableness”^[7]。特朗普的外向性较高,这就意味着其以外向、活跃和社会主导的方式

扮演自己的角色,其是一个精力充沛、不能保持安静的人,其乐意在集会、采访、社交媒体上与其他人不断互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外向的人却不随和。可能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那样,在公共舞台上经常公开地表示不同意。他从不吝啬赞美自己,却不善于同情;他言辞激愤,态度却能瞬间转变。

按照费利克斯·托梅斯的逻辑,个体外向性越高,其整合复杂性越高;宜人性越低,其整合复杂性越低。这似乎与特朗普的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特朗普虽然具有较高的外向性,但是其整合复杂性却很低,这似乎与其较低的宜人性相关。低宜人性的特质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淹没了高外向性对整合复杂性的调节作用。因而,特朗普一反常态,与美国历届总统相比,较高的外向性并没有提升他的复杂性思维。但低宜人性的特质却拉低了其整合复杂性,这又符合二者关系的常态。因此,在考虑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变化因素时,低宜人性的性格特质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4) 情境融合:议会控制和议题压力

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境因素,也就是情境压力,情境因素对整合复杂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整合复杂性是随着怎样的情境压力而变化。从宏观角度来看,特朗普主要面临着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社会矛盾和外部战争与和平的情境压力。内部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指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自由与保守之争,这种斗争的具体形态又表现在对议会的控制上。而社会矛盾主要反映了政府施策与人民需求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内的各种政治议题,如经济就业、医疗保障、税制改革等。至于美国当下的战争与和平情境,一方面反映在中东地区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上,另一方面反映在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上,这二

者也可转化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外交”等议题。也可以说,特朗普所面临的情境压力主要反映在对议会的控制和各个议题带来的情境压力上。

议会控制,是指民主党、共和党及其他党派对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席的控制。长期以来,议会控制的情况大概有三种模式:一是总统所在党派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均占据多数议席;二是总统所在党派和反对党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据多数;三是总统所在党派在两院中均不占多数。特朗普任期的前两年,其所在党派在两院中均占多数,这种情形无疑为特朗普的施政带来便利。正是在这两年里,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以上,达到了较高的状态。然而经过中期选举以后,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党派斗争更加激烈,受其影响,2019年以来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直在降低,这种情境无疑助长了特朗普对问题的一维处理模式。

对于不同的议题,特朗普所面临的压力不同。以“经济就业”为例,我们对比了美国每月的失业率与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月均值,结果发现二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r = -0.058, p = 0.726$),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就业”议题对特朗普的压力是有限的。在“国家安全与国防”议题上,特别是基于中东的紧张局面,特朗普更是情绪激愤,多次下达军事命令。在“外交”议题上,和平环境下的合作与交流本应为特朗普提供更多复杂思考的机会,但是其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外界对美国的不善,这种紧张而富有攻击性的态度促使其在中美贸易中展开攻势,在国际活动中停止步伐,并不断谴责联合国、世卫组织要对美国负责,由此,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在相关问题上表现出较低的整合复杂性。总之,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

变化是与其情境压力分不开的,不同的压力会带来不同的思考效果。

四、结语

整合复杂性作为一种认知风格,主要反映了行为主体偏好性和习惯化的思维结构。一般来说,整合复杂性较低的人遵循简单、一维的认知模式,处事倾向于“非黑即白”;而整合复杂性较高的人,善于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系统思考,扬长避短。特朗普在其执政过程中整体表现出了较低的整合复杂性。但是,更低的整合复杂性就意味着更多的失败吗?情况并非如此。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复杂的综合,而有些问题则要求简单聚焦。特别是在危急时刻,低整合复杂性反而会促使决策者更加果断坚决,抢占先机。费利克斯·托梅斯通过对41位美国总统的整合复杂性的研究发现:低整合复杂性有助于总统竞选或连任。与管理政府相比,简单的辞令在竞选模式下更具有战略成功性。那些获得连任的总统往往会在竞选前简化修辞^[6]。

低整合复杂性并不意味着领导行为的失败,对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的分析,我们还应综合情境、动机、人格等因素。只有整合复杂性与

环境相匹配才是成功领导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SUEDFELD P, TETLOCK P.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f commun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77(1): 169.
- [2] TETLOCK P. Cognitive style and political belief system in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4(2): 366.
- [3] 刘啸蔚,陈涛,张鹏,等. 认知综合复杂性:评估方法及相关研究[J]. *心理研究*, 2020(1): 8.
- [4] SUEDFELD P. Indices of world tension in the atomic scientists [J]. *Political Psychology*, 1980(3/4): 114.
- [5] 季乃礼. 领导心理学[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 179.
- [6] THOEMMES F.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f 41 U. S. presidents [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7(2): 194.
- [7] MCADAMS D.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J]. *The Atlantic*, 2016(5): 76.



引用格式:花俊国,苏贵芳,郎一峰. 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优化区间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49-56.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6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49-08

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优化区间研究

Research on optimal range of enterprise innovative investment intensity

花俊国,苏贵芳,郎一峰

HUA Junguo, SU Guifang, LANG Yifeng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创新投资是实现企业价值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阈值回归模型研究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阈值效应,其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随创新投资强度的增加呈现逐渐减弱的结构性变化趋势。进一步考察异质性条件下创新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民营企业或多元化经营程度较高的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更高的效率。

关键词:
创新投资;
优化区间;
阈值模型

[收稿日期]2020-10-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73044);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2400410220)

[作者简介]花俊国(1963—),男,河南省新郑市人,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管理会计、企业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对于微观经济主体来说,创新投资有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快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进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企业的共同创新发展更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智造”之路的基石。企业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多元化需求,有效地将创新投入转化为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发展动能的转换和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创新投资通过激发企业生产潜力有效促进绩效的提升^[1],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2-3];朱乃平等^[4]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可降低经营成本,直接促进短期绩效的提高,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企业长期绩效具有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5],并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倒U形关系^[6]。由于创新投资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特点,其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哈特曼等^[7]研究发现,当研发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绩效并不会同等比例增加。有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当研发投入强度未超过临界值时,其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超过临界值后正向作用消失^[8-9];而马艳艳等^[9]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呈U形关系。但宋在科等^[10]研究发现,企业绩效会随创新投资力度的增加而增加。陈建丽等^[11]发现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阈值效应;焦然等^[12]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绩效的影响存在门槛现象,而企业社会责任对这种门槛现象具有缓解作用。

部分研究指出,企业绩效与创新投资强度

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鲜有学者对创新投资强度的最优区间进行研究,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技术行业,研究的全面性、普适性、一致性较弱。鉴于此,本文拟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阈值回归模型刻画创新投资与企业绩效的结构性变化特点,探究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最优作用区间,以期为企业制定创新投资规划和政府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理论分析

创新投资通过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最终形成独有的核心技术与产品,可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二是提高产品的销售收益。创新投资通过改进现有生产流程,以期在不改变产品效用的前提下,从生产环节中获取超额利润。首先,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研发人员基于对生产要素投入情况的分析寻找最优的要素配置方案,通过要素替代减少高价原材料的使用,以降低投入成本。其次,创新活动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流程、加快高新技术设备的研发与应用,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产品成本。在销售环节,研发人员应分析市场发展趋势、消费者需求变化,创造具有差异化优势、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不断拓展新市场,促进销售收益的提升。

上述分析表明,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作用可能不会持续维持,而是会随着创新投资强度的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亚历山大等^[13]的研究表明,增加创新投资不一定能持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销售收入,并提出可以用创新效能曲线刻画创新投资所带来的这种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创新效能曲线可以合理地诠释为何一些企业不断追加研发投入,扩大创新投资规模,但企业绩效并没有

大幅度提升,甚至可能出现亏损的现象。究其原因,是企业进行投资前会详细分析项目的成本收益情况,在计算每个项目投资回报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排序,根据择优而选的原则,决策主体会先实施投资回报收益较高的项目,因此在创新投资的初始阶段,企业绩效有显著增加的态势,但随着创新投资强度加大,一些资金用于投资回报率低的项目,则绩效会逐渐降低。此外,作为一种要素投入活动,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很可能会遵循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据此本文认为: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影响,且随着创新投资强度的增加,创新投资效率逐渐降低。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 模型构建

阈值回归模型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变化模型,函数模型根据阈值的划分具有分段线性的特征,本文借鉴汉森^[14]提出的阈值回归思路进行实证研究,以面板单阈值回归模型为例,模型表达式为:

$$Y_{it} = \alpha_i + \beta_0 X_{1it} + \beta_1 X_{2it} I(q_{it} \leq \gamma) + \beta_2 X_{2it} I(q_{it} > \gamma)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表示观测个体; t 表示时间; α_i 表示个体效应; β 表示参数向量; X_{2it} 为区间相关的依赖变量,即受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 X_{1it} 表示除 X_{2it} 外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的控制变量; I 为指标函数; q_{it} 为门槛变量; γ 为待估门槛值;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汉森的研究,本文以创新投资为阈值变量,构建创新投资与营业毛利率的面板阈值模型,单阈值模型为:

$$Gpm_{it} = \alpha_i + \beta_0 X_{it} + \beta_1 Rdi_{it} I(Rdi_{it} \leq \gamma) + \beta_2 Rdi_{it} I(Rdi_{it} > \gamma) + \varepsilon_{it} \quad (2)$$

若存在两个阈值,则双阈值模型为:

$$Gpm_{it} = \alpha_i + \beta_0 X_{it} + \beta_1 Rdi_{it} I(Rdi_{it} \leq \gamma_1) +$$

$$\beta_2 Rdi_{it} I(\gamma_1 < Rdi_{it} \leq \gamma_2) + \beta_3 Rdi_{it} I(Rdi_{it} > \gamma_2) + \varepsilon_{it} \quad (3)$$

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营业毛利率

企业实施创新投资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对生产方式与生产技术的改进以降低经营成本或增加销售收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最终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营业毛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收入和运营成本,较为合理地衡量企业绩效情况。

解释变量(阈值变量):创新投资

由于企业规模不同,同时研发投入又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特点,直接选用研发投入衡量企业的创新投资强度不具备可比性,故本文借鉴程宏伟等^[15]的研究,采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测度企业的创新投资强度。

控制变量

鉴于企业的营业毛利率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故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企业年龄、速动比率。研究变量说明见表1。

(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按照以下原则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和处

表1 研究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营业毛利率(Gpm)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创新投资(Rdi)	研发投入 / 营业收入
	公司规模($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Lev)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控制变量	股权集中度(Oc)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企业年龄(Age)	当年年份 - 公司成立年份 + 1
	速动比率(Qr)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理:一是剔除金融保险类、处于ST状态的企业;二是剔除同一年度内企业数量低于两家的行业;三是剔除在数据区间内发生过重大事件和业务变更的企业;四是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由表2可知,研究期间内样本数据的绩效测度指标营业毛利率(*Gpm*)最小值为-0.0054,最大值为0.8086,说明企业绩效相差较大;而营业毛利率均值为0.2598,说明研究样本中大部分企业绩效仍维持在较低水平。创新投资强度(*Rdi*)的最小值为0.0002,最大值为0.246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创新投资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同企业中分布不均匀。各企业间数据的差异性表明研究创新投资强度的优化区间对于提高企业绩效和竞争力至关重要。其他变量与现有文献统计结果基本一致。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量
<i>Gpm</i>	0.2598	0.1714	-0.0054	0.2218	0.8086	6013
<i>Rdi</i>	0.0372	0.0388	0.0002	0.0308	0.2461	6013
<i>Size</i>	22.4629	1.2773	19.8942	22.2800	26.1468	6013
<i>Lev</i>	0.4598	0.1949	0.0605	0.4588	0.9031	6013
<i>Oc</i>	0.3431	0.1431	0.0848	0.3214	0.7539	6013
<i>Qr</i>	1.5465	1.7250	0.1394	1.0786	17.3300	6013
<i>Age</i>	18.4470	5.1095	5.0000	18.0000	38.0000	6013
<i>Soe</i>	0.4959	0.5000	0.0000	0.0000	1.0000	6013
<i>Ahhi</i>	0.2564	0.2427	0.0000	0.1729	0.8554	6013

2. 面板阈值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面板阈值回归之前,首先对阈值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确定创新投资对企业营业毛利率是否存在阈值效应以及阈值个数。阈值效应检验的原假设为 $\beta_1 = \beta_2$,不存在阈值效应;备择假设为 $\beta_1 \neq \beta_2$,存在阈值效应。

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单阈值效应的*P*值为0,表明应拒绝不存在阈值的原假设,则至少应存在一个阈值;双阈值效应的*P*值为0.05,表明应拒绝存在单阈值的原假设,至少应存在两个阈值;三阈值效应的*P*值为0.49,表明接受存在双阈值的原假设,拒绝存在三个阈值的备择假设,因此应采用双阈值模型,两个阈值分别是0.0422和0.1618。在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对研究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阈值回归,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作用程度被划分为三个区间,当创新投资强度不超过0.0422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系数为0.9321;当创新投资强度在0.0422~0.1618时,创新投资同样对营业毛利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系数为0.5446,促进作用程度较第一个区间显著降低;当创新投资强度超过0.1618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呈现出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创新投资强度的增加,其对营业毛利率的影响作用程度逐渐降低,甚至没有显著的影响,该结果与理论假设相符,证明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倾向。因此,0.0422~0.1618为企业创新投资强度

表3 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i>F</i> 值	<i>P</i> 值	BS次数	显著性水平		
					10%	5%	1%
单阈值检验	0.1618	84.29***	0	300	15.4186	17.7778	25.3746
双阈值检验	0.0422	24.11***	0.05	300	16.6159	24.0442	83.2140
三阈值检验	0.0225	9.03	0.49	300	16.9177	21.5592	101.5454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的优化区间,此时创新投资仍可显著促进营业毛利率的增加,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越趋近0.1618,营业毛利率越高。当创新投资强度低于第一个阈值0.0422时,即使在此区间内创新投资的效率较高,继续增加投资仍存在营利机会;若创新投资强度高于第二个阈值0.1618,其对营业毛利率的促进作用将消失,继续增加投资并不会推动企业绩效水平的显著提升,而且会损失企业资源,这一范围为创新投资的无效区间。

3. 企业异质性特征下创新投资对绩效的影响

以上分析了全样本下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阈值效应,下面将从产权性质、多元化程度具体探究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表4 阈值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β 值	标准误
$Rdi(Rdi \leq 0.0422)$	0.9321***	0.2042
$Rdi(0.0422 < Rdi \leq 0.1618)$	0.5446***	0.1552
$Rdi(Rdi > 0.1618)$	-0.0285	0.1712
Lev	-0.1632***	0.0244
$Size$	0.0201***	0.0071
Qr	0.0045*	0.0025
Oc	0.0001	0.0004
Age	0.0009	0.0011
$_{-}cons$	-0.1655	0.1422
N	6013	
R^2	0.108	

(1) 产权性质

由于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内部管控方式与经营目标不同,创新投资对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非国有企业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基于长期发展角度会采用绩效考核方式对管理层实施的创新活动进行监督与评价,激励管理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因此会更加关注创新投资强度与资金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层通过政府选配,政府部门同时作为委托人和代理人,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较难体现,同时国有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资金补贴,如果监督不到位会降低其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导致创新投资的产出效果偏低。本文按实际控制人不同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研究其创新投资对其营业毛利率的不同作用效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分别见表5、表6。

由表5可知,国有企业单阈值效应检验的 P 值为0.01,而双阈值效应检验的 P 值为0.19,未通过双阈值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在国有企业存在一个阈值0.0817。由表6可知,非国有企业单阈值效应和双阈值效应分别在1%、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三阈值效应检验的 P 值为0.183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存在两个阈值,分别是0.0472、0.1360。

表5 国有企业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F 值	P 值	BS 次数	显著性水平		
					10%	5%	1%
单阈值检验	0.0817	26.53***	0.01	300	14.7650	18.5485	26.0640
双阈值检验	0.0026	12.73	0.19	300	19.0030	31.2125	59.0519

表6 非国有企业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F 值	P 值	BS 次数	显著性水平		
					10%	5%	1%
单阈值检验	0.1360	51.50***	0	300	16.2617	19.0995	25.8277
双阈值检验	0.0472	23.20*	0.0533	300	15.5132	23.7279	63.6231
三阈值检验	0.2060	12.92	0.1833	300	14.5257	18.5190	65.8002

表7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阈值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β 值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i>Rdi</i> (<i>Rdi</i> ≤ 0.081 7)	0.686 5*** (0.187 4)	
<i>Rdi</i> (<i>Rdi</i> > 0.081 7)	0.224 0 (0.157 3)	
<i>Rdi</i> (<i>Rdi</i> ≤ 0.047 2)		1.250 3*** (0.314 4)
<i>Rdi</i> (0.047 2 < <i>Rdi</i> ≤ 0.136 0)		0.679 5*** (0.229 9)
<i>Rdi</i> (<i>Rdi</i> > 0.136 0)		0.083 0 (0.216 3)
<i>Lev</i>	-0.140 7*** (0.032 5)	-0.182 9*** (0.037 0)
<i>Size</i>	0.016 1** (0.007 5)	0.021 9** (0.011 0)
<i>Qr</i>	0.006 9* (0.003 9)	0.002 4 (0.002 4)
<i>Oc</i>	-0.000 1 (0.000 4)	0.000 1 (0.000 7)
<i>Age</i>	0.002 2* (0.001 2)	-0.000 5 (0.001 8)
_cons	-0.151 0 (0.147 0)	-0.138 0 (0.215 2)
<i>N</i>	2870	2912
<i>R</i> ²	0.120	0.103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阈值回归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在国有企业中,当创新投资强度不超过0.081 7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当创新投资强度大于0.081 7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强度应尽量趋近但不大于0.081 7。在非国有企业中,当创新投资强度不超过0.047 2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作用程度较大;当创新投资强度在0.047 2~0.136 0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正向作用减小;当创新投资强度大

于0.136 0时,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消失。因此,非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应维持在0.047 2~0.136 0。整体而言,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创新投资效率更高。

(2) 多元化程度

多元化经营可通过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增大投入产出比,实现范围经济。将多元化经营以产品多元化程度(*Ahhi*)衡量,借鉴薛有志等^[16]的测度方法,采用调整的赫芬德尔指数衡量,计算公式为:

$$Ahhi = 1 - \sum_i^N P_i^2 \quad (4)$$

其中,*N*表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涉及的行业个数,*P_i*指企业从事第*i*个行业中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总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该指数越大,表明其多元化程度越高。

一般来说,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企业的资源共享与转移度以及冗余资源的开发率会更高。企业通过对创新投资的合理分配,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利用率;同时多元化经营有利于降低创新投资的不确定性。当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较低时,其业务范围的单一化模式易被模仿,难以塑造其更强的核心竞争力;再加上经营范围的过度集中使企业更易遭受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创新投资风险更大。本文将变量多元化程度以中位数为临界值进行分组,探究两种情形下创新投资对企业营业毛利率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见表8、表9。

由表8可知,多元化程度低组单阈值效应和双阈值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三阈值

表8 多元化程度低组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i>F</i> 值	<i>P</i> 值	BS 次数	显著性水平		
					10%	5%	1%
单阈值检验	0.166 7	30.34***	0.010 0	300	16.040 4	18.519 8	27.342 9
双阈值检验	0.128 6	19.15**	0.050 0	300	14.649 4	18.783 0	48.155 4
三阈值检验	0.022 4	13.07	0.133 3	300	17.109 3	25.788 8	37.737 2

表9 多元化程度高组阈值效应显著性检验

模型	阈值	F 值	P 值	BS 次数	显著性水平		
					10%	5%	1%
单阈值检验	0.121 9	21.13 **	0.030 0	300	15.112 0	19.023 7	23.550 1
双阈值检验	0.029 4	17.06 *	0.063 3	300	13.266 1	18.903 4	31.606 2
三阈值检验	0.047 8	7.53	0.473 3	300	15.726 7	19.180 6	29.157 6

效应检验的 P 值为 0.133 3,拒绝了存在三个阈值的原假设,因此存在两个阈值,分别是 0.128 6、0.166 7。同理,在多元化程度高组也存在两个阈值,分别是 0.029 4、0.121 9。

多元化程度低、高两组的阈值回归结果见表 10。由表 10 可知,在多元化程度低组中,当创新投资强度不超过 0.128 6 时,创新投资与营业毛利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当创新投资强度在 0.128 6~0.166 7 时,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当创新投资强度大于 0.166 7 时,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创新投资的最优区间在 0.128 6~0.166 7。在多元化程度高组,当创新投资强度不超过 0.029 4 时,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促进作用较强;当创新投资强度在 0.029 4~0.121 9 时,两者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减弱;当创新投资强度大于 0.121 9 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消失,因此创新投资的最优区间应维持在 0.029 4~0.121 9。相对于多元化程度低组,多元化程度高组的两个阈值出现时间均较早,最优化区间较低,且创新投资对营业毛利率的作用强度较大,说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可通过较低的创新投资获得较高的收益,有效缓解创新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提高创新投资的效率。

四、结论与建议

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在微观层面对于实现企业价值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 2012—2018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结构性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创新投

表 10 阈值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β 值	
	多元化程度低	多元化程度高
$Rdi(Rdi \leq 0.128 6)$	0.144 4 (0.242 0)	
$Rdi(0.128 6 < Rdi \leq 0.166 7)$	0.584 4* (0.311 0)	
$Rdi(Rdi > 0.166 7)$	-0.099 6 (0.229 1)	
$Rdi(Rdi \leq 0.029 4)$		1.687 5*** (0.427 6)
$Rdi(0.0294 < Rdi \leq 0.121 9)$		0.854 3*** (0.274 9)
$Rdi(Rdi > 0.121 9)$		0.306 1 (0.313 2)
Lev	-0.163 7*** (0.045 0)	-0.109 7*** (0.032 7)
$Size$	0.019 3* (0.010 9)	0.006 6 (0.012 4)
Qr	-0.006 0 (0.003 9)	0.006 0* (0.003 5)
Oc	-0.000 2 (0.000 5)	0.000 3 (0.000 7)
Age	-0.000 0 (0.001 7)	0.002 1 (0.001 5)
$_{-}cons$	-0.078 0 (0.203 1)	0.053 8 (0.259 3)
N	1862	1827
R^2	0.098	0.092

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随着创新投资强度的增加,这种促进作用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创新投资强度优化区间为 0.042 2~0.161 8。(2)在不同产权性质下,非国有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最优区间低于国有企业,且在最优区间内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3)在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不同的情况下,多元化程度高组创新投资强度的最优区间低于多元化程度低组,且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

用更强。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其一,企业应重视创新投资的积极影响,统筹考虑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合理实施投资决策,基于市场需求改进生产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目标,同时应关注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人力基础。其二,政府应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动国有企业创新积极性,释放创新潜力。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示范作用,因此应建立创新投资管理机制,激发管理层的创新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三,企业应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合理提高多元化经营程度。决策者应在对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经营环境充分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饱和程度和企业自身经营能力,适度扩展业务经营范围,分散经营风险,提高资金利用率,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5):1002.
- [2] PAKES A. On patents, R & D, and the stock market rate of retur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2):390.
- [3] BLOOM N, REENEN J V. Patents, real opt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2(3):97.
- [4] 朱乃平,朱丽,孔玉生,等.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对财务绩效的协同影响研究[J]. *会计研究*, 2014(2):57.
- [5] 荣凤芝,钟旭娟.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5):161.
- [6] 周亚虹,许玲丽.民营企业 R&D 投入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对浙江省桐乡市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2007(7):102.
- [7] HARTMANN G C, MYERS M B, ROSENBLOOM R S. Planning your firm's R&D investment[J].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6(2):25.
- [8] 韩先锋,董明放.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95.
- [9] 马艳艳,张晓蕾,逯雅雯.研发支出、广告支出与企业经济绩效:基于中国不同制造业子行业的实证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30.
- [10] 宋在科,周萍华,高淑娟.债务期限、创新投资与企业绩效: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11.
- [11] 陈建丽,孟令杰,王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J]. *中国科技论坛*, 2015(5):67.
- [12] 焦然,温素彬,张金泉.研发影响绩效的门槛现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缓解作用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0(3):110.
- [13] ALEXANDER K, MARTIN K, 王丽娜.提升创新投资回报的三根支柱[J]. *深圳特区科技*, 2005(Z3):74.
- [14] HANSEN B E. Threshold F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2):345.
- [15] 程宏伟,张永海,常勇.公司 R&D 投入与业绩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06(3):110.
- [16] 薛有志,周杰.产品多元化、国际化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07(3):77.



引用格式:刘丽丽,闫艳玲.生涯适应力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57-64.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7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57-08

生涯适应力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Study on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career adaptability on employee entrepreneurship intention

刘丽丽,闫艳玲

LIU Lili, YAN Yanling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基于生涯构建理论和工作嵌入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的方法收集数据并建立研究模型,问卷发放对象覆盖了国有、外资和民营三种所有制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对287份问卷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深入解读生涯适应力、工作嵌入两种因素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其一,在三种所有制企业中生涯适应力都是离职创业的重要前因变量;其二,工作嵌入的三个维度对离职创业的影响在三种所有制企业中不尽相同;其三,工作嵌入的联系维度和匹配维度在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
生涯适应力;
工作嵌入;
创业意愿

[收稿日期]2020-12-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7YJC63019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8-ZZJH-620);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202400410201)

[作者简介]刘丽丽(1984—),女,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组织行为、消费者行为。

在我国各级政府共同努力营造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环境下,我国各个行业均处在一场规模空前的创业热潮中,而其中的高新技术行业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华为系”“阿里系”和“腾讯系”等不同的员工离职创业阵营。在众多的员工创业影响因素中,既有企业(员工离职创业前所在企业)创造的、未被商业化或者未能充分商业化的新知识被一部分员工掌握而成为他们把握创业机会的重要因素,其通过离职创业的方式去更好地实现这些知识的商业价值。一般来说,离职员工创建的新企业与既有企业存在相似性,一部分企业还成为既有企业的竞争对手,使既有企业面临一定的经济损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讲,由于存在着企业规模和行业话语权均较小的原因,其所属员工离职创业带来的影响相比大规模企业而言,更明显也更猛烈些。

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个人的创业行为主要取决于本人的创业意愿^[1]。对于当前无工作个体(如大学生、自由职业者等)和有工作个体(如兼职创业和准备离职进行创业的个体)的创业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过程并不相同。但是,多数现有相关研究并未对个体的当前职业状况进行区分,仅仅是针对所有个体的共性,从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环境层面和企业层面对其创业意愿/行为进行了探索分析^[2-3]。然而,离职创业是员工离职后去向中的一种相对特殊的选择,其是人力资本流动的特殊形式。员工作为离职创业的主体,个人层面的因素直接影响其对创业机会的感知、评估和商业化能力。例如,较高的工作嵌入度既可能通过提高离职的机会成本而降低离职就业意愿,也有利于员工在既有企业中获取知识、人力资源等,提高员工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和获得创业资源的能力,进而提高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生涯构建理论和

工作嵌入理论从个体层面分析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的形成机制,同时,针对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企业制度和文化环境,逐一对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员工分别就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两种因素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进行剖析。

一、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1. 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

按照生涯构建理论,生涯适应力属于社会心理资源,是员工在适应当前或未来职业生涯中的任务加重、生涯转折、重大挫折等生涯事件时的心理资源。目前关于生涯适应力在组织行为方面的研究中,生涯适应力对员工离职或离职意愿的影响作用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Y. Guan等^[4]基于645名中国员工的实证研究表明,员工生涯适应力不仅能够直接负向影响离职意愿,而且能够通过职业生涯管理间接地降低员工的离职意愿。而舒晓丽等^[5]发现生涯适应力通过感知到的组织外职业竞争力对离职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前,相对稳定的传统雇佣关系被强调灵活性的新型雇佣关系所取代,员工的职业生涯不再局限于组织内,他们常常会跨越组织边界,进行自主创业。员工已然成为离职行为的主要决策者,员工本身的灵活性对其离职创业意愿产生更大的影响^[6]。

创业行为本身与员工对机会的警觉性、面对问题的主动性和丰富的人力资本等有关。因此,如果员工离职后要自主创业,那么生涯适应力强的员工对创业机会的感知、对实施创业的创业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相比其他员工更为突出。生涯适应力包括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自信和生涯好奇四个维度。具体来说,生涯关注和生涯好奇可以使员工利用工作中积累的知识和社会关系系统地进行梳理和探索,挖掘有价值的创业机会。发现创业机会后,员工在实

施创业时需要必要资源支持^[7],对于离职创业的员工而言,创业资源的整合并不是全部在离职后才进行的,而是有一部分会发生在离职前^[8]。因此,资源整合的效率也会进一步影响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而生涯控制恰恰能够使员工在行为上进行自我约束,有助于员工创业资源的积累和创造。此外,离职创业会使员工的角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挑战。生涯自信能够使员工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越挫越勇的勇气,推进创业意愿的固化^[9]。总之,具备较强生涯适应力的员工拥有更多的心理资源和更强的能力来适应离职后创业过程中工作的变化^[10]。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员工的生涯适应力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正相关。

2. 工作嵌入与离职创业意愿

工作嵌入是一个多维概念,包含牺牲、联系和匹配三个核心构念。一方面,牺牲、联系和匹配是阻止员工离开组织的约束力量^[11];另一方面,工作嵌入是由不同类型的资源组成的一个集合,反映出员工在当前企业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和优势^[12]。相对来讲,员工离职创业是企业的在职员工发现创业机会、开发并利用机会将其转化为市场价值的过程,是企业知识转移和技术外溢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区别于传统离职就业的一种特殊路径选择。因此,工作嵌入的三个维度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与其对离职就业的影响机制应是不同的。

基于工作嵌入概念中所包含的三个核心构念的影响权重不同,本文拟先从牺牲这一构念进行论述。牺牲是员工感知到的离开当前企业对其带来的各方面的损失^[13]。离职带来的损失不仅包括薪酬等有形损失,也包括晋升机会、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受尊重感等无形损失。这些损失构成员工的离

职成本,是其离职时心理和行为的障碍,牺牲越多则离职的成本越高。而资源保存理论则指出了个体总是努力获取、维持和建立有价值的资源。在企业中,员工工资的增长、资历的提高、晋升机会的累积等都是一次累加性投资,其收益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14]。因此,不管员工离职后的去向是创业还是去其他企业再就业,这些离职带来的损失都是员工个体所必须承担的。因此,本文认为离职带来的牺牲越多,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越低。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2a:员工牺牲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负相关。

联系是指员工与组织和其他员工之间存在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关联,以及这些关联的紧密程度;匹配是指员工与其所在组织的融合性、相似性和舒适性^[10]。员工在组织内建立起广泛、紧密的网络关系,并且与其他员工和组织在工作价值观、工作方式等方面有较高的匹配度,这些都反映了员工在组织中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研究表明,当员工与同事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个人与组织越匹配,其从工作领域获得信息资源的途径越多,资源获取越容易^[15]。员工通过工作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行业的专业知识、产品的客户和市场的特定信息等,这些不仅有助于员工发现未被充分利用的新技术和潜在的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其对创业机会进行合理的分析,并评估它的潜在价值^[16]。员工与企业内部的同事和外部的合作伙伴等建立的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可增强员工在创业过程中资源整合的便利性和有效性,提高员工自主创业竞争优势和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员工的职业经历和构筑的社会网络对维持创业企业的成立和健康成长具有推动作用,进而提升员工的离职创业信心和意愿。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2b:员工联系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正相关。

假设 H2c:员工匹配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正相关。

3.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嵌入

工作嵌入体现了员工的价值观、能力、动机等与所在组织的相容和匹配程度,以及与所在企业的其他人存在联系的强度。生涯适应力高的员工相比其他员工在工作态度上体现出较高的主动性和专注力,他们积极地构建自己和工作关系,主动地从心理和行为上进行调整和修正,使自己的价值观和能力与组织文化、工作需求等相匹配,从而实现个人与工作的动态平衡和匹配^[17];另外,为更好地协调工作中的各项任务,具备高生涯适应力的员工会主动与工作伙伴进行沟通,建立广泛、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高生涯适应力可以促进员工与组织的匹配和融合,提高员工的工作嵌入度。

同时,根据生涯构建理论,结合假设 2 可知,工作嵌入是员工主动适应工作的结果。对于有离职创业意愿的员工来说,较强的生涯适应力可以提高其与企业的联系和匹配程度,使员工在离职创业时拥有较大的资源优势,进而提升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3a: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嵌入的牺牲维度正相关。

假设 H3b: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嵌入的联系维度正相关。

假设 H3c: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嵌入的匹配维度正相关。

假设 H4a:工作嵌入的联系维度中介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假设 H4b:工作嵌入的匹配维度中介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样本

本文主要探讨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两种因素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调查问卷采用匿名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样本来自郑州和北京的 9 家互联网和 IT 服务企业的 372 名员工。本研究问卷调查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测量员工的性别、年龄、工龄、教育背景和工作嵌入等;四周之后,进行第二阶段的问卷调查,主要测量企业的所有制、员工的生涯适应力和离职创业意愿。两次问卷调查后,有效配对 287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77.2%。该数据样本的基础信息构成如表 1 所示,其中,男性 182 人,女性 105 人,工作年限从刚入职到 13 年,学历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

表 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样本特征		数量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182	63.4
	女	105	36.6
年龄	小于 20 岁	1	0.5
	20—30 岁	82	28.4
	31—40 岁	147	51.0
	41—50 岁	52	18.4
	50 岁以上	5	1.7
教育水平	大专及其以下	26	9.1
	本科	154	53.6
	研究生以上	107	37.3
工龄	1 年以下	11	3.8
	1—3 年	43	15.0
	4—5 年	95	33.1
	6—10 年	123	42.9
	10 年以上	15	5.2

2. 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已成熟量表对离职创业意愿、生涯适应力、工作嵌入进行度量,且均采用 5 点式李克特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此外,考虑到以往研究显示员工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学历)、

工龄、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企业规模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

(1)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中生涯适应力的四个子构念(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自信、生涯好奇),工作嵌入的三个子构念(牺牲、联系、匹配)和离职创业意愿为反映型构念,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为构成型构念。因此,本文将分别对这两种类型变量进行相应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反映型构念的信度检验一般利用 Cronbach's alpha 和组合信度进行分析。反映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见表 2。由表 2 可知,本文中所有反映型构念的 Cronbach's alpha 和组合信度的值均大于 0.7,表明构念的信度较好。在效度方面,本文从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来检验,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各构念的平均方差萃取值大于 0.5,表明方差萃取的比例较高,聚合效度较高^[18]。表 3 中,对角线上的数值为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平方根,它们的值大于各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19]。

构成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与反映型构念不同。首先,本文分别计算出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各子构念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值检验多重共线性。构成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

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各构念的 VIF 值均小于 3.3,表明构念的信度较好^[20]。对于效度的检验,本文利用 Smart PLS 2.0 得到各子构念的权重,再采用 bootstrapping 方法得到权重的 T 检验值^[21]。由表 4 可知,各子构念的权重达到 0.05 的显著水平,具有较好的效度。

(2) 假设检验

在检验了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后,本文利用 Smart PLS 2.0 进行假设检验。首先,本文检验了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对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龄和企业所有制对其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针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员工流动性存在差异,国有企业的员工离职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此,虽然员工离职创业是个人行为,但是仍会受到员工所在企业的企业环境影响,所以,探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员工的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对其离职创业意愿

表 2 反映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构念	Cronbach's alpha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萃取值
生涯关注	0.798 0	0.907 3	0.730 5
生涯控制	0.722 0	0.775 6	0.633 6
生涯好奇	0.710 2	0.869 3	0.769 4
生涯自信	0.716 0	0.875 5	0.778 6
牺牲	0.769 6	0.907 3	0.575 8
联系	0.807 4	0.775 6	0.568 9
匹配	0.871 8	0.869 3	0.501 2
离职创业意愿	0.826 2	0.878 5	0.593 1

表 3 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和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平方根

构念	生涯关注	生涯控制	生涯好奇	生涯自信	牺牲	联系	匹配	离职创业意愿
生涯关注	0.710 0							
生涯控制	0.516 1	0.740 0						
生涯好奇	0.229 5	0.261 7	0.870 0					
生涯自信	0.142 5	0.502 6	0.508 1	0.890 0				
牺牲	0.594 1	0.542 1	0.229 3	0.321 5	0.780 0			
联系	0.514 8	0.495 7	0.760 0	0.273 4	0.649 1	0.770 0		
匹配	0.740 6	0.804 4	0.218 1	0.380 2	0.633 2	0.603 7	0.880 0	
离职创业意愿	0.494 4	0.542 6	0.438 7	0.474 7	0.607 6	0.557 2	0.660 7	0.890 0

表4 构成型构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构念	VIF 值	权重
生涯关注	1.263	0.630***
生涯控制	1.122	0.454***
生涯好奇	1.125	0.474***
生涯自信	1.371	0.551***
牺牲	1.695	0.317***
联系	2.337	0.669***
匹配	2.146	0.674***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表5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变量间关系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H1	CA→EI	0.176**	0.244***	0.311***
H2a	JES→EI	-0.120	0.127	0.075
H2b	JEL→EI	-0.092	0.417***	0.332***
H2c	JEF→EI	-0.225**	0.384***	0.343***
H3a	CA→JES	0.502***	0.412***	0.378***
H3b	CA→JEL	0.473***	0.441***	0.627***
H3c	CA→JEF	0.625***	0.503***	0.422***
R ²		0.276	0.311	0.327

注:CA 为生涯适应力,JES 为牺牲,JEL 为联系,JEF 为匹配,EI 为离职创业意愿。

的影响机制存在何种差异也是必要的。综上,本研究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对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在三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中,员工的生涯适应力对其离职创业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1 得到验证。有一点需要明确,相较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的员工生涯适应力更能够激发其离职创业意愿。假设 H2a 指出牺牲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有显著的负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牺牲的影响作用为负向(-0.120),而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其影响作用为正向的,但是两者都不显著,因此,假设 H2a 不成立(0.127, 0.075)。假设 H2b 指出员工联系与员工离职创业意愿正相关,然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其影响作用在三种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并不一致。具体来说,在国有企业中,联系对离职创业意愿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0.092),假设

H2b 不成立。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工作嵌入的联系维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0.417、0.332),假设 H2b 成立。对于假设 H2c,在国有企业中,员工与企业越匹配,离职创业意愿越低(-0.225),假设 H2c 不成立。但是,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该构念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0.384、0.343),假设 H2c 成立。研究假设 H3a、H3b 和 H3c 指出,生涯适应力对工作嵌入三个维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在三种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中这三个假设均得到支持。

(3)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 K. J. Preacher 等^[22]提出的偏差纠正 Bias-Corrected Bootstrapping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由结构模型检验结果可知,在国有企业中,联系和匹配的中介作用不存在。因此,本文只检验联系和匹配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的中介作用的显著性。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联系的中介效用的 95% 的 Bias-Corrected Bootstrapping 置信区间为 [0.174 149 2, 0.204 931 64], 匹配的置信区间为 [0.053 261 2, 0.175 648 2], 都不包含 0, 而且生涯适应力对离职创业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外资企业中,工作嵌入的联系和匹配两个维度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间接影响。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联系和匹配的中介效用的 95% 的 Bias-Corrected Bootstrapping 置信区间分别为 [0.131 990 3, 0.213 643 6] 和 [0.041 473 1, 0.220 753 4], 都不包含 0, 中介效应显著。同时,生涯适应力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民营企业中,生涯适应力不仅直接影响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同时还通过工作嵌入概念中的联系和匹配两个维度间接地影响离职创业意愿。

三、结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知识资源,且相对于物质资源,企业对知识资源存在更高的依赖性,这就导致了知识溢出的机会更大。与此同时,企业中的核心知识呈现却是隐性的,嵌入在了企业的人力资源中。因此,较高的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度有可能激发员工离职并迅速实现创业,这与传统员工离职的相关研究结论相悖。以9家企业287名员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利用Smart PLS 2.0和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其一,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生涯适应力是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重要前因变量。本文区分了离职后的去向问题,将离职创业意愿作为最终的结果变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离职创业与离职再就业不同,它是员工在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相对重要决策,是员工在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生涯适应力高的员工会主动管理并设计职业生涯,探索更多的职业道路,并且为自己新的职业发展积极准备^[23]。因此,生涯适应力越高,员工的离职创业意愿越高。

其二,工作嵌入的三个维度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的影响在三种所有制企业中不尽相同。具体来说,牺牲维度在国有企业中的影响作用为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联系维度则在国有企业中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其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正相反;对于匹配维度来说,其在国有企业中对员工离职创业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对离职创业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则可能是我国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一般集体主义倾向较强,在此文化背景下,生涯适应力和工作嵌入度较高的员工将具有较高的组织承诺水平。

其三,工作嵌入的联系维度和匹配维度在

生涯适应力与离职创业意愿之关系中存在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可解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为什么越来越多优秀的员工选择离职创业,与一般认知相悖的是,以往公认的有效人才保留手段并未产生预期效果,甚至某些公认的有效人才保留手段直接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即优秀人员离职,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企业管理者正确制定优秀人才保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管理者应重视并正确区分优秀人才的离职就业和离职创业,关注并积极引导优秀员工职业生涯的成长,建立健全优秀人才培养机制,为具备丰富知识资源和创业意愿的员工提供内部创业条件,以期实现企业内部的创新创业;其次,企业应建立系统有效的知识管理体系,充分提升企业自身知识有形化的转化速度,并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制约员工的离职创业行为;再次,企业管理者应根据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文化特点实行不同的人才保留政策,切忌照抄照搬。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管理者可以通过增加员工的工作嵌入度以减少离职创业行为的发生;而对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在加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匹配时应重点关注高嵌入度的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and 预期。

由于采用有限问卷实证研究的样本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本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郑州和北京,未能包含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的沿海地区,存在一定局限性,缺陷甚多;二是本研究采用员工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测量结果存在社会称许性问题,未来研究应采取他评和自评相结合的测量方式,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 [1] 曲静,陈树文. 国有企业高管需求结构下各需求强度对离职倾向的影响[J]. 软科学,2018

- (1):67.
- [2] 李永慧,李华晶,庞雅宁,等. 绿色发展制度环境、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9(11):146.
- [3] 吴亮,张建琦. 创业拼凑与中小企业新产品绩效研究: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J].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19(6):654.
- [4] GUAN Y J,ZHOU W X,YE L H,et al.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career management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as predictors of success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Chinese employees [J]. Journal Vocational Behavior, 2015(2):230.
- [5] 舒晓丽,叶茂林. 生涯适应力和员工离职意向的关系:职业生涯成功的作用[J]. 心理科学, 2019(1):95.
- [6] 吴杲,杨东涛. 无边界生涯背景下的离职:重回决策者中心[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2):289.
- [7] TABER B. BLANKEMEYER J M. Future work self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in the prediction of proactive career behaviors [J]. Journal Vocational Behavior, 2015(2):20.
- [8] 王端旭,叶庆燕. 员工离职创业决策过程及多层面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 经济管理, 2016(11):187.
- [9] ZHANG Y,ZHANG S S,HUA W Y.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on teacher burnout: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J].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019(4):339.
- [10] SAVICKAS M L, PORFELI E J. Career adapt abilities scale: construction, reliability, and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across 13 countries[J]. Journal Vocational Behavior, 2012(3):661.
- [11] 温珂,于贵芳,吕佳龄,等. 工作嵌入、制度环境与离职意愿:中科院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11):130.
- [12] HALBESLEBEN J R B, WHEELER A R. The relative roles of engagement and embeddedness in predicting job performance and intention to leave [J]. Work & Stress, 2008(3):242.
- [13] MITCHELL T R, HOLTOM B C, LEE T W, et al. Why people stay: using job embeddedness to predict voluntary turnover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6):1102.
- [14] 徐茜,张体勤. 工作嵌入与员工流动倾向:工作价值观为调节变量[J]. 管理工程学报, 2017(3):19.
- [15] KIAIAD K, HOLTOM B C, HOM P W, et al. Job embeddedness: a multifoci theoretical extens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5(3):641.
- [16] AGARWAL R, SHAH S K. Knowledge sources of entrepreneurship: firm formation by academic, user and employee innovators [J]. Research Policy, 2014(7):1109.
- [17] WINGERDEN J V, BAKKER A B, DERKS D. Fostering employee well-being via a job crafting intervention [J]. J Vocat Behav, 2017(5):164.
- [18]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1):39.
- [19] STRAUB D, BOUDREAU M C, GEFEN D. Validation guidelines for IS positivist research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04(24):380.
- [20] DIAMANTOPOULOS A, SIGUAW J A. Formative versus reflective indicators in organizational measure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and empirical illustration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4):263.
- [21] PETTER S, STRAUB D, RAI A. Specifying formative construct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J]. MIS Quarterly, 2007(4):34.
- [22] PREACHER K J, HAYES A F.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8(3):879.
- [23] 于海波,董振华,晏常丽. 生涯适应力对主观生涯成功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元分析[J]. 软科学, 2019(7):133.



引用格式:周宇豪,杨家明.电竞场域中虚拟资本符码转换逻辑及其对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启示[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65-76.

中图分类号:C91;G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8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65-12

电竞场域中虚拟资本符码转换逻辑及其对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启示

The symbolization logic of virtual capital in the match field of e-sports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周宇豪¹,杨家明²

ZHOU Yuhao, YANG Jiaming

1. 上海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000;
2.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电子竞技比赛既是一个拥有独特竞争与协作逻辑的场域,也是一个玩家集中的符号互动和策略博弈的共时性场所。在电子竞技比赛场域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以特定方式转换为虚拟资本,从而为作为行动者的玩家所争夺、占有。虚拟资本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类型、功能和分配方式,其与游戏禀赋共同影响着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策略和游戏实践,并通过数字技术编码和玩家符号互动的过程实现符号化,进而作为拥有海量符号单元、内化了复杂意义关系的符号指意系统存在,成为这一场域区别于其他空间的显著特征。电子竞技场域中虚拟资本符码转换逻辑能够从实践上印证符号化的思维及其行为模式是人类社会行动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而且这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也构成了人类文化不断丰富的基础。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应着眼于现实世界,也应关注互联网络、社交媒体、电子竞技等虚拟场域;应针对具体的文化场域来量身定制传播策略,采用差异化的组织方式;以一种妥帖而有效的路径促进话语权形成的合法性;采用多模态的符号形式,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构建立体、充盈、动态、多维的表征体系,运用媒体融合思维,打造系统性的传播矩阵;应拓展传播主体,让多元主体参与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来,发挥个人讲好“中国故事”的潜力,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

关键词:
电子竞技比赛;
虚拟资本;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收稿日期]2020-09-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315)

[作者简介]周宇豪(1969—),男,河南省鄆陵县人,上海大学伟长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家明(1997—),男,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理论、国际传播。

在数字媒体时代,电子竞技作为一种竞技类电子游戏,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运动形式。目前,学界对于电子竞技产业运营管理、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颇多,涉及电子竞技的社会科学研究却十分匮乏,竞技比赛中纷繁多样的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玩家行为尚未受到广泛关注。鉴于此,本文拟通过传播学、符号学和社会学等多维视角,探讨社会科学视阈下电子竞技比赛运作的逻辑和法则,以期对电子竞技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从媒介呈现形式看,电子竞技属于电子游戏范畴,而电子游戏研究与传播学、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关系密切。伴随着传播学的诞生和信息与传播技术新时代的到来,游戏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附属领域^[1]。文本分析与叙事研究的引入,也使得游戏研究与符号学框架相结合。如今,游戏作为强势媒介,因其强交互性等特点而被指认为互联网的主流传播范式^[2]。虽然游戏研究为理解竞技比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电子竞技与电子游戏的概念没有在这些研究中得到严格区分,“电竞”多被纳入了“电游”“网游”范畴予以论述,难免造成对其独特属性的忽视。

目前,传播符号学视阈下的“原生”电子竞技比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赛事直播的分析。作为电竞产业链下游环节,赛事直播受到了学界关注,已有研究者采用经典的传播理论,考察主播、解说的话语策略和直播效果,以及与之相关的直播过程中的符号互动、情感传递等问题。但是,当前传播符号学观照下的研究仍未聚焦电子竞技比赛本身,也没有着眼于比赛进程中的传播现象,而是以直播媒介和解说员对比赛的“再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场域概念

最早产生于物理学领域。格式塔心理学代表人物考夫卡较早将其应用于社会学语境,以此解释人类行为模式。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心理活动是人知觉现实观念的心理场和被知觉现实的物理场二者结合而形成的心物场,其涵括了地理环境、行为环境等多重要素^[3]。基于资本和惯习的概念,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进一步丰富了场域理论。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看作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4]¹²²。作为场域的核心概念之一,“资本”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积累相异,它既是一种铭刻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内在规律性的原则^[5]¹⁸⁹。所谓惯习,是指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6]¹⁶⁵,是行动者实践的动力原则。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被他本人及其后继者用于分析文学、新闻、政治、大学、艺术这些富含斗争与妥协等多重力量的场域(包括物质性的与非物质性的),极具解释力与洞见性。在国内,虽有研究者借助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提出“电竞场域”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显然是在“电竞行业”概念基础上而进行的衍生界定,这样或许能将从事电竞工作的人员都包含其中,却难免使得电竞场域和电竞行业的意涵处于混淆状态,忽视了微观层面的电竞比赛和游戏玩家对于形塑电竞场域的重要作用。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电子竞技比赛作为不同于电子游戏的虚拟社会环境和符号互动场所的价值并未得到学界关注,与之相关的社会学、符号学探讨也乏善可陈。电子竞技比赛本身拥有独特的竞争与协作逻辑,占据不同位置的玩家在一定策略与原则下根据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和能力与其他玩家展开竞技,力图获得比赛胜利,或达成某种任务目标。这些特征与场域的特性颇为契合。据此,本研究尝试

提出并回答如下问题:作为拥有特殊的竞争与协作逻辑以及大量参与者的虚拟运动形式,电子竞技比赛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场域?若作为场域存在,那么构成且支配这一场域的逻辑与法则具体又是什么?

具体来说,本研究试图将电子竞技比赛视作一种富含冲突与斗争的场域,将参与比赛的玩家视为场域中的行动者,基于位置和行动者两个维度对电子竞技比赛场域进行初步建构,进而探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比赛场域这一赛博环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即虚拟资本,并采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探讨虚拟资本如何转换成数字化的符号形式,进而成为符号指意系统,揭示虚拟资本的符号面貌,以期勾勒出比赛场域的逻辑与法则,弥补当前电竞研究中传播学、社会学和符号学维度阐释的不足。

二、位置与行动者:电子竞技比赛场域的界定

电子竞技运动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软硬件设备为器械,在信息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中,在同一竞赛规则下进行的对抗性益智电子游戏活动^[7]。电子竞技运动种类繁多,一般包括以下五类:一是以《星际争霸》《魔兽争霸3》为代表的RTS类;二是以《DOTA》《英雄联盟》为代表的MOBA类;三是以《雷神之锤》《反恐精英》为代表的FPS类;四是以《FIFA》《NBA 2K》为代表的传统体育类;五是以《铁拳》《街头霸王》为主的格斗类。每一种电竞项目的内核,就在于该项目中独具特色的比赛。本研究语境下的电子竞技比赛不仅包括职业赛事,还涵盖该电竞项目中所有允许玩家参与的正式比赛。由于位置和位置间复杂关系的存在,以及行动者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实践,电子竞技的比赛场域才能够形成并持续运作,所以本文将尝试通过位置与行动者这两个维度,对电子竞技的比

赛场域进行界定。

1. 位置的确定

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5]142}。通常情况下,每一种电子竞技比赛所要求的玩家数量都存在一个固定值,或一个阈限。入场的玩家在比赛中必然占据某种与之一一对应的客观位置,且不同的位置之间、位置的占据者(玩家)之间存在复杂多变的关系。一般而言,这些位置间的关系总是内化于其占据者间的关系之中,并借由占据者间的关系被表征。若基于宏观视角,这些关系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竞争与协作,指挥与服从,支援、进攻与防御,以及近程、中程与远程协同。在动态变化之中,玩家之间则会出现更难以预测的关系,在此不再赘述。

当达到比赛限定数量的玩家进入游戏,并基于一定规则和个人特质完成了对自己位置的选择后,比赛场域的基本结构就形成了。但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由这些位置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5]142}。这也就意味着,位置并非总由行动者自由选取。实际上,玩家位置的获得可能是比赛匹配算法分配的结果,而在算法考虑的变量中,玩家的比赛实力往往被赋予较高权重。实力以某种逻辑被数值化,成为玩家在位置分布结构中的“潜在境遇”,实力相近的玩家有更大概率被匹配系统纳入同一个场域中进行竞技,以控制入场者的实力差距,维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时,一旦这些位置被界定之后,其占据者(玩家)也需要结合自身位置的特征规划比赛行为,以及同其他位置的占据者展开竞争和协作。

2. 行动者的入场方式

如前所述,玩家位置的确立界定了比赛场

域的基本结构,但此时的场域仍是一个僵化的结构,因为不论是资本的生成与转换,抑或激烈的冲突和竞争,作为行动者的玩家都不能缺席。布尔迪厄认为,由位置组成的场的方法论,是无法同姿态或位置的占据所构成的场相分离的,即无法同行动者的实践与表达的结构化系统相分离^{[5]150}。据此,比赛场域的分析不能仅拘泥于位置的确定,还应综合考虑行动者的构成和特性,以及行动者入场与实践的具体方式。

从技术逻辑来说,电子竞技比赛场域是一种由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生成、渲染的赛博环境。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玩家若要进入这个虚拟世界,则需要其中找寻能够确认自我之存在感的物或符号^[8]。这里所说的物或符号就是游戏角色,或虚拟化身。化身是“血统”的梵语词,意指神在人间的化身,而玩家正是通过化身参与游戏,扮演游戏的主角^{[9]97}。换言之,在确定了一定的位置后,玩家必须以虚拟化身的形式入场,进而才能成为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对化身的操纵和扮演,谋划一系列实践活动。化身使作为行动者的玩家拥有了一个可以被自己和场域中的他者感知的视觉形象,即“玩家在比赛中用以展示符号文本的那个人”^[10]。

玩家在比赛场域中的行为活动并非无规律可循的即兴操演,而是基于惯习所形成的能动实践。布尔迪厄指出,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了习性(惯习),它是一个持续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它倾向于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11]80}。比赛场域中玩家的惯习构成了其实践策略的重要基础,行动者的身体素质(如视力、反应力、协调能力)、教育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以往的游戏经历,都会参与其比赛惯习的形塑。

惯习的反应完全可能伴随着一种策略计算,该策略计算倾向于按照有意识的方式,实施

惯习按另一种方式(一种关于既往结果变成预期目标的可能性的估计)所实行的计算^{[11]81}。比赛场域中玩家会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同其他位置占据者的可能关系、当前和预期时间内自身掌握的资源 and 比赛局势的变化等多重因素能动地计算策略收益,调整自身采用的比赛策略,并基于这种策略开展游戏实践。由于惯习的存在,行动者的行为方式既具有理性的一面(讲求策略),又具有非理性的一面(被结构决定的无意识),即无意识的“策略”^[12],玩家的行为方式也是如此。比赛中快节奏的竞技与争夺不会总是“慷慨”地给予使行动者思维深度卷入的充足时间,比赛局势和阵营间力量对比的瞬息万变都要求玩家作出及时反应,这种反应就表现为受惯习和结构所形塑的无意识的“策略”。

除玩家外,比赛场域中仍可能存在其他行动者,他们对比赛施加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游戏(比赛)管理员。这类行动者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比赛秩序、确保公平竞争,甚至拥有在一定条件下终止比赛和将玩家“踢出”游戏的权力。但这些行动者不直接参与竞争,也不加入资本的积累与争夺,而是以场域维护者的身份存在,其关系和行为逻辑较为单一,并不像玩家那样富于变化,也不是比赛场域的主体。据此,笔者将不会对这类行动者进行探讨,而是将玩家视作核心行动者。本研究中的行动者,除非特殊标明,均指涉游戏玩家。

三、电子竞技比赛场域运作的核心逻辑

任何电子竞技比赛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如击败敌方选手、完成某种任务,而目标的达成通常依赖于一系列“资源”的生产、争夺、积累和使用,虚拟道具、货币、装备和协作伙伴都可能

成为左右比赛局势的资源。这些纷繁的资源,其实就是比赛场域中的“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资本是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肉身化”的形式积累起来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5]189}。一个场域不仅包括了客观的位置和关系,还包括人类活动和由此产生的肉身,以及环境和结构产生的物质安排^[13]。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社会历史是一部积累的历史,电竞比赛也可被还原为行动者对资本生产、争夺、占有与使用等复杂行为的动态序列。场域中包含力量与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对比赛场域中的资本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影响玩家关系、策略和行为的规定性原则,力图勾勒出比赛场域的核心逻辑。

1. 虚拟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比赛场域中的表现形式

资本表现为三种根本的类型(每一类下还可以划分出层次更低的类型),这就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除了这些,我们还必须加上符号(也被译作“象征”)资本^{[6]161}。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转换关系。绝大多数物质类型的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经济资本),都可以表现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5]190-191}。玩家在现实场域所掌握的各种资本(如金钱、学历、人脉)不能被直接带入比赛场域中,它们需要被置于特定的转换方式之下才能在场域里为玩家占有。

上述三种类型的资本只有转换为虚拟资本,方可在比赛场域这一由信息技术生成的赛博环境中存在。此处的“虚拟”,并非说资本是无形无相的,而是意指比赛场域中的资本所必

须采取的数字化、多模态的符号形式。布尔迪厄也曾指明了资本所具备的符号属性:“当我们通过知性范畴去把握这几种(即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资本时,这几种资本呈现的就是象征资本的形式。”^{[5]166}接下来,笔者将具体阐述上述三种类型的资本向虚拟资本转换的可能方式(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

其一,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直接转化为金钱,其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5]192}。经济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换,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玩家付费购买游戏,从而获得参与比赛的资格,这是玩家入场的前提,《守望先锋》即是一款需要付费才能体验其中多种比赛模式的游戏;二是通过使用现实世界的货币购买电竞比赛中的角色、装备、道具、货币和服饰等虚拟产品,这一行为被玩家称为“氪金”;三是玩家购置高性能的显示器、主机、键盘、鼠标和耳机等游戏必需设备。对于《Apex 英雄》这种“吃配置”的游戏来说,高性能的设备就意味着玩家在比赛中占据先机,在虚拟资本的争夺中获得优势。

其二,社会资本。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和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5]202}。社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换通常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玩家通过动用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网络,找寻愿意与其在比赛场域中结成小队(或协作关系)、共同致力于完成比赛目标的人;二是玩家根据自身掌握的社会资本,在游戏世界中创建或加入某个活跃的社区或共同体,如战队、公会和舰团,以积累虚拟的社会资源;三是玩家在与现实中相识的其他行动者一同进入比赛场域后,获得归属感、认同感等正向激励,或与该行动者共享部分由他所掌握的资本,使自

已得到更丰厚的虚拟资本。

其三,文化资本,亦被布尔迪厄称作“信息资本”。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形式存在;二是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三是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存在^{[5]192-193}。电竞场域中的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玩家“游戏禀赋”(包括技术、经验和知识层面)的形式,是玩家游戏能力的核心元素。对于比赛场域而言,文化资本不能直接转换为虚拟资本,但它可通过增强、优化行动者的游戏禀赋,使行动者在场域中生产、创造、争夺和使用虚拟资本时获得独特优势,占据有利地位,进而更有机会达成比赛获胜的目标。

2. 虚拟资本的类型与功能

比赛场域中的虚拟资本不仅数量十分庞大,而且有纷繁复杂的类型和功能,还拥有一套关于资本生产(创造)、分配、获取与使用的体系化方式。就虚拟资本的生成方式而言,这种资本一部分由现实场域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换而来,另一部分则是比赛场域中独特的原生资本类型。根据其在比赛场域中的地位、功能与潜力等特征,笔者将海量的虚拟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即象征型资本、实践型资本、关系型资本和元资本。

象征型资本涵盖玩家的等级(亦有“军衔”“级别”等说法)、段位、排名与服饰,以及各种可获取、可自定义的象征符号标识。对玩家比赛表现进行分类精确统计的各种数据(杀敌数、获胜场次、暴击率等),也可划归为象征型资本范畴。象征型资本的功能与价值主要在于玩家的自我认知、印象管理与关系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可以赋予行动者在比赛中的地位,并强化其自我认同。这类资本可以是赢得比赛和完成任务的报偿,通过玩家的比赛实践获得,也可以是玩家使用真实的货币进行购买,由经

济资本转换而来。

实践型资本是指能够对比赛进程和局势起决定性或关键性作用的,且必须通过玩家的游戏禀赋和比赛实践才能激发其价值与力量的虚拟资本。实践型资本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可供玩家扮演且拥有功能指向的角色、各具特色的武器(刀剑、枪炮等)、装备(护甲、载具等)、效果多样的技能,以及能够对比赛产生实实在在影响的其他游戏道具。角色、武器等实践型资本在比赛场域中的具体属性(如生命值、攻击力)也是构成实践型资本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些属性,实践型资本拥有极其多样的功能、用途和定位,而且有着能够影响比赛局势的潜力,但这种特性必须通过玩家的比赛实践和游戏禀赋才能实现,故称为“实践型资本”。

关系型资本通常既是由玩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资本转换而来的,同时也包括玩家在比赛场域中建构、维系和拓展的线上社会关系。一般来说,行动者所拥有的好友数量以及这些与行动者保持联系的人所掌握的虚拟资本的数量是该行动者检视其关系型资本的重要尺度。在一些电子竞技比赛中,结成小队共同作战或作为同一战队(公会)成员的玩家还会被标出,其他行动者因而能够借此知晓这些玩家之间的关系。

在比赛场域中,象征型资本与实践型资本的获得往往依赖某种“货币”资源的积累与转化,这样的资源直接影响玩家所能得到的象征型资本与实践型资本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同时制约着实践型资本在比赛中所能产生的效果与影响的程度,笔者将这种资源称为元资本。元资本是比赛中最基本的虚拟资本,其在玩家的比赛实践中被获取,或以某种方式分配给玩家,并通过特定的比率或机制转化为象征型资本或实践型资本。元资本的积累能提升象征型、实践型资本的潜能和强度,并影响着实践型资本

的功能与潜质能否被激发。元资本的积累效率与转化能力是关乎比赛局势的重要考量因素。用于购买游戏道具的虚拟货币,技能、装备、道具和装备效果的“冷却时间”都可以归为元资本。

3. 从虚拟资本到游戏禀赋:影响玩家间关系、比赛策略和行为的规规定性因素

电子竞技比赛场域中行动者之间保持着诸如竞争、协作与妥协的多种复杂关系,他们力图根据自身和团队所处的境遇采取针对性策略,进而在争夺资本与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占据主动。若要对这些关系和策略的形成进行考察,其最可操作的方式,便是分析占据不同位置的玩家所拥有虚拟资本的数量、类型与结构,及其在比赛进程中所可能发生的变化。场域内存在着力量与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同时,以文化资本(知识系统)为核心的游戏禀赋也作为一种规定性原则,影响着玩家在比赛中的种种关系和实践。一位“游戏者”的各种策略,以及确定其“游戏”的各种因素,既是特定时刻其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函数,以及这些因素向其所保证的游戏机会的函数,也是这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随时间演进的函数,即其的社会轨迹的函数^{[4]125}。

游戏禀赋是对玩家游戏能力的综合考量,它不仅包括作为知识和技术系统的电竞文化资本(如操作技巧和比赛经验),也指涉行动者的身体素质(如视觉感知能力和手、眼、脑协调能力),以及玩家在比赛时所使用的、主机、显示器、键盘和音箱等设备的性能。其中,技术主要指行动者对实践型资本的驾驭与掌握程度,对某种角色、武器操作的熟练程度;知识则主要指行动者对虚拟资本用途、功能的认知与内化程度,以及他对比赛机制的理解。对于占据着特定位置的玩家而言,其在比赛中所能参与获取、分配与争夺的虚拟资本的数量、类型与结构,以

及这些资本在比赛场域中的功能、处境和潜力,直接影响着其在比赛中所采取的策略和不同情境下同其他玩家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了该玩家担负的责任与使命。其中,玩家的游戏禀赋是这种关系、策略能否形成和维持的关键。通俗地说,资本规定着关系“应该是这样”,禀赋则决定了关系“能不能这样”。

譬如,在《守望先锋》中,技能、武器等实践型资本与行动者所选择的英雄存在绑定关系,即一个作为虚拟资本的英雄涵盖了与之相关的虚拟资本(主要是象征型资本和实践型资本),而这也是该场域中资本分配的显著方式。若一位玩家选择了“士兵76号”这个角色,该玩家能使用的实践型资本便包括了武器“重型脉冲步枪”和技能“生物立场”“螺旋飞弹”“疾跑”和“战术目镜”,而这些资本属性决定了操纵它们的行动者必须在比赛中处于核心输出位置。虚拟资本的变化也能影响玩家的策略取向和关系。当“战术目镜”技能充能完毕时,玩家可能会改变输出模式,并尽可能请求其他位置选择“安娜”等辅助型角色的玩家对其使用技能“纳米激素”,同时呼叫“莱因哈特”等重装防御型角色的保护。上述实践型资本,都能通过玩家强大的游戏禀赋和策略实践转化为改变比赛局势的力量。

总而言之,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一个不同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空间,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鸿沟、距离和不对称性关系^{[4]127-142}。如果说一个场域与其他空间相区别的标志是该场域中最独特的资本形式的话,那么使电子竞技比赛作为场域而存在的资本,就是拥有复杂构造的虚拟资本。而游戏者的力量关系对比取决于游戏者在其中的位置,根据不同的位置与资本,行动者可采取不同的策略^[12]。据此,正是虚拟资本和游

戏禀赋的逻辑界定了不同位置占据者之间多样的关系形态和策略思考,从而支配着比赛场域的结构。

四、符号系统、意义关系与等级化原则:比赛场域中虚拟资本的符号化过程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思维的确有助于理解比赛场域中的资本逻辑,但对于本质上不过是数值和代码的虚拟资本如何转化为一种内化了复杂意义关系的符号形式来说,则缺乏进一步的解释力。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直言:“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成理性的动物。”^{[14]46}他进一步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行为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有赖于这一条件^{[14]47}。按照卡西尔的逻辑,比赛场域中的行动者同样是“符号的动物”,他们不仅生产、争夺、传递符号,也通过符号象征的意义差异建构了一套权力/等级化原则,实现认同与区分,维护自己的位置、利益和优势。据此,只有将场域理论与符号学模式相结合,才能真正把握虚拟资本的符号化过程,揭示它隐含的符号面貌。

1. 成为象征:作为符号指意系统的虚拟资本

瑞士结构主义者索绪尔曾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符号明确界定为:“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但是在日常使用上,这个术语一般只指音响形象,例如指词(arbor等等)。”^[15]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符号”一词也被定义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相对于这一古典的符号定义,近百年来媒介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展了符号的概念内涵。技术不仅是一种容器,也是积极塑造着人与环境的过程^[16],作为表意媒介的符号也受到

技术的深刻形塑。作为数字技术对游戏信息编码的必然结果,电子游戏显然是多模态的(符号)文本,因此我们应该思考(游戏中的)动画、视觉设计、音乐、文字、文本和声效等多沟通模态的联合如何实现了游戏语言的再现、互动与组织功能^{[9]100}。这意味着,电子游戏这一场域充盈着海量的符号单元,是由纷繁复杂的符号和文本所构筑的“符号世界”^[8]。

据此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包括象征型、实践型、关系型资本和元资本在内的虚拟资本不仅是行动者在比赛场域中所生产、争夺和使用的资源,也是指涉特定意义的符号形式。而虚拟资本的功能、价值、获取/争夺方式、使用方法和其他属性,则形成了符号的意义和意义关系,并通过游戏画面中文字、图像、音效、三维模型等多符号模态的感知载体,被行动者所识别、解码。当角色这一实践型资本作为符号时,其所指涉可以是其背景故事与属性特征,以及其在同其他角色关系中的位置和处境。玩家在对角色的装备进行考察时,实际上已经将角色视为符号。

通常地,符号以合一的表意单元,即以“符号文本”的形式存在着。这里的“文本”,指的是任意符号表意组合。赵毅衡认为,若一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让接收者能够把这个组理解成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17],那么这个组合就可被称为“符号文本”。以技能文本(资本)为例,玩家对某一技能的认知和解释往往由技能的图标、文字说明、视觉特效和声音效果等符号构成。这四个符号单元在某些解释场合下均指向该技能,并被玩家组成了一个集合来理解,那么此时它们便成为关于特定技能的“技能文本”。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说,若我们将象征型、实践型、关系型资本和元资本视作整体进行考量,它们便构成了一个内化了复杂意义关系的符号

指意系统,且系统内的符号单元可以在一定语境下相互指涉。在《Apex 英雄》这款逃杀类游戏中,当行动者在战场上搜寻防具这种实践型资本时,他首先要找到形状为盔甲或头盔的道具,而道具的颜色意指其对于玩家的意义与价值。若玩家穿着“金色”盔甲,与他交火的敌人就可能意识到发射轻型子弹的武器不能快速摧毁他,进而诉诸手雷、电弧星等资本。在此,盔甲、枪械和爆破物都被玩家视作符号进行解码,且“金色”盔甲指涉了轻型武器的无力,向玩家传递了当前手雷的意义,而这一过程必须依赖比赛符号系统,否则将会“丢失语境”。

2. 符号互动:比赛场域中意义的生成、传递与再造

虚拟资本若作为符号单元或符号指意系统而存在,不仅依赖技术的编码,更需要被纳入符号互动的框架,在行动者表意与解释的游戏实践中实现符号化。游戏本身带有交互性,游戏的过程是若干种交互形态的总和,而交互可以是对游戏样态的改变,也可以是与其他游戏者的各种交流^[18]。对于比赛场域而言,行动者间的文字沟通、团队协作和诸多战斗行为,以及玩家同游戏环境物体、系统的交互作用,几乎均可以还原为符号互动。玩家的符号互动需要考虑比赛的实时情况和未来演化趋势、位置占据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虚拟资本数量、结构和类型的变化。通常来说,符号的理据性在表意与解释实践(即符号互动)中产生,形成“符用理据性”。玩家在快节奏的比赛进程中将技能、武器等虚拟资本以表意符号的形式“发送”,包括队友和敌人在内的其他玩家对该符号进行意义解释,并将自己的反应和阐释以符号的形式(如回复语音和使用其他资本)抛出,从而被初始的发送者和其他玩家所接收,完成一次符号互动。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虚拟资本的意义得到了生产、巩固、再造或更新。

当然,符号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符号学者巴尔特看来,意义的生成、传递与解读必须经过由初级指意系统(即外延)到次级指意系统(即内涵)的过程,初级指意系统中的能指与所指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了次级指意系统中的能指,指向特定的意义(所指),这一过程还可延伸拓展^[19],构成无限的衍义过程。巴尔特认为:“前一个系统(外延)构成了后一个系统(内涵)的表达面或能指……内涵系统的能指……是由外延系统的符号构成的。”^[20]这也就意味着,意义始终处在生成的过程中,而绝无固定的落脚处^[21]。在比赛场域中,虽然部分虚拟资本的属性、功能和使用方式已经由游戏制作组“镌刻”到资本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意涵恒定不变。玩家在符号互动中会对既有意涵进行再生产,虚拟资本的意义因此处于流变的状态。同时,正如德里达所谓意义的“延异”特性,即意义的浮现总是既有延迟又具差异的,伴随符号互动的进行,玩家也可能发现虚拟资本所承载的隐蔽意义,进而实现意义的更新。

只要有玩家的发送意图和解释自觉,符号互动在比赛中就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若符号传达过程中的发送主体和接收主体拥有处理意义问题的充分自觉性,比赛就能够成为一个以符号交换为“战术”的竞技场。基于取得胜利、完成任务等共同目标,玩家可通过互相发送语音和文字以交换个人意图、敌方信息和战术考量,亦可通过释放技能、发动攻击和发出战术指令来吸引其他玩家。借助比赛中的个人面板,玩家之间还可以相互查看队伍内其他成员的角色选择、技能搭配和武器配置等关键信息,通过交换各自的“底牌”以谋划团队战术协作。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游戏者的形象就是面对一大堆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他所拥有的特定资本,与此对应的是他在游戏空间中的相对力量、位置和策略性取向^{[4]124}。

3. 符号暴力下的等级化原则:一种支配性的能指与权力

张怡^[22]指出,布尔迪厄大胆地将资本概念和权力概念相联系,而这一权力概念包括物质、象征、文化或社会权力形式,如此一来,其资本概念便从物质化状态广泛延伸至文化符号领域。在电子竞技比赛场域中,占据不同位置的玩家会刻意地为其所拥有、青睐的资本注入关于权力与地位的意义,并且依赖这种方式建构一种对自身和所属群体有利的等级化原则,或一种价值框架。不同的虚拟资本,其属性特征和功能相异,所能创造的游戏产物也有所不同。相应地,其他资本或游戏产物也会因其某些特征(如操作难度低、价值含量低)在行动者的干预下使其生产者、所有者陷入不利境遇,他们难以获得来自其他位置占据者的认同。

上述等级化原则的构建显然是一种符号暴力,即通过伪装的、习以为常的形式再现经济与政治权力来强制性地推行理解与适应社会世界的方式的能力^[23]。相对于经济统治和政治宰制,符号暴力更加隐蔽,不易被人所察觉。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会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6]。在比赛场域里,作为行动者的玩家将资本作为权力的符号隐喻,并为自己依赖实践型资本所创造出的游戏成果和贡献赋予至高无上的关键地位,并以此实现对他者的贬黜和对自我的认同,进而在权力/等级体系中求得优势乃至支配地位。在《英雄联盟》和《守望先锋》等电子竞技项目中,输出型角色或技能创造的游戏产物通常是直接造成敌方角色减员,而辅助型角色往往提供各类增益、减益效果。不论是在比赛实践中还是在游戏社区中,“输出至上”的价值观总会存在,玩家倾向于认为直接击杀敌方角色比辅助队友更值得骄傲和自豪,辅助型玩家的地位也可能因此低于输出型玩家。

总之,符号学视阈下的电子竞技比赛,是玩家集中的符号交换和策略博弈的共时性场所,是玩家在电子竞技项目中参与符号表意与解释活动的核心场合,也是有着独特的竞争与协作逻辑的场域。这样的场域中充盈着海量的符号单元,是一个由纷繁复杂的符号文本所构筑的“符号空间”。包括象征型、实践型、关系型资本和元资本在内的虚拟资本经由数字技术编码和玩家符号互动的双重过程得以符号化,实现了意义的生成、传递与更新,成为内化了复杂意义关系的符号指意系统。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6][139]},这种争夺在符号象征维度同样存在。符号化后资本的意义差异,被行动者用于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权力/等级化原则,对其他玩家施加符号暴力,确立、维护自己或所在团体在资本争夺、积累与使用过程中的优势和支配地位。

五、电竞场域符码转换逻辑对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启示

如前所述,本质为数据和代码的虚拟资本,会借由数字技术编码和玩家符号互动的过程得以符号化,实现意义的生产、传递与更新,成为符号指意系统。这意味着,虚拟环境中的资本具有符号化的潜质。人本质上是符号动物,符号化的思维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电子竞技比赛场域中虚拟资本的符码转换逻辑,或许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信息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全球化语境,提供了关于当前和未来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洞见,其一经提出,便在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引起多方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哲学概念,也是涉及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及其交往的现实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

重要维度,就在于文明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由不同地域习俗、思维模式、伦理和行为规范构成的形态各异的文明,不仅在本质上没有相互冲突的内在规定性,而且不同文明的交融更将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24]。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质是关于人类自身存在方式的文化想象,其结成的主要纽带在于共同的价值认同^[25]。由此可见,符号化的交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是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内核之一,基于前文的论述,我们不妨从虚拟资本符码转换的逻辑分析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如何有效助推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其一,虚拟资本的符号化过程反映了现实场域和技术生成的虚拟场域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应着眼于现实世界,同时也应关注互联网络、社交媒体、电子竞技等虚拟场域。如今,虚拟场域中汇集了来自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行动者,他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的文明范畴,但在虚拟场域中实现了共同在场。他们在虚拟场域中的文化实践带来了文化符号的流动和意义的传递,为跨越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潜力,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辟了新的思路。

其二,虚拟资本可以由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转换而来,进而被符号化,而虚拟场域中也存在着具有独特属性的资本类型。这启示我们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应针对具体的文化场域来量身定制传播策略,同时话语体系也应采用差异化的组织方式,而不是讲千篇一律的故事。周劭人^[26]认为,中国近十年对外传播主要采用了三种基本话语体系和思路,即外宣话语体系、国际话语体系和中华文化话语体系,这三种话语体系各有利弊。因而我们应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适合特定场域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其三,虚拟资本符码转换的逻辑凸显了国家硬实力转化为表征现实话语权力的重要性。正如前文所述,符号指意的差异会被玩家用于制造符号暴力,建构一套权力/等级化原则。这套原则会影响不同位置占据者之间的关系,使玩家在虚拟资本的争夺、使用与分配中占得先机,进而达成某些目标。在国际传播的视阈下,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当代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体现。所谓话语权,简单讲就是引导或控制舆论能力及与其相关的权力^[27]。鉴于此,以一种妥帖而有效的路径促进话语权形成的合法性应成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四,符号化后的虚拟资本以多模态的符号存在,这要求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需要采用多模态的符号形式,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构建立体、充盈、动态、多维的表征体系,运用媒体融合思维,打造系统性的传播矩阵。同时,由于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实践具有自身的内生规律和原则,因此引入新媒介技术和多符号模态的基础就是尊重这些规律,而不是一味追求媒介形态的简单叠加,必须认识到和谐相融才是关键所在。从语言符号角度来看,拓展传播语种规模,搭建多语种新媒介平台,形成视听互动、资源共享、形态融合、语种集合的对外传播特色^[28]十分必要。

其五,电子竞技场域中的虚拟资本是通过数字技术编码和玩家之间的符号互动得以符号化的,玩家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玩家的符号表意与解释实践是实现虚拟资本符码转换的重要环节,这启示我们应扩展传播主体,让多元主体参与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来,立足个人经验与国家发展,发挥个人讲好“中国故事”的潜力。此外,面向全世界的“中国叙事”也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正如赵月枝在一

次访谈中所说的,如果要使“中国叙事”有世界意义,就要鲜明地站在本国和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之上^[29]。

参考文献:

- [1] 周逵. 作为传播的游戏: 游戏研究的历史源流、理论路径与核心议题[J]. 现代传播, 2016(7): 25.
- [2] 陈静, 周小普. 规则、随机性、符号: 作为意义生产模型的“游戏性”及游戏的媒介特质: 以《王者荣耀》与《阴阳师》为例[J]. 国际新闻界, 2018(10): 134.
- [3] 考夫卡.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 李维,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3.
- [4] 布尔迪厄, 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5]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M]. 包亚明, 译.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7.
- [6] 布尔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7] 阳骏滢, 黄海燕, 张林. 中国电子竞技产业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对策[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3): 201.
- [8] 杨家明. 电子竞技比赛中玩家身份形成机制的符号学研究[J]. 科学与财富, 2018(16): 263.
- [9] 卡尔, 白金汉, 伯恩, 等. 电脑游戏: 文本、叙事与游戏[M]. 丛治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0] 谢恬. 游戏玩家人物身份形成途径的符号学分析: 以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仙剑情缘叁》为例[J]. 丝绸之路, 2017(4): 20.
- [11] 布尔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12] 刘海龙. 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J]. 国际新闻界, 2005(2): 53.
- [13] SCHATZKI T. Theory and conceptual centrality in Bourdieu [J].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018 (4): 502.
- [14] 卡西尔. 人论[M]. 甘阳, 译.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3.
- [15]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明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02.
- [16] MCLUHAN M. The gut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7.
- [17]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42.
- [18] 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 游戏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15.
- [19] 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王东亮,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83-84.
- [20] BARTHES R. Elements of semiology [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7: 81-91.
- [21] 斯道雷.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 常江, 译. 7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56.
- [22] 张怡. 文化资本[J]. 外国文学, 2004(4): 61.
- [23] 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 陶东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01.
- [24] 周宇豪. 文化人类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J]. 新闻爱好者, 2018(10): 12.
- [25] 杨抗抗.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时代意蕴[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9.
- [26] 周劭人. 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核心概念应回归人民性[J]. 青年记者, 2019(30): 69.
- [27] 周宇豪. 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 理论品质、现实回应、主要内容[J]. 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7(3): 30.
- [28] 孟威. 改进对外传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J]. 新闻战线, 2014(7): 82.
- [29] 姬德强. 探究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多重维度: 专访国际知名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J]. 对外传播, 2014(5): 13.



引用格式: 柏必成. 智库传播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基于智库传播能力的五种影响因素的分析 [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1): 77-83.

中图分类号: C93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1.01.009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1)01-0077-07

智库传播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基于智库传播能力的五种影响因素的分析

Analysi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ink tank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factors of think tank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柏必成

BAI Bicheng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决策咨询部, 河南 郑州 450018

关键词:

智库;
传播能力;
影响因素;
提升路径

摘要: 智库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思想产品的质量, 也取决于其传播能力。智库传播能力受传播主体的专业性、传播对象的精准性、传播内容的适宜性、传播方式的有效性和传播时间的及时性五种关键因素的影响。应增强传播主体的专业性, 提高传播对象的精准性, 注重传播内容的适宜性, 提升传播方式的有效性, 强化传播时间的及时性, 以提升智库传播能力。

[收稿日期] 2020-08-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Z016); “中原千人计划”支持项目(ZYQR201810182)

[作者简介] 柏必成(1982—), 男, 河南省漯河市人,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智库建设。

智库的传播能力是智库推介、推广、宣传、营销其思想产品以对政府、公众、媒体等产生影响的能力,也是智库公共关系(公关)能力的重要体现。智库传播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智库影响力的大小,关系到智库成果能否得到应用转化。不少学者充分认识到了思想产品传播的重要性。德洛尔^[1]强调,思想产品的传播与思想产品的质量同样重要;朱瑞博等^[2]也指出,智库影响力的形成和获得不仅要靠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且要靠对研究成果的推广和传播。

一、影响智库传播能力的五种关键因素

丁炫凯等^[3]认为,在智库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三个关键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工具(传播的技术、方式、方法)和传播受众。除这三个要素外,传播内容和传播时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智库思想产品的传播涉及由谁进行传播(传播的主体)、向谁进行传播(传播的对象)、传播什么样的内容(传播的内容)、以什么方式进行传播、利用什么时机进行传播(传播的时间)。相应地,智库传播主体的专业性、传播对象的精准性、传播内容的适宜性、传播方式的有效性和传播时间的及时性均对智库的传播能力产生着重要影响,共同构成了影响智库传播能力的五种关键因素。

1. 传播主体的专业性

传播是有规律的,传播主体只有熟悉传播规律、遵从传播规律、运用传播规律,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便对传播主体提出了专业性的要求。智库的所有人员在特定的时间与场合都有可能成为智库产品、智库品牌、智库形象的传播者(传播主体)。不过,智库并不会对其所有人员均正式赋予思想产品传播的责任,有些人员的职责与思想产品的传播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对于智库的研究人员而言,他们作为智

库思想产品传播主体的地位则是可以明确的^[4],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量的传播活动必须有研究人员直接参与其中,如参加决策者召开的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咨询会等,以及接受媒体的采访等。除智库的研究人员外,传播主体还包括专门负责传播、沟通与推介事务的团队或部门。

2. 传播对象的精准性

任何思想产品的传播都有其对象和受众,传播对象的定位出现偏差,就无法做到精准传播,精准传播所强调的主要就是传播对象的精准性。对于不同的思想产品,其所适应的传播对象也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传播对象有着各自的具体需求。衡量传播对象精准与否,关键要看智库传播的思想产品与传播对象的需求是否发生关联,关联程度越高,传播对象的精准性就越强。传播对象的需求可能是现实的需求,也可能是潜在的需求。当智库传播的思想产品能够满足决策者的咨询需求,或者能够触发传播对象对某项议题的关注时,便说明智库的传播对象具有精准性。智库思想产品传播对象的精准性对智库思想产品的传播有重要影响。一是关系到智库传播的目的性。传播的对象不精准,往往意味着传播的目的不明确,智库不清楚要影响什么样的政策主体,也不清楚要对传播对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是关系到思想产品的应用转化。一项研究成果究竟会不会被决策者采纳,首先取决于决策者对这项研究成果有没有需要。若智库只是将思想产品传播给了没有需要的决策者,那么,不论这一思想产品质量如何,都很难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应用转化。

3. 传播内容的适宜性

智库传播的内容是智库产出的思想产品,是智库发表的观点与见解,也是智库提出的意见与建议。传播内容的适宜性首先意味着思想产品的高质量,因此思想产品的质量控制系统

不仅对于提高智库在思想产品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能力是重要的,其对于增强智库在思想产品推介环节的传播能力也是重要的。但传播内容的适宜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产品的高质量,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在特定情境下并不一定都是适宜于传播的思想产品,而换了另外一个情景,其适宜性可能就大为增强了,思想产品的传播效果也会得到明显改善。

4. 传播方式的有效性

传播方式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指传播的工具、技术、策略、途径、渠道等。智库的传播方式有多种,可分为直接的传播与间接的传播,前者是智库直接面向决策者进行的传播,后者是智库借助公众、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或学术界的中介作用所进行的传播。以直接方式进行的传播,有的具有公开性,有的则是不公开的(如与决策者的私下交流等);以间接方式进行的传播,一般都是公开的,利用的是公开和公共渠道。另外,智库的传播方式还可分为书面传播与口头传播,前者如向决策者报送内参报告、在平面媒体发表专栏文章等,后者如与决策者进行私下的非正式交流、面向公众发表演讲等。无论是书面传播还是口头传播,本质上都是对智库思想产品的传播。书面传播的内容有着严格的思想产品形式(如内参报告、专栏文章等),口头传播的内容不一定有严格的思想产品形式(不以研究报告等文本作为载体),但仍应具有思想产品的实质,应当是经过严谨研究而形成的观点和得出的结论,否则口头传播便是空洞乏力而没有意义的。传播的方式服务于传播的目的,任何一种传播方式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可采取直接面向决策者的传播方式或借助媒体的力量实现传播的目的。

5. 传播时间的及时性

麦甘在《全球智库报告》中强调思想产品要“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形式传递到正确的

(人的)手中”^[5],传播时间正确意味着智库抓住了传播的时机,亦即传播时间的及时性。传播时机不可能长时间停留,错过了时机,智库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便会陷于被动,也会失去介入政策过程的先机。传播时机既表现为政策之窗的开启,又表现为决策咨询需求的形成。政策之窗开启的诱因有多种,如焦点事件的发生、负面政策效果的反馈、新的决策者的当选等^[6]。政策之窗的开启为有关议题进入政策议程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智库介入政策过程提供了机会,所以政策之窗也可被称为“机会之窗”。决策咨询需求既包括进一步界定问题的需求,也包括寻求解决方案的需求。决策咨询需求形成,表明传播时机的出现,不过,智库能不能抓住这种时机,还取决于智库推出的思想产品是否适合决策者的需求。

二、制约智库传播能力的因素

明确了影响智库传播能力的五种关键因素后,我们便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制约智库传播能力的因素。

1. 传播主体专业性不强

传播主体专业性不强,表现在智库的传播主体(如智库的研究人员)尚缺乏正确的传播意识,不熟悉传播规律,其传播行为还是在“跟着感觉走”,既不善于运用智库内部的资源开展传播活动,又不善于借助媒体等外部的力量开展传播活动。此外,智库还未形成专门和专业的传播团队,对思想产品的传播缺乏系统谋划,传播资源未得到统筹使用,智库传播活动处于分散化和碎片化状态,没有产生出综合效应、整体效应和品牌效应。

2. 传播对象精准性不够

传播对象精准性不够,表现在智库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不分对象、漫无目的,不了解传播对象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不分重点传播对

象和一般传播对象,虽然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是收效并不理想。传播对象精准性不够往往也意味着智库思想产品的针对性较弱,很可能是局限于泛泛而论,“不少决策咨询报告领导也在看,掀掀翻翻,但实际上认为没有价值”^{*},把智库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浪费在了决策者并不需要的所谓研究上。

3. 传播内容适宜性欠缺

传播内容适宜性欠缺,表现在智库的思想产品质量不高,缺乏对思想产品在进入传播渠道之前的质量控制和质量审核。此外,还表现在智库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上不具有能动性,有什么思想产品就传播什么思想产品,不能因地、因时制宜,致使有些原本质量较高的思想产品的传播与特定的情景不相协调甚至格格不入。

4. 传播方式有效性不足

传播方式有效性不足,表现在智库不善于开辟新的传播渠道,不善于运用新的传播技术,不善于尝试新的传播方式,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上存在着严重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如主要是通过新闻门户网站开展面向公众的社会化传播^[7]。这就使智库传播方式的选择空间十分有限,无法根据传播目的在不同的传播方式当中灵活、权变地作出选择。

5. 传播时间及时性缺乏

传播时间及时性缺乏,表现在智库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没有真正将时间因素摆放在一个足够重要的地位,缺乏对传播时机的准确把握,也缺乏有效利用时机的准备和能力,当时机来临时反应迟缓,不能迅速采取行动,以致有些献言建议成为“马后炮”^[8],使思想产品传播的效果和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效果大打折扣^[9]。在访谈中,有政府官员讲到,有时对某个问题的处

理意见都已经确定了,却收到了一摞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言报告^{**}。

三、提升智库传播能力的路径

提升智库传播能力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 增强传播主体的专业性

其一,加强对研究人员在思想产品传播方面的培训。这种培训可采取多种形式,如理论知识传授、外出访问学习、案例研讨交流、既往经验总结反思等。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可帮助研究人员树立并强化正确的传播意识,获得科学的传播理论指导,增强传播的实战能力。

其二,为研究人员的传播实践积极创造条件。研究人员对传播规律的掌握和运用离不开实践,智库应为研究人员的传播实践提供机会、创造条件。比如,智库可以通过邀请决策者到智库发表演讲或邀请决策者参与智库的课题研究等方式,为专家学者提供与决策者接触的机会,帮助研究人员与决策者建立联系。再比如,智库还可以将专家学者推介给媒体,帮助研究人员和媒体建立稳定的联系,军事科学院就很注重这一点^[10],这可让专家有更多的机会在媒体上露面,成为公众所熟知的明星学者。

其三,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专门负责传播、沟通与推介事务的团队或部门。有不少学者强调智库应拥有专业的转化团队^[11]、专业的媒体工作人员^[12]或专业的市场团队^[13]。一些智库有自己专业化的新媒体运营人员,还有不少国际知名智库设置了专门负责成果传播的部门。例如,兰德公司设有对外事务部,具体负责处理与国会、媒体等的关系^[14];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设有传播与出版部^[15]。设立专门的传播与推介部门,有助于改变智库分散化、碎片化的传播

* 2020年9月26日某省级智库负责人L先生在郑州的演讲。

** 来源于2016年2月27日在郑州对某政府领导G先生的访谈记录。

状态,便于智库在统筹传播资源的基础上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播。相对于个体化和分散化的传播,专业化的传播与推介部门更注重实现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与传播载体/形式的有机结合,发挥好组织化传播的优势,策划与实施一些主题集中、形式多样、连续性强的传播活动,使智库的传播产生出综合效应、整体效应与品牌效应。同时,智库应加强与有关各方的联系,以不断扩充自身可资利用的传播资源。

2. 提高传播对象的精准性

其一,了解传播对象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对传播对象的现实需求,应尽量得出客观的认识;对传播对象的潜在需求,应力图作出准确的判断。智库在开展传播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决策者和公众等的需求,从而对思想产品的传播对象进行准确定位。事实上,智库在开展研究活动时,就应充分考虑这些需求,因为智库本质上不是为自己进行研究的,而是基于决策者和公众等的需求进行研究的。如果智库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十分明确针对的是哪部分政策主体的需求,那么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就容易准确定位传播对象。这也表明,智库的研究影响着思想产品的传播,为提高传播对象的精准性,智库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明确研究成果的需求方和传播对象。

其二,对传播对象作出合理区分。在明确需求的基础上,可将智库的传播对象区分为重点传播对象和一般传播对象,前者的需求与智库传播的思想产品有着深度契合,后者的需求与智库传播的思想产品有着一定契合。对于重点传播对象,智库应重点采取传播措施,争取他们对智库研究成果的重视,以力图实现智库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

3. 注重传播内容的适宜性

其一,提高传播内容的质量。传播内容应严格符合质量标准,智库不应传播质量低劣的思想产品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在思想产品的生

产中,研究成果的质量控制等对思想产品的质量起着保障性作用。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应加强对思想产品的质量管控,对于未通过质量审核的思想产品,传播主体应拒绝其进入传播渠道。另外,传播主体还应从形式上对思想产品进行一定的加工和完善,如采用多媒体技术,把传播内容以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加以呈现,以使之更符合传播的需要。

其二,明确传播内容的责任主体。思想产品的生产主体对思想产品的生产承担有责任,思想产品的传播主体也应对思想产品的传播承担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智库的研究人员既是思想产品的生产者又是思想产品的传播者,这时他们承担的是双重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思想产品的传播主体并不负责思想产品的生产,这时传播主体只负传播的责任。但不论如何,传播主体都是一种明确的责任主体,如因传播不当内容而造成了不良后果与影响,就应承担相应责任。

其三,实现传播内容与时势条件的契合。时势是智库思想产品传播所面临的有关背景因素与环境条件,如政治形势、舆论环境等。在特定的时势条件下,决策者更容易关注某些类型的议题,更可能对解决某些类型的问题产生需求。时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决策者的注意力和具体需求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对智库传播内容的适宜性提出了要求。为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智库不应对传播内容毫无选择地盲目传播,而应使传播内容与时势条件相契合。但这并不是要鼓励智库在思想产品的传播中搞投机,或者提倡智库专门对决策者投其所好,而是强调智库应把时势条件作为决定传播内容选择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智库有时即便没有面临有利的时势条件,也会义无反顾地把某一思想产品给推介出去,这是由于智库对这一思想产品的价值有足够的信心,也由于智库认为有必要通过自己的提议来尽快唤醒

人们的某种意识(如对某项议题的关注)。对于这样的情况,现实中也是存在的,并且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4. 提升传播方式的有效性

其一,确保传播方式符合传播目的。传播的目的体现为智库希望所传播的思想产品对哪些政策主体产生影响,不论智库选择和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方式,都应有助于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如果智库只是希望对决策者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无意借助于公众和媒体等的力量,那么间接的传播方式便不符合传播的目的;如果智库希望对包括政府、公众、媒体等在内的各类政策主体产生广泛的影响,那么直接的传播方式和间接的传播方式均符合传播的目的。只要是符合传播目的的传播方式,智库都可以使用。由于不同的传播方式各有其优势,智库往往需要把它们组合起来使用,也就是同时使用不同的传播方式,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不过,在不同的传播方式中,也存在着一个主次关系问题,有的传播方式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的则起着辅助性的作用,对于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传播方式,智库尤其不能忽视。

其二,扩大传播方式的选择空间。智库能否找到具有关键性的传播方式加以运用,能否综合运用不同的传播方式以发挥它们的互补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库是否拥有足够大的传播方式选择空间。选择空间过于有限,智库便会无从选择、无可选择,更不用说找到最为关键的传播方式或综合运用不同的传播方式。扩大传播方式的选择空间,智库就要不断打开新的传播渠道,注重吸收新的传播技术,让自己有条件在更多可以利用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当中进行选择,也让自己有能力开展全方位、全媒体、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16]。例如,美国的卡托研究所就拥有多种可以利用的传播方式:(1)接受媒体采访以及观点被媒体引用;

(2)发表专栏文章;(3)发布研究报告;(4)出版具有长期价值的著作;(5)开办学生项目;(6)开展国际传播;(7)办好智库网站;(8)使用多媒体战略;(9)举办会议、论坛、在线项目等公共活动;(10)通过推特、脸书、微博和领英等建立数字化社群;(11)参加联邦和州议会举行的听证会;(12)为高等法院提供辩护状。

其三,打破传播方式使用上的路径依赖。人的行为选择存在着惯性,智库在传播方式的使用上也是如此,一旦习惯了某种传播方式,便可能不再有强烈的意识和足够的动力去尝试新的传播方式。这样既不利于扩大传播方式的选择空间,又不利于发现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为打破传播方式使用上的路径依赖,智库应正确认识现有传播方式的功用和局限,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尝试新的传播方式,以弥补现有传播方式的不足,并逐步使传播方式的使用具有灵活性和权变性。

5. 强化传播时间的及时性

其一,加强对传播时机的识别。在明确传播时机类型的基础上,智库应密切关注那些影响政策之窗开启的相关因素,及时捕捉由于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出现的传播时机;同时,也应及时了解有关决策咨询需求变化的信息,对决策咨询需求(不论是进一步界定问题的需求还是寻求解决方案的需求)的形成保持足够的敏感。

其二,为传播时机的到来作充分准备。传播时机可能是偶然出现的,但抓住传播时机却是智库长期准备的结果。对于一个特定的传播时机,有的智库能抓住,而有的智库却抓不住,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智库是否为这一时机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由于资源等方面的限制,智库不可能抓住所有的传播时机,只能去努力抓住自己为之有所准备的传播时机。智库为传播时机的到来进行准备,首先,应做好研究上的准备。智库不能等传播时机到来

的时候再去开展研究,智库的研究成果不能都是“冲击-反应”型的成果或“临时抱佛脚”型的成果^[17],智库应在传播时机到来之前就完成必要的研究积累和研究准备。其次,智库应持续关注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感知传播时机的到来。再次,智库平时应努力打开和拓展传播渠道,确保在传播时机到来时拥有合适的传播渠道可以利用。

其三,在传播时机来临时迅速反应。当传播时机来临时,智库应迅速作出反应,反应速度越快,越有可能抓住传播时机。智库对传播时机的反应速度一要看智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识别已经出现的传播时机,二要看智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推出因应时机的思想产品,三要看智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思想产品进入合适的传播渠道。智库在以上三个方面花费的时间越少,对传播时机的反应速度就越快。因此,为了在传播时机来临时迅速作出反应,智库应做到快速识别传播时机,快速推出因应时机的思想产品,快速使思想产品进入合适的传播渠道。

传播主体的专业性、传播对象的精准性、传播内容的适宜性、传播方式的有效性和传播时间的及时性,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促进智库传播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DROR Y. Required breakthroughs in think tanks [J]. Policy Sciences, 1984(3):211.
- [2] 朱瑞博,刘芸. 智库影响力的国际经验与我国智库运行机制[J]. 重庆社会科学,2012(3):110.
- [3] 丁炫凯,李刚. 新型智库传播力评价及其实证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2018(10):29.
- [4] 胡钰,赵平广. 中国智库传播力的评价与提升: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为例[J]. 现代传播,2020(1):78.
- [5] MCGANN J.G.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 (2020-01-30)[2020-04-20]. [https:// repository. upenn. edu/cgi/view-content. cgi? article = 1018&context = think_tanks](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8&context=think_tanks).
- [6] 金登.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 丁煌,方兴,译.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12.
- [7] 冯雅,李刚. 新型智库传播现状与优化策略研究:基于CTTI来源智库媒体影响力的实证分析[J]. 图书与情报,2019(3):20.
- [8] 柏必成,丁煌. 政策议题性质与智库的政策参与[J]. 学习论坛,2019(4):62.
- [9] 胡隆辉,柏必成. 智库主动介入与被动介入政策过程的比较分析[J]. 中州学刊,2017(11):78.
- [10] 肖飞,李习文. 国际智库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经验浅析[J]. 对外传播,2015(7):21.
- [11] 万玉凤. 高校智库:热度比较高脚步有点小[N]. 中国教育报,2015-03-24(01).
- [12] WIARDA H J. Think tanks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ew ideas, new “tanks”, new direc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5(4):521.
- [13] 刘潇潇. 我国官方智库的发展及改革思路[EB/OL]. (2016-03-31)[2020-03-10]. [http://www. cssn. cn/xspj/201603/t20160331_2947921. shtml](http://www.cssn.cn/xspj/201603/t20160331_2947921.shtml).
- [14] Rand Corporation. Organization and divisions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EB/OL]. (2017-11-18)[2020-04-20]. [https:// www. rand. org/about/glance. html](https://www.rand.org/about/glance.html).
- [15] Chatham House. Staff and structure [EB/OL]. (2018-01-14)[2020-04-20]. [https:// www. rand. org/about/organization. html](https://www.rand.org/about/organization.html).
- [16] 吴瑛,张结海. 中国智库传播中国声音:基于国际媒体引用视角的评估[J]. 国际观察,2015(3):70.
- [17] 李刚. 着力增强新型智库“生产力”和“影响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1-16(06).



引用格式:李科. 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策略及其优化: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84-90.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10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84-07

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策略及其优化

——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

Strategies and it's optimization of mainstream medi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porting

—Take the *People's Daily* COVID-19 epidemic reports as an exmple

李科

LI Ke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民日报》作为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统筹利用资源优势,传递官方声音,彰显全局视野;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多形式综合呈现,注重视觉传播;进行共情传播,增强情感认同;多维立体传播,强化服务作用等传播策略占据信息传播的主阵地,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中也存在过量负面信息和过度煽情引起公众焦虑、碎片化传播引起阅读障碍甚至出现歧义、信息发布滞后助长谣言传播和新闻反转等问题。主流媒体应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优化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构建良好的危机传播机制,防止发生舆论失焦现象;倡导建设性新闻理念,强调媒体的公共责任感;加强健康传播,满足公民健康信息需求。

关键词:

主流媒体;

《人民日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肺炎

[收稿日期]2021-01-10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19WTSCX075)

[作者简介]李科(1983—),男,湖南省郴州市人,广东金融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传媒产业与政策、新媒体传播。

2019年年末、2020年年初之交,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也考验着新闻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能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主流媒体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快速行动,在新闻报道和舆情引导方面均有突出表现。全国各级政府在抗疫表彰工作中对媒体机构、新闻记者的嘉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成绩固然可喜,但是如何凝练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成功经验,同时反思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优化报道策略、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则是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之后更应该思考的问题。业界凭借亲身参与抗疫的优势,纷纷总结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有效做法,从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公开发布的工作报告、业务论文中可见一斑。学界对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央视《新闻联播》^[1]、《人民日报》微博^[2]、国家级媒体短视频生产^[3]等方面,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人民日报》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一直以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次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不例外。鉴于此,本文拟从学理的角度,理性地观察《人民日报》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分析其可取经验和不足之处,探讨主流媒体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优化策略,以供学界参考。

一、《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策略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承担着传递信息、缓解消极情绪、服务公众和社会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民日报》统筹利用资源优势,采用恰当的传播策略,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1. 传递官方声音,彰显全局视野

人民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崔士鑫认为,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首要职责与功能就是提供真实权威的信息^[4]。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发布的有关疫情的信息中,80%以上来自政府等官方机构(如各级卫健委、疾控中心、医疗卫生机构等)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发布的内容,因此其新闻报道内容有较强的公信力。《人民日报》传递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官方声音会增强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众也可以在媒体平台中获得准确信息。其次,主流媒体发布的官方信息能更理性地引导大众舆论。再次,主流媒体发布官方信息,进行统筹宣传规划,有利于在突发事件中安抚公众因信息渠道受阻引起的恐慌情绪,减少由于信息不透明和传播不对称而出现的谣言和传言的传播,从而加大对于事件处理的信息通报和政策宣传的力度,变消极情绪为积极应对。最后,主动传递官方声音,有利于塑造国家、政府、社会的正面形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通过报道党员干部、军人、医生、志愿者等的抗疫事迹和先进人物,塑造了党和政府心系大众、服务人民、高效履职的形象,反映了民众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

《人民日报》作为国内主流媒体,在抗疫新闻报道中高瞻远瞩,妥善设置传播议程,高效引导舆论向积极理性方向发展。其借助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抖音账号等新媒体矩阵,通过增设专题栏目、抓住热点话题、丰富报道形式,快速传播客观真实的疫情新闻,在提供全面信息满足人民知情权的同时,也注意平衡积极与消极两种情感色彩的新闻发布频率。微信公众号的《50 万米高空看武汉,最近发生了什么》推文,微博上的“疫线 vlog”“全民战疫日记”等新

闻话题和“抗疫前线的00后”主题海报等一系列新闻报道,获得海量点赞,极速圈粉,为全面抗疫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可以说,《人民日报》在宏观视角和全局视野下,统筹整合传统渠道与新媒体平台,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疫情信息传播活动。

2. 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生活

在以往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主流媒体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的宣传和解读、抗灾救灾中各级领导干部与英雄人物的采访和报道上。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主流媒体转换了报道视角,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接地气、平民化的传播角度更有人情味,彰显了人文关怀。比如,《人民日报》在对武汉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报道中,大量报道医院内医患相处细节,如医生教患者跳东北秧歌、医护人员为患者庆生、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上写着“好棒!体温正常”“加油,么么哒!”等俏皮话。同时,主流媒体在报道疫情相关信息时,不仅关注医护人员和患者,还关注疫情期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转发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特稿《快递小哥的手机里藏着武汉人最真实的生活》,通过快递小哥群体的工作折射“封城”之后武汉市民的生活状况。《人民日报》通过转换报道视角,关注普通民众生活,让受众感受到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近,仿佛这些事情就在身边发生,报道中的人物就是身边的人物。

在疫情防控紧张阶段,《人民日报》发布的新闻报道较为严肃,语言文字表述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传递出对待疫情的严肃认真态度,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公众对疫情的防范意识;在疫情得到有力控制之后,《人民日报》的语言风格明显转变,语言文字较为轻松活泼,缓解了疫情期间公众的紧张情绪,极大地提升了公众战胜

疫情的信心,从而使新闻报道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3. 多形式综合呈现,注重视觉传播效果

《人民日报》积极利用旗下新媒体矩阵,强调可视化呈现,多渠道多形式地综合宣传,提升了公民疫情防护意识,增强了人们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疫情新闻时,利用新媒体技术优势,不仅有常见的图文报道、短视频等形式,还大量使用新闻海报、专栏vlog、直播、数据新闻等新颖的报道形式。以新闻海报形式为例,《人民日报》将疫情信息整合为“图表+配文”的媒介产品,将复杂的数据和新闻信息直观简略地呈现出来。例如,疫情初期推出的《最美勒痕》,用医护人员脸上深陷的勒痕形象地表现了医护人员的勇毅、艰苦;在援助武汉的抗疫医疗队撤离时推出的32幅“感恩”海报,用温情画面和诗意话语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也展现了众志成城的抗疫史诗。此外,《人民日报》新闻海报还被广泛用于数据新闻的发布,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通过制作图表、时间线、地图、视频、动画等方式将枯燥的信息简单化、生动化,方便公众保存、转发,使公众能更加清晰直观地理解新闻信息,从而使新闻报道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短视频、vlog、直播等新型传播形式也在疫情防治信息宣传方面广泛应用。短视频具有生动直观、易理解、易传播、受众门槛低、受众广泛等特点,成为疫情信息发布的主要形式。《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短视频新闻有原创和转载两种信息来源。原创内容主要是新闻发布会片段、权威专家的采访片段、抗疫一线的现场情况和医学科普知识等;转载的主要是顶流或者巨流视频,如一个武汉小伙子发布的《一个武汉伢的武汉日记vlog》,“回形针PaperClip”

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等。《人民日报》发布的信息是互联网平台关注度和转载量较高的内容类型,体现出其严肃、有公信力的主流媒体形象;转发的短视频和 vlog 以其草根性和亲近公众的特点中和了主流媒体的严肃性,为新闻报道增添了故事性,强化了新闻与公众的情感连接。

4. 进行共情传播,增强情感认同

《人民日报》在进行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时,不仅注意新闻报道内容的客观叙述,还有意识地加强共情传播,增强公众的情感认同。共情传播在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倡议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新闻从业者也逐渐认识到新闻报道所隐含的情感温度对于公众甚至社会风气形成的影响力,以及媒体与公众进行情感交流的必要性。《人民日报》发布的新闻报道中共情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情感符号的使用。大量使用倾向性比较明显的词语和带有情感色彩的修辞手法和标点符号。二是新闻图片和新闻海报的运用。新闻图片和新闻海报的直观形象性特点,容易引发用户的情感共鸣。三是正面人物形象、情感关系的选取,如“英雄”“亲情”等。这些叙述对象饱含正向价值,是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肯定,当公众阅读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在有倾向性的叙事方式和语言文字的影响下,会潜移默化地勾起其情感记忆,从而引发其情感共鸣。

《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不仅凭借发布官方权威信息来提升媒介公信力,还在报道中加强情感呼唤,通过共情传播来引导公众舆论态度,维护国家、社会积极抗疫的正面形象。把握受众心理,做好情绪引导,引发情感共鸣,是主流媒体抢夺受众资源和话语权的重要策略^[5]。社会情感的作用不容小觑,尤其在“人人手握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人民日报

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对共情传播的运用,堪称示范。

5. 多维立体传播,强化服务作用

疫情暴发后,《人民日报》推出多形式报道新闻和多渠道立体分发的传播策略,通过线上线下互联互通,在信息传播中加入服务窗口等,切实为抗击疫情服务。全媒体矩阵下各个传播载体的不同特点和优势使得《人民日报》的内容生产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迅速触及具有不同需求的受众,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人民日报》将其官方微博与微信公众号互联互通,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设置特色栏目,提供便民服务。例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疫情扩散较快时推出《紧急扩散》栏目,用来发布新增病患的出行路线等,利用微博平台去中心化特点快速寻找密切接触者。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文图文并茂,与微博碎片化发布特点相比,微信公众号推文更适合发布深度资讯。因此,借助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推送了许多疫情深度报道类文章,再加上朋友圈的强关系传播,这些报道一经发布便得到网民大量转发传播。不仅各家媒体为防疫信息传播助力,各类互联网应用平台也在其首页积极推送相关报道,营造全民关注疫情的舆论氛围。例如,微博 APP 在《推荐》栏目下设《抗击肺炎》专栏;支付宝 APP 在首页设置疫情数据图表,发布健康码,追踪公众出行轨迹;微信 APP 设置辟谣通道,鼓励民众举报谣言,了解准确情况,保证信息传播的透明度和准确度。各大媒体和互联网应用程序增强了自身的服务意识,彰显了其社会责任感。

二、《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存在的问题

《人民日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新闻报

道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 过量负面信息和过度煽情引起公众焦虑

情绪传播有两类:一类是正向情绪的传播,如东北医生教患者扭秧歌来舒缓紧张情绪,这种新闻能传递给受众积极向上的情绪;另一类是负面情绪的传播,如一线医生因过度劳累而晕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新闻报道会让受众内心的无力感、焦虑感增强。疫情期间,这两类情绪传播多次出现极端趋势,尤其是在疫情不明朗的初期,微博平台出现大量抗疫负面信息,引发受众的消极情绪^[6]。比如,武汉红十字会拦扣抗疫物资、黄冈市卫健委唐主任面对督导组询问含糊其词等,涉及官员渎职、逃避责任甚至贪污受贿的负面新闻引起网友的愤怒。在疫情得到良好控制之后,媒体又过多地发布了“加油武汉”等渲染感情的文字,这些仪式化的表达虽然能激励众人凝心聚力,呼唤出公众的悲壮情感,但是过度煽情、“鸡汤化”的叙事偏向,以及为灾难场景强加意义和象征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公众正确认识灾难,而且会让公众陷入“灾难美学”的陷阱。另外,发布过多的抗疫成果报道会使公众对于疫情反扑的警惕性降低,出现放松疫情防控等情况。因此,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不但要注重情感,还要客观叙述,关注事件的起因与结果,深度挖掘,给受众提供看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视角。主流媒体对两种情感态度的疫情新闻报道的不平衡,导致公众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和对媒体甚至国家、社会的不信任感,这不仅不利于疫情防控的推进,也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2. 碎片化传播引起阅读障碍甚至出现歧义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受众传统的信息接收习惯,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成为产生阅读障碍甚至出现理解歧义的土壤。新闻从业者对于

相关新闻的片面报道、受众的碎片化信息接收使得新闻事件在报道的过程中出现新闻反转现象,在这种反转现象的背后是群体心理的变化。图片或者短视频配简短文字的碎片化传播形式符合当前公众的阅读习惯,其简短的新闻报道形式使读者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新闻的主要信息。但是,在碎片化传播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标题党”现象,甚至传播虚假信息等情况。在关于疫情信息等公共卫生新闻和政府的政策解读等专业性较强的新闻报道中,简短“配文”不足以传递所有信息,容易遗漏重要信息,给公众造成阅读障碍甚至出现理解歧义。例如,在病毒起源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人民日报》报道有专家指出“新冠病毒源头可能是蝙蝠”的信息之后,网友纷纷对一位几年前曾食用饲养果蝠的博主使用网络暴力。又如,北京新发地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后,《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称“新发地市场中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到新冠病毒”,引起公众恐慌,给国际三文鱼交易市场造成巨大损失。而事实上,三文鱼等鱼类不具备“感染”新冠病毒的能力,市场上的三文鱼是被新冠病毒“污染”的物品,而且报道正文中提到检测到新冠病毒的物品不仅包含三文鱼,市场上的部分牛羊肉中也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由此可见,碎片化传播能够增强新闻报道传播力度,便于公众接收信息,但也存在表述不清、解释不足、深度不够等问题,这会间接成为传播虚假新闻的助推器。

3. 信息发布滞后助长谣言传播和新闻反转

技术革新给新闻传播行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在信息发布环节中,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公众参与新闻传播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媒介话语由“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移。UGC新闻生产模式的出现极大地扩充了媒体的信息来源,但同时由于官方权威信息发布滞后,这一模

式有可能导致后真相时代下“谣言传播—媒体辟谣—新闻反转”这一情况的发生。

在疫情初期,由于新冠肺炎防治方面的信息较少,谣言和虚假新闻有了可乘之机,诸如“板蓝根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等虚假信息肆意传播,导致药店的板蓝根等药品被一抢而空。这些情况都间接反映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还不够全面、深刻,进行报道策划时没能“想公众所想,急公众所急”,未能全面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会给公众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让疫情信息传播成为被动辟谣的过程,从而损害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相关政府机构的形象。

新媒体时代,技术的加持使得媒体能够即时发布新闻报道,因此媒体可以随着事态的发展或真相的调查过程进行拆分报道,变一次性报道为多次推进报道。这种报道形式能引领读者随着报道进展了解事态发展,逐渐接近复杂事件的真相,但这种报道方式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弊端,即每一次报道都不可避免地使读者出现感情倾向。随着事态的更新,新闻事件被不断消解、重构,具体来说就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或调查的深入,上一次报道的结论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报道中被辟谣、被推翻,出现新闻反转现象。频繁发生的新闻反转是后真相时代的典型表现,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报道的新闻专业性和公信力。

三、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优化策略

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成功经验为参照,面对当前传播环境下可能面临的挑战,主流媒体应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持续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

1. 构建良好的危机传播机制,防止发生舆论失焦现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危机,媒体在报道该类事件时应遵循危机传播基本规律。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媒体虽然建立了应急管理机制和危机传播机制,但是危机传播和风险沟通的意识和策略仍有缺失。危机传播关注的不仅是如何报道危机信息,更重要的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沟通,其需要通过构建良好的危机传播机制,凭借有效的危机沟通来阻止甚至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发生舆论失焦现象。主流媒体在构建危机传播机制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促进信息及时公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后,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急剧增长,任何不及时、不充分、不透明的信息报道都有可能造成谣言泛滥。此时主流媒体迅速发布准确可靠的官方信息有助于阻止谣言传播,挖掘事实真相,稳定公众情绪。当然,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并非一味倒向社会公众,而应策略性地展开。事件初期应进行公开的、不掩盖事实的完整报道;中期和后期则应强调报道的透明性,即对事件细节和进程进行真实披露^[7]。二是新闻报道应该表达合理。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社会良心的守望者,新闻报道必须客观公正,对于不同意见应持包容态度和平衡原则,积极创造客观理性的舆论环境。三是注重受众反馈。媒体应当密切监控舆情发展,关注用户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新闻报道方向,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引导公众进行理性讨论。

2. 倡导建设性新闻理念,增强媒体的公共责任感

在当前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与网络自媒体信息之间、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之间难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尖锐对立

的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度出现了自媒体指责主流媒体粉饰太平、主流媒体认为自媒体搅乱舆论环境的拉锯扯皮现象,影响抗疫意识凝聚和力量整合。对此,应倡导以建设性新闻理念为引领,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应运用积极心理学知识,减少新闻报道中的愤怒和对立情绪,提供准确、客观、有吸引力的新闻报道。以往的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习惯于寻求新闻当双方的冲突点,并将其放大来增强新闻的故事性和戏剧性,这很容易使其陷入“人为放大冲突甚至制造冲突”的新闻生产怪圈。建设性新闻理念体现了媒介的公共性和责任感,即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不让新闻报道沦为发泄情绪的工具。例如,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刊发了《比“武汉加油”更实际的是善待武汉人》一文,该文从武汉人受到歧视的现象出发,指出武汉人民同样是疫情的受害者,且绝大部分武汉人在主观上并无伤害他人的目的,提出设置集中住宿点以安置武汉市民、为其提供必要生活物资等建议。文章客观叙述了“恐鄂者”与武汉市民的冲突,理性地论证了双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不强调疫情期间双方的对立情绪,倡导平等对待疫区人民,双方互谅互信、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疫情,这才是疫情期间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应持有的态度。

3. 加强健康传播,满足公民健康信息需求

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6年的寨卡病毒等一系列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公共卫生健康问题是这个时代的常态。主流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工作应该前置,将健康传播纳入其中。加强健康知识科普和传染

病风险传播,有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公共卫生认知,做出健康行为,维护公共卫生环境。因此,新闻媒体应当顺势而为做好健康传播,将专业性较强的医学卫生问题通过大众媒体进行通俗化解释,有效提高公众对公共卫生的认知和意识。新闻媒体进行健康传播时应当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应把握受众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信息传播和健康政策宣传,构建多维立体的健康传播模式。其次,应着力加强控烟、营养、疾病筛查和防治等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话题的宣传教育,不仅主流媒体应当担负起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相关信息的责任,街道、社区等机构也应当发挥其职能优势,借助社会网络深入居民内部进行宣传教育。再次,学界应当正视健康传播的作用,将健康传播看作一个特定的新闻门类加以研究,通过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践经验来分析研究健康传播的特点、传播规律和注意事项,总结健康传播不同于其他新闻门类传播的性质和规律,并用以指导传播实践。各级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对其进行宣传报道,同时寻求健康传播更好的发展路径。

四、结语

危机中孕新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措手不及,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能力也受到了全面检视,其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收获了许多启示。在竞争激烈的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应当肩负起社会责任,遵循新闻传播基本规律,树立危机传播和风险沟通意识,以健康传播为战略引领,秉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多形式、多渠道地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和健康信息传播,唯有如此,方能赢得公众的青睐和信任。

(下转第108页)



引用格式:马寒,胡梦琪. 改革开放以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演进逻辑与基本经验[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91-10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1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91-11

改革开放以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协同育人的演进逻辑与基本经验

The evolution logic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马寒,胡梦琪

MA Han, HU Mengqi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两类课程具有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统一性;具有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价值统一性;具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引导,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进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功能统一性。从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高校协同育人的发展历程来看,“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一直都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圭臬,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40多年来,在探索协同育人方面,我们党始终坚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主阵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高校协同育人的核心内容,坚持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基本抓手,坚持以学科融合发展为内生动力。

关键词:

思政课程;
课程思政;
协同育人;
教师队伍;
学科融合

[收稿日期]2020-1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2020-CXTD-03)

[作者简介]马寒(1978—),男,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郑州轻工业大学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胡梦琪(1998—),女,湖北省武汉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高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两个关键载体,是有效应对各种错误思潮侵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主阵地和主战场。能否实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育人方面的有效协同,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1]。由于“课程思政”作为学术概念刚提出不久,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多集中于概念阐释、学理分析,以及如何实现与“思政课程”融合发展的路径探究等方面,而从历史视角系统梳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演进逻辑,概括总结基本建设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基于文献梳理,并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间高校协同育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还是从实践维度,“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一直都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圭臬,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鉴于此,本文拟深入分析40多年来协同育人的演进逻辑,总结协同育人积累的基本经验,以期破解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协同育人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逻辑基点

协同是指由不同分工部门按照一定的组织规则和工作规程共同完成预定目标或既定任务的活动形式与工作方式。具体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两者之所以能够协同起来,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具有三个层面的逻辑统一性:

其一,具有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统一性;其二,具有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价值统一性;其三,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引导学生,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进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功能统一性。因而,科学把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逻辑基点,应把二者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时代高等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以及新时代党和国家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大历史背景下来考量,并立足这二者的内在统一性来解析。

1.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协同育人的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2]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就其实现途径而言是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于一体的,而价值塑造居于“三位一体”的核心位置。对于这一界定的重大意义,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用三个“影响甚至决定着”给予了概括。从世界范围内教育事业发展来看,各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鲜明的价值主导性。马克思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3]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教育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以人为机器”的工具理性教育。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这一方针的确立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将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相结合,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到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人;从1980年末提出“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5],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再到中共十八大以来,提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70多年来,虽然我们党在育人目标的具体表述上不断变化,但根本指向始终如一,那就是把立德树人放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教育生命线的首位。从教育基本方针的确立到教育核心工作的提出再到教育根本任务的命题,不仅表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in 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变化,更说明这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决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一类课程所能完成的任务,必须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充分调动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使各类课程与思政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导是协同育人的政治指向

2014年,在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党和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提出了高等教育必须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四为”方针。在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针对思政课存在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不强,思政课与其他课程协同性不够等问题,提出了八个“相统一”,并将政治性和学理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放在了首要位置,强调要“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2]。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历程,这条政治主线贯穿始终。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6]¹⁰⁴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分界点,党中央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工作任务和时代特点,大力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1985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意见》《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

等多个配套文件,逐步形成了思政课整体建设方案(以下简称“85方案”)。中共十五大后,为适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形势变化,199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制定《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規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对思政课课程设置为教学要求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更加突出时代特征的新建设方案(以下简称“98方案”)。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国际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断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根据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以下简称“05方案”)。

通过“85方案”“98方案”“05方案”的接续实施,我国高校逐步建立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并举的基本架构,以及以思政课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法体系、学科体系等,而贯穿始终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方针在实践上有两条路径,即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的正向功能和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批判、消弭各种错误理论思潮的反向功能。当前,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40多年的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的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彰显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巨大的实践指导能力,这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证据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当代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理论此消彼长、各种风险挑战相互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严峻。因此,要实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正向教育效能最大化,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同时“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

二、改革开放以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历史演进

协同育人理念是伴随着我们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不断探索而形成发展的。这一探索过程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由于侧重点不同,各个历史时期的协同育人又展现出不尽相同的时代特点,但整体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和持续发展的趋势。

1. 各有侧重互不替代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85方案”实施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在思想政治领域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这一任务反映到高校就是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迅速恢复“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当时在高校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要继续沿用政治课、政治运动、政治工作“三政合一”的旧有教育路线;二是将政治课与科学文化课相分离。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6]104}这就准确解答了

拨乱反正时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同时,这一时期出台的《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从多个维度对高校育人工作进行统筹安排。

其一,对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地位、目标和任务进行了界定。明确指出高校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是由高校的政治属性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资本主义大学的重要标志”^{[7]28},其目标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武装学生头脑,使学生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就指明了马列主义理论课在高校育人体系中居于最高位阶,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政治功能。

其二,对各门课程和所有教师的思想教育责任进行了明确。这一时期,党中央已经意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合力过程,仅靠马列主义理论一类课程无法完成。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从红专两个方面全面培养学生,是学校各门课程和各项工作的共同任务……所有教师都应教书育人,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而且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7]28-30} 这项规定可以理解为协同育人理念的最早雏形。之所以称为“雏形”,是因为这里所指的各门课程和所有教师基本上限定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领域。

其三,对课程开设进行了初步设计。由于受改革开放之初教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制约,党中央对课程设置进行了思考但整体上缺乏系统设计。例如,1980年的《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提出了“3+X”设计方案,即以“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为基

本课,文科专业另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同时试开“科学社会主义”;理、工、农、医各专业只开基础课。为回应各类西方思潮和理论学说对学生的影响,提出不以课程而以讲座的形式逐步开设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经济思潮、政治思潮、文艺思潮评论等课程。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高校育人体系基本形成了以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为主,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教育为辅的格局,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协同育人的显著特点。

2.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过程阶段 (“85方案”—“05方案”实施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逐步突显出来,主要问题是各种陈旧思想观念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改革进程中,人们的物质精神诉求通过各种社会思想反映到高校中来;国内外秉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高校作为思想渗透的主要场所。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7]55}。1985—1987年,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制度,对高校马列主义课程的地位、任务、教学方针、课程设置、学时、大纲、教材、教学制度、教学环节、教学方法、组织管理体系等作了全面部署,强调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整个过程。为了更有针对性,党中央提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以法律基础、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为主干的思想教育课。同时要求其他人文学院也要针对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形势、政策、民主、法制、纪律、财经等方面

的学习困惑,有计划地开设相关课程。这就为以后近十年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整体性课程设计。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并作出了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对这一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95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以“两课”对思政课程进行了界定,同时提出了以当代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这是我们党对思政课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1996年,为深化“两课”教学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正式设立,自此解决了思政课作为一门特殊课程长期没有学科支撑的困境。应当说这一时期课程结构虽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但却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整体上看,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共同育人,“注重从整体上推进课程建设,初步形成课程建设的整体思路”^[8]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

3.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阶段(“05方案”—中共十八大前)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后,世情、国情、教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突显,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推进,国际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其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向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其三,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逐步过渡到大众教育阶段,事关“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需要高校作出新的解答。在此背景下,200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首次提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并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社会科

学课程同样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要同思政课和形势与政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协同育人方面,该文件最大的亮点就是第一次提出了全过程和全课程育人要求,即“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学习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7]266}。

2005年,中共中央制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意见,对思政课指导思想、总体要求、课程体系建设、学时学分划分、教材教法、教师建设、学科建设等进行了整体规划和统筹安排。“05方案”的实施不仅继承了“85方案”以来协同育人积累的丰富经验,而且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全面育人理念推动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初步建构。这一阶段对协同育人的创新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学科建设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增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五个学科为其二级学科。学科层级的提升和二级学科的划分不仅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学科有了平等对话的权利。其二,在课程建设上,在进一步规范思政课程体系和教材编撰使用的同时,有计划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自然科学课程改革,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使其有机融入思政课程内容中来。其三,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团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全党全社会协同关心支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共育

格局。

4.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阶段(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洞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新变化的基础上,从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对高校协同育人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而且建构起了一整套科学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概括来讲,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创性贡献。

其一,提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理念。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9]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后,中共中央迅速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大力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2018年、2019年先后遴选两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产生了8个试点区、25所试点高校和92所试点院(系),为推动协同育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积累了有益经验。

其二,构建“十大育人体系”,突显协同育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共十九大作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安排,并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基本支撑。为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十个方面工作的育人功能,2018年,教育部制订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着力构建“十大”育人

体系。在此基础上,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在2018年构建“十大”育人体系的基础上直面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理论武装体系、学科教学体系、日常教育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安全稳定体系、队伍建设体系、评估督导体系七个层面的体系架构。“十大”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既在逻辑上继承了“三全育人”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任务,更是在实践上对高校办学治校各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育人力量、育人资源的科学化整合。

其三,统筹“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0]“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马克思主义“术语革命”的生动体现,它不仅精练概括了两类课程名称,而且鲜明地指出了两类课程的核心价值支点。2020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从“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实践类课程”3个大类,“文学、历史学、哲学类专业课程”“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教育学类专业课程”“理学、工学类专业课程”“农学类专业课程”“医学类专业课程”“艺术学类专业课程”等小类,对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安排,目标是统筹各类课程的思政资源、挖掘其中蕴含的育人元素,逐步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这就从制度、理论、实践三个维度形成了协同育人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高校协同育人的基本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

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11]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依据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任务,不断探索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创造性地推动了高校协同育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协同育人经验。

1. 坚持把思政课作为高校协同育人的主渠道、主阵地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的性质是由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这一矛盾统一体中,思政课程处于支配地位,决定着协同育人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85方案”时期,我们党就对思政课的地位和任务作出了明确界定,认为高校开设思政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使青年一代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体现了社会主义高校的特点和优点,是社会主义高校区别于资本主义高校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提出“主渠道”“主阵地”概念,但核心意旨十分明确。“98方案”的重大理论贡献就是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主渠道”“主阵地”概念和建设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我们党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思政课功能地位的概括。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对思政课的功能地位从三个方面作出清晰界定:一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二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核心课程”;三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灵魂课程”。因此,办好思政课事关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继有人,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由此可见,在高校教育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党中央已经把思政课放在了课程育人的最高位阶上。40多年来,党中央始终以“主渠道”“主阵地”战略定位推进思政课教育教学建设和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引领力、感召力和渗透力,使思政课在协同育人方面始终发挥首位牵引作用。

2.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高校协同育人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决定着社会主义高校的办学性质、办学方向和办学成效。一以贯之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贯穿立德树人各方面、各环节、各课程是我们党推动高校协同育人的一条重要经验。

其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主干课程设置。例如,“85方案”规定,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为本科生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3门必修课,在有条件的高校试开科学社会主义课程。“98方案”虽然对课程设置作了较大幅度调整,但依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2门课程作为本科生教育的主干课程,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5门课程作为硕博研究生的必修课程。“05方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内容进行归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对本专科生进行系统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其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协同育人的理论根基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以及各历史阶段产生的最新成果。在“85 方案”中,为使学生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提出开设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以增强学生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认知和理解。1997 年,中共十五大不仅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而且对其理论内涵、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行系统阐述。因此,为推进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习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在“98 方案”中增设邓小平理论概论,并将该课程的学时学分调整到所有思政课程的首位。根据形势变化和课程内在逻辑,“05 方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了统合,提出开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随后的十多年间,该课程不断融入“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最新理论成果,并统一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样就使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与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既说明了两者的承继关系与逻辑统一性,又体现了该课程的理论一脉性和内容开放性。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融入“课程思政”建设中。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课程承担着不同的人才培养职能,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使“课程思政”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同频共振,根本支点就在于将各类课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寓于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教育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中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40 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教学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学科体系、管理体系等建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此。

3. 坚持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基本抓手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在 1978 年全国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6]108}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师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好教师的评判标准与新的时代条件下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2],并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 24 字要求。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出台《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从法律上保障教师的地位和权利。根据不同阶段的教育任务,制定《关于加强教师队伍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以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制度,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思想品德、师德师风等方面构建了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框架。

其二,加强教育培训。教师培训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项优良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就针对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采取了脱产进修,在职学习,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开展师资培养,举办暑期讲习会、理论

讨论会、教学经验交流会和巡回辅导等措施,极大地提升了高校教师的整体水平。进入新世纪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常态化师资培养培训力度,通过制订师资培养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举办骨干教师研修班、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等提升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学历学位层次。

其三,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和育人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的教育条件和教师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以人事制度改革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将没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业务能力不能胜任高校工作的教师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严把选聘入口关,实行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双重考察;营造尊师重教环境,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等。

4. 坚持以学科融合发展为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由内而产生的生长动力。如果将政策支持、制度激励、条件保障等作为外部动力的话,那么学科融合发展就是协同育人的重要内生动力。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学科建设对教育教学的支撑作用,并将之作为有效提升育人质量和水平的内生动力。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中首次明确了马列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教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85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学科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随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二级学科发展到独立的一级学科再到与其他学科优势互补、有机融合的历史性变化,这不仅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政课的发展动能,而且为协同育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一,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升“思政课程”内生能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19年底,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达到8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近300个。虽然与“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建设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其为思政课培养大批人才、提供丰富成果资源的重要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其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等重大战略举措。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2004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了部署。经过10余年的发展,目前该工程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与传播,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编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重点学科教材,提升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建设质量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又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为高校协同育人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其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40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规律,深入挖掘哲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的有益因素,积极推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为提升“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的政治性、学理性、学术性、批判性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所具有的政治属性、价值属性决定了这两类课程的内在统一性,而两类课程在内容、话语、范式上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协同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深化“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研究应着力在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上下功夫。

其一,课程思政教材教学体系的科学化构建问题。应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对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类课程3个课程类别和文史哲类、理工类、经管法类等7大专业类别课程进行重新建构,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新型教材体系和教学范式。

其二,不同学科专业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应系统梳理当前不同类别学科专业的学术概念、话语风格、教育要求和学生的接受心理状况,从中择取最大公约数,建构价值主旨一致但又兼具各自学科专业特点的话语范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的接受心理。

其三,“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效衔接问题。应将思政课程的“道”“体”与专业类别课程的“器”“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思政课程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专业类课程蕴含的学科伦理、人文观照、社会关怀等有效衔接,最大化地提升“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效能和育人质量。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EB/OL]. (2020-06-03) [2020-12-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 [2]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 2019-03-19(01).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8.
-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26.
- [5]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28-329.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7]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 1978—2014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 [8] 顾海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27.
- [9]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2.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76.



引用格式:张珍.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自组织特征及其方法论启示[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102-10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1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102-07

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自组织特征及其方法论启示

Feature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its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of the internet age

张珍

ZHANG Zhen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关键词:
网络时代;
高校思政教学;
自组织;
在线课程;
互动

摘要:信息网络的发展对高校思政教学提出新的挑战,以“教师讲授、学生接受”为特征的传统思政课教学已无法适应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要求,以开放性、主体性、创新性和自发性为特征的自组织教学应成为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未来方向。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应树立开放思维,建设在线课程资源;启发学生主体意识,形成探索学习习惯;激发创新动力,创设互动课堂生态;强化教师引导,防止自我意识泛滥。

[收稿日期]2020-10-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SJGLX01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ZX017);郑州轻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作者简介]张珍(1979—),女,河南省淇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系统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且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和思维方式,也自然要求与之相应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构建高校思政教学的新理念、新模式,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实现新时代思政育人目标的必然选择。《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要加强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加强学生互动社区、主题教育网站、专业学术网站和‘两微一端’建设,运用大学生喜欢的表达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1]。

近年来,学界在思政教学改革创新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涌现出了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成果,探索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但基于自组织理论方面的思政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不多。鉴于此,本文拟在阐述复杂系统自组织特征的基础上,分析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自组织特征,揭示自组织理论给予的教学方法启发,以期增强高校思政教学实效性提供一些借鉴。

一、自组织的基本特征

自组织是复杂系统科学及其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肯将自组织定义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2]自组织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1. 开放性

复杂系统自组织的前提条件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即只有非平衡的开放系统才具备产生自组织的可能。根据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封闭系统趋向于熵(即无序度)无限增大直至达到“热死寂”状态;而开放系统则可以由环境输入物质、信息、能量等负熵,从而使系统

远离平衡态,减缓熵增而存活得更久^[3]。例如,人之所以只能生老病死,不存在逆向的情况,本质上是由于我们无法抵抗自身无序度的增加,但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及时从环境中获取物质、能量等的补充而减慢熵增的速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延年益寿。所以,自组织的产生条件揭示了其具有开放性特征。

2. 主体性

复杂系统自组织的诱因是系统内部的随机涨落^[4]。涨落是一切实际系统不可避免的固有特征,稳定态的系统具有抗干扰能力,会使涨落逐步衰减,从而恢复原有的平衡态;而在远离平衡态的系统中,正反馈机制可能会使涨落放大而导致系统发生突变,生成新结构。这表明,自组织源自内部组成部分的个体差异,复杂系统内部元素或主体的个性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条件下会得到张扬,从而推动系统朝向新的有序模式突变,或者说涌现出新的有序结构。这种基于内部主体的自组织涌现揭示了复杂系统自组织具有主体性特征。

3. 创新性

复杂系统自组织的产生机制是从局域扩展到全局的非线性相互作用^[4],该机制首先揭示了自组织系统具有创新性或新颖性。一方面,由于非线性关系在数学上不满足叠加原理,小原因可以造成大结果,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的自组织系统的发展不可预测,这意味着某种特质将在新的有序模式中涌现出来。另一方面,实践中由于初始条件过于复杂,即使利用计算机的超强计算能力来揭示复杂系统自组织的过程及其遵循的基本规则,也难免会遗漏一些细节,因而预测只能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和弱势的。例如,白蚁筑巢的过程,是白蚁个体遵循几条简单的规则而相互作用,进而自组织生成蚁群的多样化的集体行为或群体活动方式,各种

形式的觅食、拾重物、搭桥、筑巢、养育后代、战争等等,都是这样的具有新颖性的群体活动方式。所以,自组织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特征。

4. 自发性

复杂系统自组织的概念与机制都强调自发性。一方面,从概念上看,自组织强调整体的行为、结构或模式等,不是受制于内外部控制者指令的结果,而是自发生成的,因而与他组织相比,自组织具有突出的自发性。另一方面,从机制上看,非线性相互作用是在系统组成部分之间展开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分布式的生成路径。例如,在白蚁筑巢的案例中,蚁群复杂的群体活动模式,是白蚁个体按照两条简单规则行动而生成的:(1)将泥土卷成泥球并注入某种标记(如气味);(2)在标记(气味)最强时就把这些泥球堆放在那里^[5]。在此规则下,白蚁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反复出现,当这种局域的相互作用扩展到全局之后,系统便呈现出某种具有整体特征的、全局性的有序模式。所以,自组织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是主体遵循某些机制的自发行动,具有自发性特征。

二、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自组织表征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高校思政教学呈现出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前文所述的自组织的开放性、主体性、创新性、自发性特征在网络时代的高校思政教学过程中都有所表征。

1. 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带来高校思政教学的开放性

网络资源的丰富性使高校思政教学的内容与形式都呈现出开放性特征。这种双重开放性与自组织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吻合,强调与时俱进地从教学资源中吸收信息和能量,使教学系统具备自组织的基本条件,从而在主体间复杂

的协同作用中,生成更具主体性、创造性和自发性的自组织教学模式,以更好地适应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复杂性。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开放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的开放性。传统思政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教师基于自身对教材知识体系和育人元素的理解而确定的,学生很难获得教师视野之外的教学资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打破了空间地域的阻隔与限制,资源全球化为学生提供了庞大的资源库。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各行各业感人的抗疫故事,学生都可以通过媒体迅速获得了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政教学的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教材,而是广泛地包含社会热点、国际形势、网络思潮、时代精神、理论前沿等内容。因此,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内容是向丰富的网络资源开放的,体现时政性的教学素材不断通过网络进入课堂,引发师生关注与思考。二是教学形式的开放性。传统思政课堂教学内容的展现形式多为教师在教室通过语言文字向学生传授知识,而网络时代多媒体教学将图像、影像、视频等形式的教学资源呈现于课堂上,并通过超星学习通、爱课程、微信、QQ等平台与媒介,使教学内容的展现方式不再局限于三尺讲台。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由于其知识结构的广泛性和价值引领的时代性,正加速向这些新的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开放。

2. 网络资源的多样性强化高校思政教学的主体性

网络资源的多样性使高校思政教学越来越凸显学生的主体性。体现学生主体需求的差异化教学与互动,与前文所述的自组织涌现是基于内部主体的个体差异而生成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传统思政教学的主体性不强,“教师主

导教学”的理念使多数思政课堂缺少互动和反馈,展现的是“听课—记笔记—复习—考试”的线性知识习得模式,育人模式是他组织的,而不是自组织的,很难实现入脑入心的育人效果。在2015年6月召开的“中国互联网+创新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就指出,中国教育正在迈向4.0时代,前三代教育分别以书本、教材、辅导和案例为核心,而以“互联网+教育”为核心的第四代教育是真正以学生为核心的。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重视价值引导的因材施教和显著增多的师生互动。网络为人的主体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6],网络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每天接触多样化的媒体资源和网络信息,对于各种冗杂信息与国际国内思潮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生成差异化的价值需求。学生在课堂内外的提问与讨论,多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盲点和网络时政热点而产生的困惑甚至质疑,既不受限于教师,也不局限于讲授内容,而是基于每位学生不同认知基础和认知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

3. 网络传播的交互性激发高校思政教学的创新性

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性进一步激发了教学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表征了高校思政教学的创新性特征。传统思政教学的课堂互动基本上是局限于教室内的,且由于学生获取资源受限,互动形式多为师问生答,内容多为教师讲授知识的不解之处,结论常常是教师可以预测或者备课时已经准备好的,具有较强的教师主导性,即传统教学多为既成的而非生成的,缺乏创新性。网络时代的教学互动,由于网络传播本身的交互性而呈现为师生共同参与和协同推进的交互式互动。各种交互式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与完善,使主体可以更加便捷地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并通过执行器对所处环

境产生影响^[7],即使是性格内向不敢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观点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虚拟的身份、非面对面的形式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对理论或权威提出质疑。在这种反复进行着的、不断相互影响着的互动过程中,各种观点与论证在不同主体之间经由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得到放大、彰显,引发新一轮的深入讨论,因而问题与答案常常都是在师生讨论、同学辩论、教师引导中一步步明确的,不是教师课前准备好并在课堂上呈现出来的,而是在互动过程中自发或自组织生成的,具有不可预测的新颖性或创新性特征。课堂上的师生关系不再是“提问—回答”式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突出地体现着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与环境互动等多层次的互动与协作。所以,网络传播的交互性促进了自组织教学过程中的交互式互动与协作,进一步激发了高校思政教学的创新性。

4. 网络信息的共享性彰显高校思政教学的自发性

网络信息的共享性使主体基于自身和周围环境而自发地开展自组织学习成为可能,彰显了高校思政教学的自发性。自组织往往是在组成部分之间展开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过程,而网络时代信息的共享性使知识传播途径更加扁平化,信息常常是分布式的,而不是受控制的,不同认知主体的信息可以自发组织,生成某种群体的认知结果,进而影响价值判断。这种具有自发性特征的自组织学习,在高校思政教学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信息的共享性为学生的自发学习提供了便捷的数字资源。信息共享说明信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可以被多个认知主体接收和利用,信息通过网络共享,加速了信息获取的大众化。同时,网络时代的大学生被称为“互联网土著”,获取信息的

能力突出,将海量的网络信息整合成为自主学习的有效资源既是可能的又是便利的。各种形式的网络共享课程、搜索引擎、微信公众号、B站,以及各高校购买的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文字、声频、视频资源随时随地可为师生共享,思政教学不一定完全是在教师主导下开展的,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发地开展学习。二是网络信息的共享性使学生作为思政教学的主体获得更多话语权。后疫情时代网络信息共享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完善,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钉钉等使得突破空间局限的沟通交流越来越频繁,青年大学生在思政教学中,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自由、自主、自发地进行话语表达。同时,话语表达又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大学生的话语权意识。网络时代大学生在思想与实践层面的话语表达意愿的增强与表达途径的增加,都使得高校思政教学呈现出自发性特征。

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交互性和共享性使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呈现出开放性、主体性、创新性和自发性特征。在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新型高校思政课堂中,大学生可以实现自我搜集信息、共享信息、创建信息,更加个性化地获取知识,生成价值体验,而这种自主的、带有协同特征和创新效果的自组织学习能力的培养,也成为时代的新要求和新的教学发展趋势。基于这样的分析和思考,网络时代高校思政教学可以在自组织理论的观照下,探索基于自组织特征的教学方法,推动高校思政教学实践创新。

三、基于自组织特征的高校思政教学创新

基于自组织特征的高校思政教学致力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运用网络时代的各种信

息技术平台,创设开放、自主、创新的课堂育人环境,在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加强教师对课堂的引导而不是控制,以形成师生互相交流、互相评价的循环学习模式。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树立开放思维,建设在线课程资源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校思政课的自组织教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学环境的开放性是自组织教学最基本的特征,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实现高校思政教学的开放性,可以从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思政课教师应树立开放性思维,主动把课堂教学向全球网络资源、多媒体技术开放,积极开展网络教学资源的筛选与建设。其次,思政课教师应不断提升开放能力,将不同类型、不同立场的思潮进行客观、科学的比较分析,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给学生以正面指导。再次,思政课教师应不断提升网络技术水平,既要灵活运用腾讯会议、腾讯课堂等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又要善于利用超星学习通、爱课程、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教育教学资源,将课前课中课后教学协调起来,实现课程全方位全天候在线开放。

2. 启发学生主体意识,形成探索学习习惯

网络时代基于自组织特征的教学模式应强化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师生互动中形成并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应多采取问题式教学方法,以学生的思想困惑而不是教材知识为着力点,在导课、授课的全过程引入针对性较强的思考题,既要以深入浅出的学理分析和生动形象的案例从内容上吸引学生,又要不断启发并参与学生的互动讨论,在协商协作的基础上生成讨论结果。另一方面,还应在长期的师生共处中,启发和引导学生形成自发学习、自我学习的思维与习惯,将“要

我学”变为“我要学”,以提升学生自我组织课堂的意识和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教师愿意“赋权”,但部分学生懒得行使权利,觉得上课听听就行了,这样的消极心态,使部分学生不愿意参加课堂活动。因而在自组织教学的初期,教师应更加重视对学生的思维引导和习惯培养,师生都要努力将思维从知识性学习转换到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开展基于自我的探索性学习上来。

3. 激发创新动力,创设互动课堂生态

自组织的课堂教学要求教师重视情境创设和规则制定,以此来实现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创新性思维。这就要求教师应转变课堂管理理念,将自己的角色从发布命令和实施监控的主导者,转变为制定规则并维护规则有效运行的管理者或引导者,以创设鼓励、倾听、引导的课堂生态环境。这种师生互动的课堂生态有助于达成符合学生实际的、入脑入心见行动的思政教学效果。例如,各种形式的角色互换(让学生当老师、微课比赛等),可以深化学生理论知识的系统性;结合现实热点的小组讨论、辩论和思想碰撞,可以生成新的问题并互相提供科学的解释方式;师生共同开展教学项目研究的协作模式,可以产生时代感强、问题意识突出、体现专业特色、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资源包。基于自组织特征所能生成的具有创新性特征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资源远不止此,重要的是,教师管理理念的转变,可以激发师生的创新动力,将课堂教学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

4. 强化教师引导,防止自我意识泛滥

在关注复杂系统自组织的开放性、主体性和创新性的同时,还必须特别重视其自发性特征,因为完全自发的思政学习会导致结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网络在为教学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色情、网络暴力、虚假新闻等

不可控的负面影响,反映在高校思政教学中,即为网络资源乱象会误导学生,使其价值观出现一定的扭曲。五花八门的观点、现象、问题甚至冲突,“乱花渐欲迷人眼”,如果缺乏合理引导和恰当干预,完全靠学生的自组织学习可能会使学生思想偏离主流价值观,甚至为负面能量和负面舆论的传播提供便捷渠道。因此,自组织的课堂教学一定要强化教师的引导,适当保留或引入他组织的力量和形式,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思政课不同于其他课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应通过理论学习和现实问题解释,让学生强化并坚持“四个自信”,保证高校思政教学以价值引导铸魂育人,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四、结语

网络时代信息获取、交流与展现的丰富性、多样性、交互性和共享性,既为高校思政教学提供了资源与平台,也对高校思政教学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以学生为主体,启迪自发学习、自主学习的自组织教学模式,必然生成更具创新性特质的学习效果,但同时,这样的教学模式既要求教师具有勇于开放的思维和善于开放的能力,又要求教师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扎实的专业素质,能有效地发挥价值引导作用。与传统教学相比,自组织教学在思维启发、习惯培养和课堂参与等过程中都需要师生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因而在探索的初期,难免会产生各种问题。但思政教学改革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新问题,而且还会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如何紧跟时代步伐,利用好网络技术为思政教学提供的历史机遇,构建具有自组织特征的思政教学模式,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7-02-28(01).

[2] 哈肯. 信息与自组织: 复杂系统的宏观方法[M]. 郭志安, 译. 2版.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0: 18.

[3] 普里戈金, 斯唐热. 从混沌到有序[M]. 曾庆宏, 沈小峰,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20-124.

[4] 颜泽贤, 范冬萍, 张华夏. 系统科学导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41.

[5] CLARK A. Mindwa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8.

[6] 杨立英.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202.

[7] 罗素, 诺维格. 人工智能: 一种现代的方法[M]. 殷建平, 祝恩, 刘越, 等, 译. 3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82.

(上接第90页)

参考文献:

[1] 邓志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的数据分析: 以《新闻联播》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为例[J]. 电视研究, 2020(5): 15.

[2] 卞地诗, 周彤彤. 议程设置视角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微博报道策略及优化: 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的“新冠肺炎”报道为例[J]. 泰山学院学报, 2020(4): 135.

[3] 田维钢, 温莫寒. 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 主流媒体疫情报道的短视频生产[J]. 现代传播, 2020

(12): 9.

[4] 崔士鑫. 主流媒体如何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宣传报道: 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 传媒, 2020(5): 12.

[5] 侯毅. 情感的呼唤: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共情策略——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 传媒, 2020(11): 28.

[6] 李滢瑞, 马瑞洁. 危机报道中的多媒体整合: 人民日报新冠疫情首阶段报道述评[J]. 现代视听, 2020(2): 24.

[7] 李喜根, 张一木. 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体报道原则[J]. 对外传播, 2020(3): 72.